

目 录

王同春.....	苏希贤 武英士 (1)
一、家世.....	(2)
二、投效万德元发迹.....	(5)
三、依附郭商人起家.....	(7)
四、兴修水利，开渠创业.....	(11)
(一)、开挖、重修同和渠.....	(11)
(二)、利用灾民开挖沙河渠.....	(15)
(三)、浚修刚济渠.....	(16)
(四)、整修丰济渠，劈宽协成渠.....	(16)
(五)、浚修永济渠.....	(18)
(六)、疏导开浚新灶河渠.....	(19)
(七)、重修杨家河.....	(19)
(八)、开挖三公渠.....	(20)
(九)、疏通通济渠.....	(21)
(十)、协助规划长胜渠，根治塔布渠.....	(22)
五、心力专注，治水有方.....	(23)
六、巨大的家业.....	(27)
七、扩展土地的手段.....	(28)
八、与蒙旗上层的冲突.....	(30)
九、用“跑马里”哄骗蒙人.....	(34)

十一、与陈锦秀争霸	(35)
十二、利用灾民发家致富	(44)
十三、生财之道	(47)
十四、“把式匠——家兵”和残酷的刑律	(49)
十五、引清军镇压刘天佑起义	(50)
十六、治家方针	(57)
十七、与帝国主义宗教势力的抗争	(59)
十八、大富遭妒陷	(62)
十九、与外蒙协商垦荒大业	(64)
二十、清廷放垦家业衰落	(65)
二十一、北牛棋的兴衰	(67)
二十二、率民团抗敌保境	(70)
二十三、王同春与阎锡山、冯玉祥之交	(72)
二十四、到南通参与导淮	(73)
二十五、去晋北指导水利	(75)
二十六、一生坎坷，十年监牢	(76)
二十七、组织汇源水利公司	(80)
二十八、积劳成疾，死后哀荣	(81)

后套水利沿革……………王文景 (87)

黄杨闸——解放闸施建简介

……………刘培荣 史明德 (124)

- 河套公路杂忆石兆奎 (132)
- 解放前后套的交通工具——大木船
.....安子兴 (147)
- 汇源公司的始末王兴亚 (150)
- 民国初年至解放前五原工商业的兴衰
.....张晋仁 (164)
- 陕坝市商会的始末高德福 王廷英 (179)
- 解放前河套地区税征工作的见闻
.....王廷英 (191)
- “广和义”中药铺李技荣 (199)
- 百川堡屯垦的始末刘培荣 (205)
- 乌梁素海的形成和发展赵培新 (216)
- 我们所知道的乌梁素海
.....陈建盛 董玉奇 (234)

王 同 春

苏希贤 武英士

王同春是河套有名的大地主，也是河套地区享有盛誉的历史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过去听得很多，印象很深。他在河套经营了五十多年，发展了巨大的家业。他一生经历，无不与河套的水利紧密相联。他没有文化，识字不多，却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有胆识，有魄力，善于经营。于公元一八六九年——一九二四年五十多年间独立创开了刚济、丰济、灶河、沙河、义和五条大干渠与别人合作创开了通济、长济、塔布三条大干渠，还开挖了二百七十多条支渠。大干渠长者过百里，短者六、七十里，干支渠道加在一起总长度有四千多里，宽有四丈、五丈、六丈不等，最宽的有十数丈，深有五至七尺。当时在文化非常闭塞的塞外河套，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设备的情况下，用上办法完成这样浩大艰巨的工程，确实是不容易的。王同春所

开的渠道，有些现在还为我们所利用。

关于王同春一生的情况，诸如他是怎样发家致富，为争夺土地又是怎样与蒙旗王公贵族、地主商人和外国宗教势力争斗，他又怎样利用灾民并对农民进行剥削以及他一生五次入狱的坎坷经历，尤其是把他在河套兴修水利的情况写出来，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于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我们便着手广泛查阅有关王同春的史料，并到王同春过去经营过的良瑞桥、同兴泉、十二牛镇、北牛镇、王明五圪旦、郝六圪旦新渠口、良定图、白茨圪卜、大树圪卜以及五原城郊跃进、联合、永强、旧城等生产队，向那里的老人进行采访，先后有二十多人提供了各种资料，我们还到巴彦公社采访了王同春开挖丰济渠的情况。我们把这些情况并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修订综合而写成本篇拙文，缺漏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知情者指正。盟政协副主席罗达同志给以认真的修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现在拟分二十七个题目来叙述这一人物并加二篇附记：

一、家 世

王同春字浚川，乳名进财，五岁时害痘伤了左目，成年后眼睑下垂，不常睁开，因故人称

“瞎进财”。七岁入私塾读书，仅读了六个月，识不得几个字。原籍河北省邢台县城东二十里的石门村人，生于清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农历三月十日，卒于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终年七十四岁。娶过两个女人：原配杨氏，生子五人生女三人。长子鸿，原配高氏，继娶戴氏。次子璟，原配郭氏（郭敏修女），继配曹氏。三子英，字杰臣，原配薛氏，继配贾氏、白氏、张氏。四子钰，字昆山，原配张氏。五子喆，字乐愚。大女嫁顺德杨家，是大族；二女云卿，乳名拉玉，人称“二老财”适张家，是山西地商人张振达的儿媳；三女适包头李家。

王同春的子女多中年去世，后仅存者为三子英、五子喆与次女云卿三人。四子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常在妓院鬼混。后因杀死姘妇而畏罪自杀。王英早年当过土匪独立队的头目，日本侵华期间当了汉奸，充任日寇“绥西联军司令”，多次为日寇效忠卖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国民党收编为十二战区骑兵司令，打过内战，反过共，一九五一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于北京。王云卿（二老财），日寇侵占包头后，当过日本特务机关一一“道生”的联络员与情报员，一九五一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于包头。王

諍（乐愚），一九五一年减租反霸时被人民政府镇压于五原。

王同春的先人世系，据王家家谱和墓碑所载，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晚期，邢台东石门村住有三百余家居民，王姓就有二百二十余户，可谓大族。于乾隆年间，王姓有移居河南的，道光年间有移居北京的，也有移居陕北的，但年代不可考。到王同春高、曾祖时代，东石门村文风甚盛，王门中应科举、得功名的人前后相继。王同春的曾祖是“庠生”学位，以文而名于乡里，其时，家很富有。王同春祖父手上，在太行山中建数处山庄，养骡马百数十头，雇用驮运夫七十余人，驮运货物及迎送达官、富商往来于彰德、汉口、浦口、周村、北京等地。王同春之仲叔，善于使用骡马驮轿技术，涉水登山如履平地。当时的显官、绅商，都愿出重资，乐于雇佣他驮运营生。王家精于这一行艺，名扬于江淮以北广大地区。

当太平天国兵起，清军在江北地区扰害严重。王家在浦口的骡马，多被乱军所掠，又因南方多雨，马蹄易腐，每多生病而死。经此兵荒马乱的浩劫，家道随为中落。王同春三叔，伤感于家运不振，心情烦闷，纵情于酒，无意营生，使家业愈益衰败不振。及至王同春童年，家境贫寒到不

可收拾的地步。

王同春父名杰，居长，叔父名侃，弟兄共三。王同春兄弟三人，他是老三。王同春的族人中，多擅长黑皮工手艺。其族叔王成精于此术。嗣以家贫无以自给，遂来河套磴口与西山咀子两地，开设黑皮坊制作车马用具，与蒙人相交易，经营颇好，获得利益。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王同春时年十二岁，他家仅有薄田十几亩，年景不丰，常有断炊之虞。被贫所迫，随其父离乡背井，由河北老家出走“西口外”，徒步跋涉数千里，来到河套磴口（即今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公社），投奔族叔王成家中，在黑皮坊铺里当徒工，学做鞍鞮车马绳线。因王成无后，论其王家之亲疏关系，收王同春承嗣，作了嗣子。

二、投效万德元发迹

王同春在族叔王成的黑皮坊学艺一年多时间，一日与村中群孩嬉玩，弄棒使枪，仿效在阵作战，往往不顾一切。由于他生性刚烈，出手不慎，捩伤赵对元，皮破血流致死。王成大伤脑筋，为求安全，王成令他到西山咀子皮件作坊仍学皮工。然以其天性不爱干这一行，终日操作，郁郁不乐，非投所志，终不能精其术。两年过

后，是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附近居民，由黄河引水浇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出去查看地势，详察土宜，纵览周原，观察水流，作谋开渠引水的窍门。还主动帮助居民开挖渠道，受到人们的欢迎。王成本欲他承继其业，强令他专心操作皮工，然其终不乐意。王成知不能强其志，只好听任其性。从此，王同春便热心考求水利。时有万德元商号，在河套东部做蒙古人生意，立业已久。知开渠种地能获厚利，拟浚修短鞭子渠，以图垦殖。经王成推荐，王同春投效万德元，为其修渠筑坝。由于他年青体壮，血气方刚，一锹下去挖起来的土，重有百十来斤，他肯卖力气，精明强干，做活利落，深得万德元商号掌柜的赏识。

万德元所开挖的这条短鞭子渠，是利用上流旧河筒子短鞭子壕，因势疏导，以引水溉田，开工于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此项工程由四川广元商人郭大义（字有元）为总管，委王同春为施工渠头，经他经心谋划，按期开成二十余里长的渠道，得以当年溉田受益，深受万德元的欢迎。时过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短鞭子渠河口淤塞，进水受阻，灌溉失利。万德元无力自浚，另邀万泰公商号和郭大义（人

称郭商人)、王同春合成四股,出钱出力重新浚修。这次施工,采用王同春的建议:他主张废用旧河口,另从黄河岸沿西,寻开“迎水”新渠口,挖掘新渠,接通下游,并把下游渠道劈宽挖深、利用水力冲刷拉通。根据他所目测的渠路和施工规划,开挖至板头圪堵。“度其高低,深浅得宜,宽狭合度”,修成一条总长三十余里的新渠。因是四家合股协力开挖,故名为“四大股渠”。渠成,“高不病旱,卑为病涝,水流畅通,灌溉自如”。不但已垦之田浇水方便,就是未垦之地,亦可引挖支渠,灌溉便利,“耕者皆获其利”。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郭大义子郭敏修续向东开,经惠丰长、恒隆昌、致中和,入乌加河。这一段工程计长四十五里。“四大股渠”开成后,万泰公、万德元及郭大义等人,大片垦殖,获利甚厚。尤以郭大义不多年成了河套东部的首富,万泰公和万德元的土地,渐次被他所占。

三、依附郭商人起家

王同春为万德元浚修短鞭子渠,以及随后合开“四大股渠”,给工程出智出力,显出了才干,为郭大义所佩服。施工期间两人相处甚好,工竣后,郭大义邀王同春到他的黄脑楼公中为他

效力，当了渠头，管理“四大股渠”。由于他生性勤劳，在管水之余，还给郭家料理家务，兼做黑皮绳线。以后曾两次救郭商人于危急之中，成为郭大义的亲信。“四大股渠”后来成为郭大义的私渠，人称“老郭渠。”

光绪初年，郭大义垦殖拓荒，放水淹没了蒙人大片牧场，激起蒙民严重不满。蒙人派人数度交涉无效，迫使蒙人起而反抗。有一天，郭大义的黄脑楼公中，忽然来了一队蒙旗兵丁，把郭大义五花大绑捆住，装进一个用红柳编制的大筐子内，上用另一个柳筐盖紧，用绳索捆扎结实，架抬急去。蒙兵行前警告郭妻说：“如再水淹牧场，私垦草地，把你也要提去问罪。”郭妻惊吓之余，定神后打听，才知道是达拉特旗派驻公义社的旗兵。郭妻慌张无措，请求王同春设法营救。

王同春性豪侠，重义气，受郭妻所托，手执一把铁锹，带领数名家兵，趁着夜黑人静，到了公义社，悄声越墙而入。郭大义被捕到公义社后，蒙兵令他具结：要他一不再垦蒙地，二不再水淹牧场。郭大义巧言答辩，触怒蒙兵连带柳筐将他吊到房梁上。王同春侧耳静听：屋里是一片喝酒玩乐的喧嚣声，房梁下是郭大义的哀哀求饶声。王同春顺着哀嚎声音，摸到吊郭的地方，乘蒙兵戒备松懈之际，一锹铲断绳索，背着郭大义翻墙

而出。及至蒙兵察知，走得已无踪影。郭大义因王同春效死搭救，非常感激，从鄆四圪堵拨给王同春一段好地，资其招佃耕种，创立家业。王同春还留在郭的身边效力，此为一救郭商人。

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有陈四（字锦秀），河南洛阳人，同治四年随役清军左宗棠部平定“回乱”后，约同伍数人，退伍到河套，落脚于较早来套的他的同族家中。他在五原西南部，即现在的卢柜圪卜和土城子一带，向杭锦旗承包了大片土地，十余年间垦田百数十顷，发家致富，成了大户。此人行伍出身，恃其当过清军，自负武勇，蓄养打手，拥武自卫，没人敢惹。他与郭大义使用同一条水渠溉田，他居上游，郭在下游，常因争水霸地之故，屡生械斗，互有胜败，积久仇恨结深。有一年天旱，黄河水位极低，陈四扼上游坐坝截水，还派人昼夜轮班防护，使郭大义的田禾旱得要死，急得郭大义心灼如焚，曾差派家兵数度交涉放坝不成，无以为策，一天夜间，郭大义摆设酒席，邀请长工短汉吃喝。席间，郭大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陈锦秀欺人太甚！我拼着老命，也要把水放回来，出这口怨气。在坐的谁有本事，只要放回水来，我郭某情愿奉送二千亩好地。”王同春生性好强，向郭请命，率领一伙家兵，星夜赶到土城子河口

放坝。陈锦秀因为连续与郭大义格斗得胜，滋长了懈怠心理，只留下少数人看坝。王同春趁看坝人员麻痹大意入睡之际，巧施谋略，放开大坝，水流滚滚，奔流下游，饱浇了郭大义的久旱小麦，获得大丰收。郭大义得悉放开大坝，一肚子顺气，满心欢喜，酬送王同春于隆兴长末边二十顷好地，以践诺言。从此，王同春打下了创业根基。他随即立起牛犊耕种，年年收成很好，这就是后来的东牛犊。因为这次行动，陈锦秀与王同春结下了恶怨，为以后陈王两家交恶，每因争水占地，械斗连年，种下了恶因。

相处日久，郭大义与王同春因争水争地之故，而产生了裂痕。时有原万德元商号的赵某人，规劝王同春为免争执，以后徐图，自己开渠，以便利浇田，开创家业。王同春这时通晓蒙语，和蒙人交往，多施小恩小惠，为蒙人所喜。遂由赵某人周旋，代向沙呼尔庙喇嘛献礼纳贡，立约包租下一片膳召地（即庙产地）。然地虽租成，仍须导引“老郭渠”水灌溉，以是与郭家在用水先后上时起争执。王同春寻思：当年开挖此渠时，自己亦曾出过大力，而今却不得引水以为己用，于理不通，气愤不能自己。适老母千里迢迢从故里来，劝令王同春随母回乡，事得以暂息。王同春居家六个多月，翌年春与长兄驱牛车

复来，仍以引水浇田为故，与郭家又起争端。时有何某人，好心打劝王同春说：郭家之势已成，徒争无益，干脆自开一渠，以利己用，省得时起纠葛。为了创大家业，王同春然其说。乃商经郭家同意，决定借“老郭渠”的河口引水，自己开渠。

四、兴修水利，开渠创业

王同春决定另起炉灶，自开渠道。时有山西交城商人张振达与王同春是知己之交，张媪王的二女儿作了儿媳。张振达原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一带，向杭锦旗包租了一段土地，因为两家联姻，亲如一家，将这段土地的承租权转让给王同春经营。这时王同春的土地已有数处，数达百顷：（一）郭商人在郭四圪堵和东牛犊两次赠地数十顷；（二）自己向沙呼尔庙包租“膳召地”数十顷；（三）张振达的转让地也有数十顷。如此颇具规模的产业，确实需要自开渠道，才能用水自如。从此，王同春更致力于水利，同时扩展土地，创立大业。

（一）开挖、重修同和渠。

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三个天然

壕沟，疏浚挖通。创开了一条渠道，初以他的名讳“同”字取名为同和渠。

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王同春重修同和渠。从土城子另劈河口，向东北挖至锦秀堂又北岐为三支：一东行，通入大顺成渠；一东北行，通入“老郭渠”；一北行；为本渠之正身，经苗家圪旦，初挖至西牛渠。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从西牛渠挖至同兴德桥，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挖至隆兴长，劈隆兴长大街为东西两面，经老赵圪堵、同兴泉、邓金坝、艮瑞桥通入乌加河。全渠分三段完成，总长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丈，合八十三里。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又从艮瑞桥顺乌加河东南向，挖至巴总地，利用营三壕济水于“老郭渠”下游，以后又陆续挖展至乌拉特前旗的后套地什拉胡鲁素和红门图。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七年）又从隆兴长向北，从同和渠开口，开挖了一条“小城渠”，经贾粉房圪旦，直泻于乌加河，作为同和渠退水。全渠建筑了四座大桥：即同兴德桥、隆兴长大桥、西牛渠桥和艮瑞桥，均用土方建筑。王同春开通同和渠后，与郭家息争，和好如初，因改同和渠名为义和渠，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之前，郭大义已经谢世，其子郭敏修将二女许嫁给王同春次子王璟为妻，结成

儿女亲家，亲如一家。后来郭家产业逐渐被王同春所代替。

关于王同春开挖义和渠《绥远通志稿》记载说：“倡开义和渠者为五原故绅王同春。王光绪年间来套，纵览周原，但见沃野千里，思若能引黄河之水灌溉，则地皆膏腴也。于是孜孜考求，每于落雨时乘骑出外，观积水以测地之高低。遂于光绪十七年，包租杭锦旗地，由黄河草地开挖河口，东向下流，北行至锦秀堂北岐为三支：一东行，通入大顺成渠；一东北行通入老郭渠；一北行，为本渠之正身”。

义和渠穿隆兴长大街，中建大桥。由河路输出和输入的货物船只，均以义和渠大桥为装卸码头。每日桥上，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桥下船只，穿梭云集，街上的商号铺面，日见增多，买卖大为兴隆。挖通义和渠，给隆兴长带来了繁荣。隆兴长是一个商号名称。始建于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原是清军的运粮官郭向荣，时人尊称为郭老太爷所建，于同治年间从清军平定马化龙“回乱”中，发了横财，原来清军移驻河套设防，郭向荣路经此地，看准了这地方土地膏腴，水草丰美，买了土地，开设此隆兴长商号，主要经营蒙古买卖。开张之初，买卖兴隆，财源茂盛。时有民谚云：“要买好东西上隆兴长，要买

骏马到锦秀堂（即陈四的公中，养育良马出名）。商业鼎盛之况，概可想见。隆兴长后来还在小余太增设贞隆长、广盛隆二分号，专营蒙古生意。

到光绪年间中期，郭向荣去世，儿子郭鸿霖挥霍无度，使家道破落，隆兴长商号也就有名无实，仅存小余太的贞隆长和广盛隆二分号，而隆兴长也就演变成五原的地名。

随着王同春将义和渠挖通，隆兴长这块地方，河运畅通驼运发达，以其地理位置之优越，开设商号，粮行的买卖又多起来了。收运粮食，购销皮毛生意更加兴隆，行市更显活跃，成为河套地区与北疆蒙汉人民物资交易的中心。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前后，由于河路广通，从隆兴长运输的粮食、皮毛、药材等货物，西至宁夏银川，东至晋北河曲，中经包头和托克托县的河口转运，隆兴长成为河套地区商旅云集、买卖繁荣的水旱码头。人口骤增，商业昌盛，一派欣欣向荣，成为河套地区的重要集镇。

王同春挖通义和渠后，与郭家分渠用水，在隆兴长起建房舍，以为经理创业之中心，在原隆兴长旧址（原为郭向荣经营），开设了油坊、酒坊、粉坊、炒米坊、碾磨坊、白黑皮件作坊。并在其它地方分建经营土地的公中和牛渠，开渠灌

田，垦殖取利，广收地租水费展开了大规模的垦殖发家事业。

（二）利用灾民开挖沙河渠。

在开挖义和渠的同时，于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王同春因调停达拉特王府内争成功，租得王府隆兴长以西的土地，因识有地无水，便决定组织一万多灾民，使用廉价劳力，实行以工代帐，开挖沙河渠。第一期工程自马场地的义德成开口，沿十大股入哈拉格尔河，经柴生地挖抵郝进桥。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自郝进桥经鸭子图到一苗树，挖至补红。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五九年）自补红挖经梅令庙、马面换圪旦、济荣堂、通入乌加河、是为正梢。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又自补红向东开挖，沿后补红、同义德通入乌加河，是为东梢。前后五年竣工，计六段工程，总长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丈，约八十余里。口宽四丈，梢宽三丈，三至七尺深。全渠修理得法，且能分水于义和渠，以浇灌他处之地。开渠费银十万余两。渠成，初名永和渠，后因渠口附近有沙丘，更名为沙河渠。而干身又曰“烂大渠”，亦叫“和合元大渠”。在施工期间，王同春的各牛棚给挖渠灾民送运干粮烙饼的牛车络绎不绝，灾民每挖十个

坑子，给二钱工银，（一个坑子是一丈见方一尺深）。王同春亲率灾民一同劳动，夙兴夜寐，日无暇晷，操劳辛勤。全渠计修郝进桥、合少桥、郝头桥三座。

（三）浚修刚济渠。

挖通沙河渠的第二年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王同春组织民工浚修刚济渠（原叫刚目渠）。渠口在缠金渠口下的六十里处，第一段工程经刘三地开挖十七里，入旧刚目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续向北挖，经乌兰贾格素开至祥泰魁。过二年，续由祥泰魁北开至厂汉淖尔，通入乌加河。全部工程三段，共长一万二千另六丈，合七十里。按此渠之沿革：最早在咸丰年间，由地商人贺清开挖，后来渠废地荒。王同春为了开拓垦殖，乃进行全面浚修，渠成后，取名为刚济渠。桥梁有一座，曰七股地桥。

（四）整修丰济渠、劈宽协成渠。

在开挖刚济渠的施工中期，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王同春又从事开挖丰济渠的事业。该渠自黄芥壕开口，第一期工程经马场地开至天吉泰桥，长二十多里。后又同韩钺、王在林

自天吉泰北开至忙盖图，长二十多里，继与官二自忙盖图北开至五分子，长十多里，复将旧日的协成渠劈宽，向北开挖正梢，通入乌加河，前后施工八年之久竣工。全长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丈，约合九十里，口宽八丈，通梢均宽五丈，深度一丈到一丈二尺。坡度甚好，水流畅速，全年水量充足，工程费银二十三万余两。全渠经过的地方是：刘三地、天吉泰、马场地、甲浪水道、自来圪卜、五分子、协成等处。全渠开通后，初名中和渠，后来改为丰济渠。此渠最早叫“协成渠”，又名“皇渠”。桥梁共建三座：一名天吉泰桥，一名五分子桥，一名协成桥。此渠之历史沿革是：最早于同治初年，有甘肃人贺守明，外号贺百万，在祥泰魁开设“协成”字号。该号经理赵三鉴，见刚目河漫溢之水，浸润低洼之处甚多。土本膏腴，种植甚宜，遂将刚目河坐坝截断，待水干地出，耕种十余年，获得厚利。旋因刚目河淤涸，土地随之荒废。到光绪初年，有达拉特旗上层王公二官府维某人，见种地可收厚利，出两千两白银，自旧刚目河北向，开挖了一条十二三里长的小渠灌田种地，并开设“天吉泰”商号兼做买卖。不数年，商号亏本倒闭，且因不懂水利，渠地亦荒废，沿至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二官府知无利可图，乃请人说

合，将这一段渠地全部卖给王同春。王当时正忙于开挖同和渠，无暇顾及。迨至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才开挖此渠。

（五）浚修永济渠。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西盟垦务总督姚仁山将王同春的全部渠道与土地归公后，命他浚修永济渠。永济渠原名“缠金渠”，是以蒙古地名取名，又称为“蟾井渠”，传说是因开渠掘井得蟾而得名。此渠之沿革是：在先于同治年初，由甄姓在刚目河下流开渠一段，长不足五十里，仅一丈宽的小渠。同治四年，清军剿除回乱驻军于此，军纪不良，搜刮民财，因使农事荒芜，渠道废弃。到光绪初年，甄姓欲重振该渠，又联合祥泰魁协成字号杨姓、李姓以及崇发公、景泰德、祥泰裕等四十八家，自旧刚目河上流，向北开渠至卜尔塔拉。之后，因刚目河淤塞，使渠无所用，渐致荒废。姚仁山督办西盟垦务后，杭锦、达拉两旗的土地报垦，地亩辽阔，水不足用，因命王同春大动工程，劈宽浚深。此时王同春的渠地亦被归公，但一本垦殖精神，详加勘察，自黄河岸开口，先挖至干海子，复由干海子引挖至旧刚目河筒子，接着浚挖以前甄姓所开的已淤废之旧渠。全渠沿二喜渡口、公中店、景泰

德、崇发公等地，北开通到乌加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其在黄河岸渠口处，挖宽三十丈，掘深二丈，中部十二丈宽、一丈深。到下游别开四条支渠。继由二喜渡口别开西大渠和东退水渠。两渠平均十二丈宽，一丈深。工程之浩大，为河套各大干渠之冠。全年用水量充足，水流畅通，灌田可达二万余顷。全部工程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竣工。

（六）疏导开浚新灶河渠。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王同春组织中小地主雇工开挖新灶河渠，此渠是利用旧灶河天生壕疏导开浚。从杨三淖尔河头开口，沿经三合公、正义、和瑞、场包、陈旺圪旦东，于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挖入乌加河。全长一百三十里，三丈宽、六尺深。初名“农务工渠”，后仍沿用“灶河”旧名，改叫灶河渠。

（七）重修杨家河渠。

在开挖灶河渠时，有河曲人杨满仑者，因为包办王同春的沙河渠失败，包租了杭锦旗极西之地数千顷，有地缺水，拟重开杨家河渠，请王同春为之审度河流，测定渠路。杨满仑根据王之规划，从毛脑海开挖渠口，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

年)开至乌兰淖尔,民国七年挖至哈拉沟,民国八年开至二道桥,民国十一年开至蛮会梢退水渠,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开至三淖尔梢退水渠。全长一百六十余里,费银四十万两,水利大治。杨家河原为山西平鲁人杨风珠于道光年间创开,后被风沙侵没,水源断绝,使渠荒废。王同春仍利用旧日渠路,重寻河口。杨满食前后七年时间开成此渠,曾将妻子的金银首饰,开付工钱,债台高筑,几乎难以维生。

(八) 开挖三公渠。

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三同春应西公旗之聘,帮助开挖了一条“三公渠”。这条渠在西山咀东的黄河支流珊瑚河旁。珊瑚河区域西起西山咀,东到金巴图,东西一百二十里,南临黄河,北靠乌拉山,有二十里宽,过去名叫大中淮,面积一千八百平方里,可耕地有七千余顷,为乌拉特前、中、后三旗的公共之地。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绥远将军张绍曾,曾劝三旗报垦不同意,直至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才报垦丈放二千四百顷。原有“西公合少”、“史家”、“垦务”三条小渠,仅可灌田数百顷,对报垦的土地不足浇灌。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乌拉特三旗拟开新渠,特请王同

春为之指导。他几经勘察，提出建议：为了从珊瑚河引水入渠，必须跨珊瑚河建筑一座大坝，以举高水位。三公旗同意请王同春一并为之开渠筑坝。在初测渠路时，王同春与众议不同：众问何以不选某线开挖之故，答称下边有沙。众又问何以知之，答其地有蚁穴，蚁穴深不过数尺，则挖渠未深，必然出沙，渠便挖成，亦不牢固。众疑，掘地视之，果然应验。人多佩服王同春选择渠路之精细审慎与经验之丰富。“三公渠”挖成后，水流畅速，使用自如，受益非浅。

（九）疏通通济渠。

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西盟垦务督办姚仁山，鉴于通济渠（即老郭渠）容水不大，水流不畅，三邀王同春重新疏浚。他受命规划，组织民工新开了渠口，开挖了南梢，使全渠坡度通顺，利用黄河水力冲刷，拉通了全渠，省钱省工，整理一年，费银十三万两，工程告竣。是年腊月，王同春去包头他的牛犊渡过新岁。包头有李瑞符者，组织“风社”，拟引昆独龙河山洪灌田，知王同春善于治水，就便邀请他作指导。王同春生性爱好水利，乐助其成。为其测度一切，肇划周祥，引洪灌田甚多，受益很大。

(十) 协助规划长胜渠，根治塔布渠。

在本利上王同春还于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在创开“四大股渠”不久，有侯毛驷，郑和二人议修长胜渠，邀王同春为之计划。经他测度，选自塔布渠口西二里处开口，循天生壕、北大淖尔、吉尔蛮太、色楞开湾至东槐木止，开挖五十余里，三丈宽，五尺深，水流畅通。又于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王同春应塔布渠管理人侯应魁与田横二人之请，因塔布河历久淤澄，风沙侵塞，泄水不畅，灌溉失利。王同春为之根治：将渠口向上移动，东南向达拉图另劈三十余里长、六丈宽、五尺深的一道退水，送入纳林河，总长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二丈，合九十七里，先后分五段开成。使塔布渠增加溉田千余顷。塔布渠最早开成于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原名“五大股渠”，是后套十大干渠之祖范。

综上所述，王同春自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至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他去世为止的五十六年时间，独力创开了五条大干渠和二百七十多条支渠，与别人合力创开了三条大干渠，合计开渠费银一千三百五十余万两。凡是经他新开之渠无不进水通畅，灌溉自如，间有他人所开之渠进水不畅者，经他亲临指导或修理，辄

成畅流无阻。故后套民众称他为“独眼龙王”（因他一眼失明）。

《绥远通志稿》有一段文字曾记载说：“河套水利，至清朝同、光之际，后人所盛称开辟套地、谙悉水脉之王同春者，始至其地。而其先，已有川人郭敏修者凿渠放地于斯土，又有甄玉、侯应魁及郑、田、杨姓各地商步伍于后，至光绪中年，遂有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长胜、五大股等八大干渠之成功，而以王同春所开之渠为著，其尽力独多也。”

王同春开发水利的声誉不但传遍塞北，而且传闻于内地，国民党时期小学语文课本中尚编有《王同春开发河套》一课。

五、心力专注治水有方

王同春所以能够创建巨大的家业，他利用了河套黄河之天然资源，刻苦钻研水利事业，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他对开渠引水有浓厚的兴趣。从多年的躬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当时开挖渠道，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而是凭自己的眼力观察，每遇下雨天气，他就冒雨外出田野，观看雨水的流向，作他测量渠道的参考。有时夜间，命人在大地上疏落地点上几盏灯，他居高观望灯火的高低，以确定开渠路线。在确定

好开渠线路后，他就用十个柳编水斗，涂成白色，斗沿上各钉一丈多长的竹杆，自渠口起，每距十几丈远立一个白水斗，十个水斗立完后，随即站在第一个水斗南面，向北瞭望地形高低，以测定开渠的坡度和每一个竹杆底下应取土的深度，书于木签上，然后拨去竹杆，换插木签，竹杆又向前移，依次推进，直测至渠梢。从现在看，他的这套测量渠道的土办法极为落后，但却符合科学原理。一条渠道的创开，他对渠口的选择，非常慎重；从哪里开“迎水”渠口，从哪里开“倒迎水”渠口，他乘骑沿黄河岸勘察，充分利用进水的冲击作用而决定渠口，期达水流畅速的目的。凡经他测定的渠口，一般少有“吊口”或发生溃决的忧患。

王同春熟悉黄河的水性。他站在黄河岸边一瞭，能知“行河”之所在。有一年天旱，黄河水位很低，各渠道进不来水，农民们盼水焦急。他到黄河岸边巡视，见黄河水流起泡沫，他知道水要快涨了。回来见了农民吼喊说：“准备浇地哇，水快回来了。”第二天条条渠道果然水流滚滚。这是他善察物于机先，观变于隐微，随时随地留心事物的变化，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他对河套的地势与土壤了如指掌。在夜间，他驰骋于旷野，偶然不辨方向时，他随手抓起一把土，向灯

下一瞧，就知道行之所在。有一次，他随绥远建设厅秘书周颂尧下乡视察水利，走到某地，他指着一块地说：一尺下必有水。周不信，他立刻挖验，果然出水。周问其故，他说：你看地鼠穿的窟窿，翻起来的土是湿的，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据吗？

王同春办事精细谨慎，不怕履险。魄力过人，事不成功，不甘中止。每有大工程，他人咋舌，束手，退避不逞者，他都敢于承担，从容布置。每开一条渠，或高或低，或背或下，他都要预测于先，没有把握，不会盲干。他时常登高远眺，或骑马巡行，工程该怎么做，预期的效果如何，总要数度审视，确认可行，计划周详，方始动工。有时遇到水渠堵塞、水流不畅，他往往废寝忘食；低着头看，抬起头想，绕室踱转，日夜焦思。直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并加以解决之后。直觉得豁然贯通，上下通明；又表现为登高欢呼，临河跳跃，兴奋不已。

每开挖一条渠道，对于建筑渠口、桥梁、涵闸等三项技术性强的工程，王同春非常注意，率多躬亲现场指导。因为若渠口建筑不固，辄被黄河水冲毁，水就引不入渠；若闸箱修建不好，则无法调节水量；而桥梁建筑缺乏，就会阻碍交通。王同春对于这三项工程，在当时没有现

代建筑设备材料的情况下，就用他的土办法，充分利用河套取之不尽的芨芨、红柳、哈莫柴，搅拌红粘泥土作为建筑材料，一层一层地夯实建成。博得人们广泛传扬他为“上识天时，下熟地理，能预知河水之涨落，相度地势之高低”。当时曾有一首民歌唱道：“隆兴长有个“独眼龙”，其名就叫王同春，大家都称他老财主，开渠筑坝是河神，河套由他来开发，五谷丰登享太平，若非禹王再重生，那有这样的光景。”到他谢世后，人们把他加以神化，说他是“龙的化身”，作为河神把他供奉起来。每遇河水大涨决口成灾，或者遇到干旱缺水之际，人民就到河口“放河灯”，祈祷默佑。“放河灯”就是用蜜腊把底儿烫出来的纸船、纸灯，晚上点着纸灯里的小蜡，放入河渠里任水漂流，在放河灯的起点处，请和尚、僧尼鸣锣击鼓，念经祝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

王同春虽然家资万贯，可以说是河套最大的地主。他自十五岁到七十四岁的六十年间，每日鸡鸣即起，晚上睡得很迟。每天必然乘马出外，巡视渠地，六十年如一日，平均日行在百里之外。一年之中，除了过大年初一外，均不休息。到了腊月三十才回家，过了大年初二就要在住处附近视察渠道和土地，不知端阳与中秋。行路皆走荒

野，不走大路，乃利用时间，就便观察土地的耕作质量和渠道水利的实施情形。因而他对旷野之高低，田地之土壤，宜种什么农作，他都了如指掌。

六、巨大的家业

水利振兴，带来了他的家业亦随之大盛。王同春每开挖一条渠道的同时，就设法从蒙旗王爷或召庙喇嘛手中包租大片土地，灌溉以后，除自己建立公中牛犊耕种以外，把大量土地转租给别人耕种，他则坐收地租和水费，以此积聚了大量财富。在他新开挖的水渠灌域内，全盛时期，垦殖荒地二万七千余顷，耕种熟田八千六百余顷。他的渠地分布，广至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和伊盟达拉、杭锦两旗的广大地区。为了便于耕种管理，他组织了二十八个公中，计有同兴堂、同兴德、同兴东、同兴西、同兴泉、同兴公、同义德、同义隆、义和、义昌、万和长、长胜、协成、义和久、石兰计、留宝公中，黄脑楼、合少公中、梅令庙、乌兰脑包、北圪堵、广盛西、新公中、东牛犊、西牛犊、南牛犊、北牛犊等，另还建立了七十多个牛犊。各公中、牛犊每年雇用长短工千余人，为他种地的佃户有几万人。年收粮食二十三万余石，以每石三百斤计，约合七千多

万斤。还年收地租银子十七万余两，约合银洋二十万元。饲养耕牛一千余头，场牛二千一百余头，骡马一千七百余匹，羊十二万二千余只，骆驼五百多峰。为了向外地运售粮食，还建造木船一百余艘，牛马大车二百余辆。他拥有的财产几乎无法统计。在当时河套地区他的家业之大，没有人能和他比得上。真是田连阡陌，财发万金，家大业大，骡马成群。

七、扩展土地的手段

王同春以一个赤腿穷汉来河套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如此庞大的地主庄园。这些财富之积累，是来源于对广大蒙汉人民的血汗剥削，王同春掠夺土地发财致富手段主要有下面三种：

第一是勾结拉拢蒙旗王公和召庙喇嘛，用少量的代价，换取蒙古人民的大块牧场，然后以高租金出租。当时蒙族上层统治者养尊处优，除了自己挥霍享受外，还要搜刮大量财宝向清廷进贡，其财源端赖放地收租。过去有一句话说：

“蒙利汉租，汉利蒙地。”说明了后套蒙地私垦私放的情况。王同春就是利用蒙旗王公的这个特性，给蒙旗上层统治者纳贡施惠，租来大片土地，招揽内地人民为自己开渠耕种，剥削地租、水费。民国初年，伊盟副盟长兼达拉特旗王爷逊

博尔巴图，因为得到袁世凯的宠遇，更加跋扈，他为想得到封王（民初仍沿用清朝封王旧制）和当盟长的愿望，竭力给袁世凯献宝进贡。为了筹措资金，他用低押，借款办法，把大片肥沃的牧场、草原卖给王同春。逊王因为得到王同春的大力帮忙，和王同春磕头结拜，成了肺腑之交。逊王的儿子又和王同春的三儿王英结拜为盟兄弟，这样，逊王对王同春言听计从，王同春进达拉特旗王府如同进自己的家门。这是王同春扩展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二是兼并其他地主商人的土地。当时五原地方东起包头，西到磴口，北抵阴山，南跨黄河，东西六七百里，南北一二百里，这么广阔的地域，统归萨拉齐厅署领，套内没有司法行政衙门。由于清朝政府在河套的统治力鞭长莫及，因而包占大量土地的地主商人，为了抗衡争雄求发展，都拥有自卫武力，强者田土渐辟，日臻豪富，弱者土地被蚕食，终至灭亡。而王同春是当时的强者，他和另一些强者相往来，能利用的多方面拉拢，如对郭敏修，始则结拜为把兄弟，继又结为姻亲，对张振达亦然，使这两家的土地渐次转移到他的手中。而对强者陈锦秀，王同春为了展渠扩地，则施展手段把他杀掉。

第三是兼营商业，牟取高利。王同春对于开

渠工人，虽然以挖掘土方为单位计发工银，但是春夏做了工，到了秋冬，渠地有了收益才给发工钱，而且当时多给发货银。所谓“货银”就是把茶布水烟糖盐等商品，提高售价，发给工人顶工钱。这些商品并不是他用现钱买来的，多数是从内地来套的商旅（时称边商）手中赊取的，他完全是空中取水，转手牟利。另外每遇灾年王同春把粮食运到缺粮的地方，一方面高价出售，一方面换回后套需要的商品，从中渔利。下面用几个具体事例说明王同春是怎样向蒙旗上层掠夺土地，杀死陈四，利用灾民发财致富的。

八、与蒙旗上层的冲突

公元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有达拉特旗台吉秦斯，鉴于来垦的汉人日多，草原日缩，将有碍于蒙人牲畜放牧，联合达拉、杭锦诸旗三四百蒙人，以“杀亨子”为号召，共起驱逐汉人。蒙人始据“老郭渠”以东的诸牛渠，郭商人组织家丁与之抗御，然以众寡悬殊，终不能胜。蒙人乘胜西进，逼近隆兴长，意在逼王同春去。他们以为王同春一走，汉人之势力自消。其后，蒙人袭占了王同春的和合元公中（亦称公义社）。蒙人之势既盛，汉人皆惴惴不安，相继逃避。西山咀为汉人回内地的必经之路，被蒙人扼守，汉人

惧不敢过。陆路既阻，汉人则另谋从河上逃。时有满载老弱妇孺的两艘木船顺流东驶，航行到马七渡口，为蒙人所觉。他们以为船上有王同春，乃击翻了船只，使逃难的两船老弱妇孺死于非命。这时聚集的蒙人多至六七百人，黄河北岸东西二百里之地，皆为所据。大余太西边的乌梁素海四周之地亦为所占。

王同春与郭、李、常、贺、史、曹等六家地商人共谋抵抗。乃邀集壮士百二十人，公推王同春指挥力战，互有胜败，和合元公义社几度得而复失。时虽临近年关，蒙人仍集聚不散。王同春使用诡计先于和合元公义社厚积酒肉米面，并用哈莫、芨芨围筑院墙，底层又铺上葫麻秸穗。蒙人又至，王同春率众佯作逃状，虚室以待。蒙人误认为王同春遁，乃人卸枪，马摘鞍，在室内美酒佳肴，大吃大喝起来。入夜，满天乌云，狂风大作，王同春遣壮士围袭。事觉，蒙人还击，王同春的妹丈陈喜全中弹死。其妹丈身体魁梧，壮士们昏夜莫辨，咸以为王同春死，各无斗志。王同春从后复至，释众疑，奋战如故。王同春会壮士纵火，院墙薪柴顿时炽烈。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熊熊烈焰，直冲云天，滚滚浓烟，铺地盖天。院墙只留一个豁口，还派人把守。经此突袭，蒙人惊慌失措，东奔西突不得出，大败。足

役，郭家死二人，曹家死一人，王同春死四人，蒙人死十一人，被俘者三十人，其中有三个台吉喇嘛。秦斯脱险，跑到乌梁素海的西河畔村，仍谋伺机袭杀王同春，以再驱逐汉人。王同春收复公义社后，取蒙人尸俱投之于河，以毁尸灭迹。秦斯亦知势不可为，遣人求和，称此后不再仇逐汉人。王同春见其罢兵言和，允其请，全释被俘的蒙人。事后，台吉秦斯终不甘心，联合达、杭两旗王公控诉到陕北榆林道。那时五原尚未设治，所有重要的诉讼案件统归相邻的府州道县兼理。榆林道传案审理，王同春被捕。神道林派吏检验，但见汉人尸一一俱在，蒙人尸不得一见，颇疑蒙人误控。但蒙人苦诉不已，纠纷三年不解。先前火烧公义社俘获的蒙人中有三个台吉喇嘛被王同春收买串通。其中一个出庭作现场人证说：公义社的火患发生，是因社里的人不慎失火造成的，并非别人唆使放火，我们还是王同春路过着人救出的。榆林道田道台对这一案再三审讯，并装腔作势地进行过刑讯，王同春始终没有招认。最后田道台被王同春贿赂买通，依据台吉喇嘛这个人的假证，判定火不是王同春放的，宣告王同春无罪。结案后王同春回到五原，为台吉喇嘛出资在五原城南的沙呼尔庙又修了一座庙宇，并拨给膳召地。田道台后来卸任赋闲，来五

原投奔王同春，王赠给土地两处，即后世所谓的“田大人地”（在今五原东南），两处土地共二十余顷，以酬报对自己徇情枉法的孝敬。

台吉秦斯未能使王同春死于罪行，乃生暗杀之心。有一天，王同春西去刚目河视察，为秦斯的侦骑所觉。蒙人潜伏于途，欲待王同春归途捕杀。时与王同春同行者四人，归行至灶河渠时，忽有汉人来告，谓前边有蒙人设伏。王同春仓猝无备，遁避不及，急分四人为两队布疑：一队之二人伏于路南，故露其迹；另一队之二人藏在路北，两队都赖红柳芨芄林作隐蔽。蒙伏见王同春觉，操刀凶凶俱来，但又见路南藏有人迹，疑为王同春，急往追捕。二人赖红柳、芨芄之掩护，往来穿行，追捕不住。王同春寻机，偕二人逃抵隆兴长家中，急派十余家丁往迎那两个人。这两个人被蒙人围困，往来穿匿于红柳林内。派来之人寻觅不见，焦急万分。待到第三日相遇，相偕回来。二家丁虽免于死，然遍体被红柳刺伤，疼痛难忍，且为饥寒交迫，险乎损命。

又一日，王同春西行视察。途中复为秦斯所差的蒙人侦知，率众亲追。王同春单骑不能抵抗，但又逃避不得。正在危急之际，纵马跳入黄河，赖马子浮水上行，王同春引缰以行，须臾渡过南岸，得免于难。似此情状，王同春害怕终为

秦斯所图，暂回故里。在那台住了一段时间，偕何、赵两个武术家复返河套。行至包头，遣人四出侦探秦斯的行踪。时有汉人安某，住西山营子西槐木村，这户人家的女人是寡妇，秦斯常到其家。王同春侦知后，急与何、赵二人日夜兼程赶到槐木村。秦斯正在安寡妇家吞云吐雾地抽大烟，其随从护卫分住于两厢房休息。王同春入秦斯室出刀以示，秦斯惊惧不敢动，何、赵二人亦严守两厢门户，秦斯的随从亦不敢动。王同春谓秦斯曰：你挟嫌忌妒屡欲寻杀于我，吾今至，其耐我何？秦斯唯唯。王同春遂将秦斯捆绑，并与何赵二人共夺秦斯随从的武器。时来会的汉人渐众，势益壮。秦斯见已势劣，邀请安寡妇调解，但求不死，余无不从。王同春为服其心，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具结不再仇视汉人；第二，离开后套，远去外蒙。秦斯应允，遂被开释。第二天，秦斯果然率众走了。

九、用“跑马里”哄骗蒙人

公元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王同春在郭商人的推荐下结识了乌拉特左旗的王爷。为占土地，他经常带上烧酒、炒米、砖茶、哈达等礼物给王爷上门进贡，博得王爷的欢心。一天，在酒宴

席前，趁着王爷酒兴，要求王爷给他租拨一段土地，王爷欣然答应，命王府总管议拨。王同春又向总管送了礼物，要求总管先拨土地，后议租银，总管受了厚礼，碍难不从，只好方便。于是王同春和总管并驾齐驱，奔驰荒野，划拨土地。茫茫草原，一望无边，总管提议要按里程远近折算地亩。王同春说：按里程计算倒也可以，但是没有一个是标准不好合算。咱们走马计量，马步一停就算一里。总管同意，两人骑马步量，遥指方向，给王同春划拨了土地。在野外指拨了土地后，回到王府写了文约。如此，一百亩土地说成三二亩，使大片荒地成了他的永租私田。双方议定租银时，原定用马牛羊、酒茶炒米等实物折成“货银”抵租，头一年按时按数交了。到了第二年，王同春派其家丁仅给王爷府送去一百斤白酒，二十四块砖茶，五石炒米，就哭穷不交了。王爷很不高兴，再三要王同春去谈，但是王同春地契文约到手，拨到了土地，欺蒙人诚实守信，无由反悔，竟置之不理。过去后套有“跑马里”的谚语，缘由就是这样来的。

十、与陈锦秀争霸

王同春与陈锦秀争斗的故事，过去后套人民妇孺皆知，广为流传。老年人们回忆，陈锦秀比

王同春来套早几年，王同春早年曾为郭商人争水放坝结下前怨（见第三章）。他们两家又在光绪初年，因为争夺同和渠口处（即后来之义和渠）吉尔蛋太一段渠地，计渠长一千六百九十丈，土地二百余顷，各不相让。平时在用水上，陈居上游往往刁难，常起磨擦，动辄用武格斗，互有伤亡。为此事，陈锦秀上控于萨拉齐厅，捕王入狱。当时的抚民同知文钧，觉得械斗之事双方都有责任，且为后套之通情，不应独拘王同春一人受此偏苦，遂放了王同春。陈不服，迭经上诉，竟使文钧被革职赋闲。文钧无子，赋闲后寓居于绥远，有一天，外边忽然来了十几个大汉，将文架抬急去。文亦莫明其妙，后才知道是王同春派人来接他的。到了王家，王同春跪下说：文大人主持公道，判我无罪，是重生我的父母恩人，你没有儿子，我就是你的儿子，此后王同春果然奉养文钧到老。

陈锦秀没有告倒王同春，满心忌恨，两家争水霸地的冲突，时有发生，因而怨隙越结越深。当时王同春的打手多，武技好，势盛力强。特别是从少林寺来了李家弟兄辅佐，与陈锦秀在多次的争水格斗中，王同春多能取胜。陈锦秀为了报复王同春，请来了同乡刘天佑作“把式匠”（即打手）的头领。又采纳了刘天佑的建议：凡是与

王同春械斗取胜的打手，奖赏一石至两石糜子；又通过达木架（蒙族），以重金雇请了几位蒙古人当打手。常言道：重赏有勇夫。陈锦秀自从有了刘天佑等人的拼死效力，和王同春争水抢地的械斗，使自己由弱者变成了强者。

王同春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与陈锦秀争水械斗失利后，浇水受到上游陈锦秀的严格控制。他的北牛渠、东牛渠、南牛渠是他发财的根本，青苗旱的要死，又且王同春要开挖恒和渠（亦叫烂大渠后名沙河渠），在渠口处要占陈锦秀的土地，均因陈锦秀掣肘阻挠，不能动工。王同春亲到陈锦秀的公中（锦秀堂）跟陈说好话，陈锦秀表面上答应得很好，实际上自己浇完青苗放空地，仍不给下游放水，也不让王同春占地开渠。王同春受不了陈锦秀“卡脖子”的恶气，横生了害陈之心。他一面请少林寺来的李家兄弟作教练，加紧训练打手；一面通过他的工人刘某，找其兄刘老先，让其拉拢刘天佑，许下大愿说：请刘天佑来王家当教头，愿挑一名美貌的丫环给作妻子。但是刘天佑没有理睬，使王同春碰了钉子。王同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设下了“鸿门宴”。

有一天晚上，王同春摆下酒席，邀请几个心腹打手吃喝。王同春愁眉苦脸地请众人为他设想

制服陈锦秀的对策。杜福元和高五羊附耳如此这般地出谋献策，顿时王同春有了主意。席罢，王同春高兴地对高五羊说：你给我办成这件大事，我在赫造桥偿你好地二十顷，决不失信。高五羊满口答应，表示坚决完成。乃于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王同春让杜福元分头下达请贴，请地方上的商绅人士到他的和合元公中吃饭。陈锦秀也是被请之一，其中还请萨拉齐厅设在大念太的杨哨官。陈锦秀接到请贴后，思谋去好还是不去好，跟刘天佑等人商量了一番。刘天佑说：你们陈王两家交恶多年，仇深似海，还是不去为好。陈锦秀说：那我就不要去。不料王同春二次派人亲请，说话谦和诚恳，打动了陈锦秀的心。他思谋：我今天如若不去赴宴，惹人笑我气量狭小。随即吩咐手下人备车赴宴。行前刘天佑出外干活不在，只带了少数打手护卫而去。

王同春家的人为了表示诚心敬客，都穿上新衣裳，斟酒劝酒，招待的热情周到。随陈锦秀来的护卫与车倌等人个个饮得酩酊大醉，精神不能自持。席间，王同春借助酒兴，向陈锦秀提出开渠占地和尔后用水均利的事情，陈词恳切，态度和乎。众绅商亦从旁劝解，希图言和息争。陈锦秀不肯让步，坚持要王同春献出南牛惧的田产，以作交换补偿。王同春不肯，两个鲁莽人物粗言难

解，事态闹僵。已到黄昏时分，王家大院还是“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陈锦秀当年当过清军，参加过平定“回乱”的战争，有警惕性，觉得这个宴是“金沙滩”的宴，不是好宴。不敢久留，提出他要先走。王同春说：天已晚了，地方上很不安静，你带的护从不多，路上一旦出了事情，我可担当不起。说话间，又端来一道好菜，挽留陈锦秀又饮了几杯，并请抽了一阵大烟。已到昏黑天气，席还未散，又采了几个生疏客人，陈锦秀离席要走。王同春说：恭敬不如遵命。遂吩咐自己的打手说：怕路上碰上歹徒出事，你们多去几个人，护送陈爷回府。众人称“是”。陈锦秀连声道谢，坐上轿车子向锦秀堂大路驶去。

不料车行到郝进桥西沙窝茆苕林内，突然闯出几个彪形大汉，抹了一脸黑灰，挡住了去路。为中两个大汉把陈锦秀一把拉到茆苕林内，用尖刃锋利的竹筒子，拧进陈的双眼眶内剜出一双眼睛。随陈护卫的打手因喝酒过量，浑身无力，抵御不住。及至发现陈的眼睛被剜，惊吓一跳，但剜眼人已逃之夭夭了。不多一阵，忽然王同春手下的人，慌慌张张回到和合元公中报告说：大事不好了！陈爷的眼睛被贼人给剜了！这时其他采宴的客人尚未离席。王同春一听，拍案而起，怒形于色地大骂：你们真是饭桶！为什么不

加小心？赶快追捕凶犯，迅速破案。陈锦秀虽然双眼被刺，神志尚清。吩咐随从把眼睛包扎好，复返和合元的王同春公中。

一进王家的公中大院，陈锦秀大骂王同春是预谋所为。王同春好言安慰，惋惜的说：眼前套内，到处土匪猖獗，强盗不法横行，这是匪徒劫财害命干的，我王某岂能做此伤天害理的事情！陈锦秀养伤要紧，暂不理睬，遂吩咐手下人全住在王家大院不回去了。次日，刘天佑探得消息，愤慨不平，急率打手多人，来到和合元大闹王府，据理力争。王同春深知陈锦秀不是好惹的硬汉，乃邀请众地商人说情。时有隆兴长的掌柜郭向荣，声望很高，是地方上的权威。经郭居间调停，议定王同春每年给陈锦秀补偿五十石小麦，好马五匹，一直到陈死去为止。王同春在议定文约上划了押，后来也就按时付给。自从刺眼事件发生后，陈锦秀一气之下，对王同春开渠引水越发卡脖子，磨楞子，比前更加厉害。多年来，一方用水，一方堵坝，一方挖渠，一方填渠。王同春前边挖开，陈锦秀随后派人用芨芨哈莫柴拌土给填塞，两家仇怨越结越深。

事过十年，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天大旱，黄河水位低，王同春各牛犊的庄稼歉收。他又且感到陈锦秀终是一个祸根。有一天，

王同春见到陈锦秀说：我有二十四个公中牛犊，雇用工人有万把人，甭说吃粮一项，一天咸盐也得吃它一石多。今年天大旱，收成不好，请你减缓说下的补偿吧。他话还没说完，便遭到陈锦秀一阵痛骂说：“你亲口说下的东西又想赖账不给，你陈爷也要派人剜你的眼”。特别是陈锦秀在骂词中揭了王同春的短说：“你害死达拉特旗王爷府催讨租税的两名蒙兵的罪行，你能瞒哄过我？”这下触痛了王同春的神经，使他十分害怕。这就促使王同春横生杀陈之心。

王同春随即用加倍工钱的手法，收买给陈锦秀做工的一个人来给他家劳动，从这人的口中了解到陈锦秀内居的出入路径及生活习惯，再把自己信得过的打手长工赵某，设下“苦肉计”，张扬以赵某人犯了什么规矩，一打二开，让他假投降。陈锦秀见赵某负屈来投，不察是诈，信以为诚，留在自己身边作了护身武士，日夜辛勤地服侍他抽大烟。王同春这时候又以八百两白银收买了退役的一名湘勇李星全，外号人称李大旗。此人精于武术，约以杀死陈锦秀领赏。他把事情办得有了把握之后，于同年腊月二十六日由杜福元护卫，骑上他的“神骡子”先去了包头。这边嘱咐由他的族叔王鸿兴如期行事。

腊月三十除夕晚上，陈锦秀打发家兵全部回

家守岁过大年，单留下王同春打进来的赵某人陪他吸鸦片。夜深人静，王同春的族叔王鸿兴带领李大旗、崔义长、楞有成、赵三对、二蛮子等八十余人，由拉出来的陈锦秀那个长工作响导，直奔陈锦秀的土城子公中。到达后，诈称垦务局诸员弁路过打尖，里有内应，进了大院，先打死了下夜的。陈锦秀的六叔也会武术，所有动静，提了一根白腊杆子，急从大伙房出院。一见一群黑压压的人，不敢对阵，翻墙就跑。陈锦秀听见外边有了响动，急呼其妻给他寻找武器。陈妻身体高胖，心慌意乱，掀开大红躺柜弯腰摸寻枪弹。钻进半截身子被柜口夹住出不来。旁边站的儿子着了急，急忙把她拉出来。陈锦秀焦慌难耐，由姓赵的那个护卫搀扶，夺门而出，李大旗、崔义长从屋上跃下，出匕首刺入陈颈，后来持陈两足，抡之数棍而死。崔义长杀陈有功，王同春后在隆兴长西雨奖偿了土地，后来人称此地为“义昌圪堵”。

陈锦秀的妻子已认出杀夫的凶手是王同春公中的人。第二天，急忙打发家人去五原厅告状。五原厅当时在包头镇，王同春得讯，四处扬言说：大年初一早晨，我还在包头拜年，两地相距四百多里，难道我年三十晚上作了案会飞不成？衙门官吏一听，推详合乎常情，不可能夜间作了

案，一夜之间就能到达包头，乃吊案没有理问。后来民众编了几句顺口溜说：瞎进财（指王同春）打死个瞎陈四（即陈锦秀），事是个事，淡求是。五原县景阳林公社社员李四保的妻子，是陈锦秀的小女儿，一九六四年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陈锦秀死的那年出生，她长大听他哥哥说过他父亲的死因。一九六四年作过回忆，别人为之记录，整理成文，笔者抄写复制一份，附于本文稿之后，以为佐证。

《绥远通志稿》对此史实记载说：“光绪二十九年，王之客谋出陈不意杀之。十二月除夕，王之护庄者李星全八十余人持砍刀、老福枪等往攻陈氏。时陈以年关无事，安然祝岁，不事戒备。夜二更，李率八十人至陈庄前扣门，诈称垦务局诸员弁路过打尖（街），既入。陈闻人声沸涌，持手枪自室中出，屋上数人跃下，出匕首刺入陈颈。陈被创倒地，但尚能开枪击杀来者，中其要害。后来者持陈两足，捩之数转，陈死。继而陈之家人诉于萨拉齐厅，李星全等赴厅服罪，萨拉齐厅置之狱”。阅此史料，陈锦秀是被王同春谋杀的。

王同春与陈锦秀霸争的史实，距今已一百多年，一些老年人们传说中还有：当王同春计设“鸿门宴”，委其心腹高五羊趁陈酒醉返家之际，剗

瞎了陈锦秀的眼睛。待事件暂时平息后，高五羊要王同春在郝进桥兑现他的诺言。王同春约定某日去郝进桥拨地。那天，王同春事先在郝进桥埋伏打手数人，趁高五羊认地走去，猛不防被伏凶一锹劈死埋于沙丘。王同春怕剜眼事件一旦败露，才对高五羊下了毒手，以期杀人灭口。杀死陈锦秀，河套东部就成了王同春的一统天下，没人敢与他抗争。

十一、利用灾民发家致富。

光绪十七、八年(公元一八九一、九二年)，我国北方数省，连年遭受特大的旱灾，晋冀陕绥等省田禾无收，草根树皮皆为灾民食尽。据《萨拉齐县志》记载：“广盛魁，明安川一带，逃至饥民日众，求食不得，饿殍遍野，纵横道路，为状至惨，鬻妻卖子，比比皆是。萨拉齐厅少壮逃散，老弱饿死者大半，厅令掘大坑埋之，俗名曰“万人坑”。又说：“光绪十八年，归绥道七厅及蒙旗大饥，赤地千里，死者枕籍，野无青草，有食人肉者。”在这遍地灾荒的情况下，“惟有后套一带，赖有水渠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人们在这严重旱魔的威胁下，这时的河套，就成了灾区人民理想的乐园，于是“来套就食者，如水之赴壑。”广大人民携儿带女，背负

肩挑，源源进入河套。据《五原厅志略》和《临河县志—五原乡绅王同春行状》记载：“光绪十八年聚集在隆兴长一带的灾民就达四五万人。”时王同春的家业正在鼎盛时期，粮食丰收，食满囤积。面对着饥饿的人群，王同春决定放粮施赈，并利用灾民挖渠。时王同春的公中，住一位姓洪的客人，为人精明审慎，就委他经理施赈事情。洪某以“四大股庙”为放赈总地，举办了数十个粥厂，备氈作幕，分列两行，作街市状，每幕容住十余人，男女有别，准备了百余口大铁锅，米薪俱自各牛渠源源送来，每日提供两顿饱饭，向灾民救济放饭。先后赈粮三万余石，使灾民渡过冬期。春暖解冻后，这些灾民有的返回家乡；有的给王同春开挖沙河渠和义和渠东北大梢；有的就在此地住下来租种王同春的土地。据五原县退休干部李茂春回忆，他的祖父就是在那时候从陕北府谷逃荒来套，在“四大股庙”吃救灾饭后，受王同春雇用，在五原西边的厂汉淖尔租借了王同春的籽种和牛渠，租种了王的土地。又如五原城关乡的“十二牛渠村”也是那时候从河曲逃荒来的十二个人，租种王同春北牛渠的土地，后来立户十二家，年年春来秋回，以故名“十二牛渠村。”

在大荒之年的光绪十八年，王同春运销于晋

北、陕北各府州县二万五千多石粮食。这一年北京也是苦旱，王同春还向北京捐输粮米一万余石。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晋绥、陕北地区又遭荒旱，逃来后套求生的灾民甚多，王同春再行开仓济民，获生者数万人，留下身强力壮者给他开渠垦田。这一年王同春又向山西各地运售粮食一万二千余石，向北京售粮六千余石。这年伊盟也是大旱，王同春运售于鄂托克旗粮食七千石，换成皮毛到包头销售。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王同春给清政府，由绥远兵备道运到太原粮食六千石。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又曾卖给山东移民粮食一千石，由绥远垦务局付了粮款。王同春向灾区运去粮食，卖了粮，得了钱，发了财；利用灾民挖渠种地，又得到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为发展他的家业打下基础。当时河套民间流传一首民歌：“提起光绪十八年，怎不叫人泪涟涟！遍地遭灾成年馑，饿死黎民有万千，惟有后套大丰收，隆兴长可称乐桃园，扶老携幼进后套，想要逃生出了关，风雪大亲肚子饿，‘四大殿庙’把身安，王同春就是瞎进财，假装善人放了饭。放饭是放饭，男女老少挖大干（干渠），老汉病死在渠背上，老婆围着帐棚转，后生有病不停工，闺女抢去当丫环，后悔

不该进后套，没有天灾有人患，一家人儿尽拆散。”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十二、生财之道

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王同春伙同甄玉、侯应魁等人，集股重新开设了原来由郭向荣创立、后来歇业的“隆兴长”商号。商号开张以来买卖兴隆，财源茂盛，后来把侯应魁排挤出股，由王同春独占。“隆兴长”商号还附设油坊、粉坊、酒坊、炒米坊、碾磨坊、皮毛作坊。这个商号对于蒙汉人民的剥削，手段翻新，花样繁多。利用茶、布、水烟、糖，骗换蒙人的牛、马、骆驼、羊。一块“三九”茶换一头牛，一块“二四”茶换一峰骆驼，一包水烟换一只羊，一门扇板糜子换一门扇板咸盐，一升大辣椒子换一升盐。用炒米白面换蒙人的牲畜时，说定斤两和头数后，故意把山药、萝卜说成什么“宝贝”，哄骗蒙人把山药萝卜装在口袋里，再装一些白面炒米过秤。结果用相当数量的山药萝卜顶了白面炒米。和汉人交易时，一匹“四八”土布换两石小麦，一石葫麻换十到十五斤葫油，一石糜子换十到十五斤烧酒。一个烟咀子向后草地蒙人换一只羊，一个“鼻烟壶”换一头牛，一块砖茶换十斤驼毛，五斤炒米换一张羊皮，一套皮绳线换两

张牛皮。

农民种他的土地先交钱后种地。浇地时先交水费后浇田。他向豪绅包地时十成按三成算，给佃农放地时丈一言算一亩。佃户给他交地租时给一只羊折合五钱银子，反过来工人向他买肉吃，一斤羊肉算一钱银子。给工人开支工钱时，水烟买价十二板子八钱银子，转手卖给工人时，一板子水烟算一钱六银子。春夏青黄不接时农民向他“买树梢”（借粮），春天借他一石糜子，麦收下来还他二石五斗小麦。农民遇到婚、丧、嫁、娶，都要向他借钱，他虚情假意地说：“你借钱还不是买东西吗？咱‘隆兴长’要啥有啥，取上用吧”。用货物顶现款，春借一元钱，秋还一元二，取的货物还算上贵价钱。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修建五原城（旧城），王同春包揽了修城工程。他招雇了三百多名修城工人，交给一个郝工头施工，费了一年多时间修成，城墙式样取照于萨拉齐县城。为了克扣工人的工资，他收买郝工头让他躲到河西王爱召，扬言郝工头领了工钱逃跑了。用这一招，坑骗了三千多两工银。（五原城郊郝工头圪堵就是郝工头住过的地方。）后被工人们向绥远新任都统潘矩楹告发，潘都统也想捞王同春的油水，将他拘捕审讯。王同春搬动北京农商部张謇（李

直)总长说情,通过袁世凯总统下令开释。

十三、“把式匠一家兵”和残酷的刑律

“上后套,后套好,后套养畜不用草,庄稼不靠天雨能长好,穷人揽工受苦也能过得了。”这是清末民初内地人民“走西口”谋生流唱的民歌。连年灾荒从内地来依附王同春的人越来越多,在他的公中、牛棚种地的人已达数万人众,尤以直、鲁、豫三省的贫民最多。为了保护他的公中和牛棚上的财产,王同春物选了一批会武术的人,专练拳术械斗技击之能事,拥武自卫,名为“把式匠”一家兵,防御扰害他的敌人,以发展他的垦业。后人说他“蓄武士,招流亡,与人械斗,视他为凶狠残暴”等议论,就是这样地流传下来的。

河套老年人回忆说,王同春为了维护他的牛棚、公中的秩序,保卫垦业,自订了四条残酷的刑律。凡是犯了他的规矩的人,就受到严厉的处罚。这四条刑律是:一曰“下饺子”。是把“犯人”装进口袋,扔到河里;二曰“住顶棚”。是冬天河水冰冻,打开一洞,捉来“不守本分”的人,扔进冰窟;三曰“吃麻花”。是把牛皮筋晒干,拧成一条麻花似的“牛皮鞭”,一鞭一血地抽打犯了规矩的人;四曰:“喂蚊子”,到了夏天夜晚,把捉来的“犯人”捆住手脚,扔到荒

野，让蚊子咬。据说被他处死的共有三千余人。在河套民间广为流传一首民谣：“……瞎进财就是王同春，他在后套称英雄，养活的打手无其数，公中土地数不清，有人进套把地种，老财主名下献殷勤，只要你听他的话，要啥给啥不放空，谁要不听他的话，叫你一命见阎君。补隆淖以东他为王，蒙古人说起他来也头痛。”

十四、引清军镇压刘天佑起义

刘天佑曾给陈锦秀当过“把式匠”，又是同乡，随陈有年。为人性豪爽，讲义气，对王同春谋杀陈锦秀的罪行，奇冤难伸而恨积满胸，愤愤不平。他为了给陈锦秀报仇，在五原张大柜地方聚众“造反”。起初，人数不多，用大刀长矛作武器，除暴安良，打富济贫，震动了乡里。封建统治者和地方上的绅商以王同春为首，申报蒙旗王公悬示重赏，缉捕刘天佑。刘看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乃邀集好友达木架（蒙古族）、刘老先、吴凤魁、曹占魁、谭木匠等七人结拜为“把兄弟”，公举刘天佑为首领，分头串联起百十多名穷苦百姓举事造反，时值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正月。他们议定了行动口号三条：专打王同春，不刁老百姓，保护小商人。第一次出马火烧了王同春的西牛圈，第二次又烧了王同春的南牛圈，不几

天，又抢了王同春的义昌、和合元公中，并赶走了驻守于和合元的二十八名蒙古兵，捉了其中三人（后又放了）。王同春联络郭、李、刘等地主商人，组织起百十多人家丁打手围剿。由于刘天佑的声势日大，正月底驻套的垦务局卫队也投入了围剿刘天佑的战斗。

刘天佑眼见官府与地商人的武装联成一体对付他，乃改变了原来“专打王同春”的口号，于二月二十八日抢掠了黄脑楼的郭商人和白柜的刘保公中。三月初二又打到天吉太桥和公惠成，抢了税务厅，并占据了垦务局，绑架了垦务官员。刘天佑和众头领及义士们说：“人心齐，泰山移。咱们反到朝廷的皇上头上去吧”。众皆响应，于是改变战斗口号为：“专杀恶霸豪绅，保护黎民百姓，打倒大满清”。刘天佑的造反壮举得到民众的竭诚拥护，声势远扬，军威大振。不久，队伍扩展到三百多人，又与宁夏的造反义军首领耿大王和李四军门取得联系，合成联军，队伍壮大到六百多人。

起义的刘天佑队伍在狼山湾与清军谭永发的四骑马队遭遇，刘天佑跃入敌阵，西突东冲，白刃拚搏，奋不顾身，激励全体义士英勇斃杀，向前猛冲，激战获胜。此役，缴获了一批清军的新式武器，打死清军哨官十余人，士兵百余人，吓

破敌胆，军威大振。起义军在狼山湾战败清军后，乘胜东进到距包头不远的中滩邓家营，威胁包头的清军一日数惊，人心惶恐，紧闭了城门，并震撼了绥远省城。后套地方的各地商人纷纷跑到包头城内避难，逢人便说“乱了套啦”。

驻在包头的五原厅同知姚学镜，一天三次地向省城告急，请求绥远将军赶快派兵。王同春也跑到绥远将军衙门活动，请求派兵围剿义军。刘天佑的队伍东进时，令一支队伍西指，占到了宁夏交界，整个后套地方均被义军占领。唯有隆兴长一地、因为由达拉、杭锦和东、西公旗王爷府的旗兵驻守，刘天佑为避免引起蒙汉间的磨擦纠纷，而且刘部中又有蒙族达木架为头领及数十名蒙古义士，有意识的放过没打。

那时候的绥远地方归辖于山西。绥远将军贻谷闻报刘天佑的造反队伍势力日盛，急报山西太原府台张曾敬，命令大同总兵孔庆堂和口外镇备军统领陈政诗等将领，统率省城常备军与续备军清剿义军。在强大的清军进击下，刘天佑率部转战于隆兴长以西各地，指挥部设在狼山湾西北的阿拉善族大滩（又名中军滩），据守着一个古城堡与官军对抗。清军的指挥部设在大余太，指挥出击义军。时值夏季，套内到处是蔽天漫野的红柳芨芨林。刘天佑的队伍凭恃人地两熟的有利条

件，加上河渠阻碍，清军多数不会浮水，而刘天佑的队伍都是后套土生土长，浮水若履平地，一根独木桥，刘军过之甚易，清军渡之甚难。因而清军虽然强大，不时遭到义军的阻击、伏击，使清军到处受挫、伤亡很大。绥远将军据报，又增援若干清军，并附有几门直筒子大炮，还通令驻宁夏的清兵与榆林镇台田正凯的队伍一同合击义军。清军总达五千余人。

刘天佑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地抗击清军。直到秋末冬初。归绥道台“扑寿大人”与在套的清军首领搞了一个和谈诱降骗局。几次致书刘天佑，要求“停战议和”。劝降书说：“只要投诚，一律留命，当首领的给官作，当士兵的给饭吃”。清军的这一着很厉害，瓦解义军人心浮动、内部混乱。刘天佑开始是坚决主战不降的，他和义军首领李四军门商量说：战可活，降必死。但终因粮秣奇缺，武器不良，环境险恶，从首领到军士战志消沉。刘天佑见大势已去，事迫无耐，乃接受清军条件，带上官兵名册（清军说要点名收抚），率达木架（蒙古族）、曹占魁、刘老先、吴凤魁、朱二八少爷、谭木匠、王二虎结拜弟兄三十余人。出了“中军滩”的古城堡，去清军大营去谈判。宁夏义军首领李四军门洒泪送别刘天佑走后，带领他入伙的义士西撤

宁夏未受损失。刘天佑等一行，走到“新堂”地方突遭设伏的清军袭击，全部被俘，送到大余太。就在刘天佑出走的当天晚上，清军用直筒子大炮攻破义军据守的“中军滩”城堡。义军有的被俘，有的投降，有的藏到“中军滩”的莫苕林内。

王同春在镇压刘天佑造反时向清军送粮送草，犒劳支应十分积极，听到刘天佑被收抚的消息，他认为一旦刘天佑被录用，对他大为不利，便贿赂归绥道台扑寿，钱能通神，将刘天佑等主要人员三十多人在大余太处死，刘天佑就义时年仅三十八岁（一八六七至一九〇五）。清军平定了“套乱”，在班师返绥的路上，捕捉了后套二百多名无辜贫民，加上“反叛”罪名，一并杀掉，并悬首示众，以敬不服。包头四个城门挂满了人头，历时很久。一场轰轰烈烈的蒙汉人民联合反抗清朝统治和地主商人残酷剥削的农民暴动，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刘天佑失败后，清政府为收买人心授意王同春对参加刘天佑暴动的流散勇士采取下列三项安抚措施：其一，凡是当过刘军的只要“向善归正”，不究既往，自己的家兵、打手、民团不许骚扰当过刘军的家属；其二，凡是王家的佃户当过刘军的人，仍给拨田种地；其三，清军围剿被

杀的刘军家属，愿去王家当佃户的，租给土地，贷给籽种、口粮，并租给牛具，如刘军首领之一的刘老先，他的弟弟刘二，原给王同春揽过长工，当刘老先参与刘天佑起事后，怕受牵连，辞工不干，逃回原籍山西河曲。及至刘天佑失败，复从河曲来套，仍去王同春公中要求做工，王同春对刘二没跟他哥一起闹事，特别高兴，委其到距隆兴长最近、也是最大的北牛具做工，工钱优厚。

王同春经过刘天佑的造反，留命没死，他认为有神佛保佑所致，因在隆兴长建起一座“善堂”，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其实，王同春是“哥老会”执掌堂的“龙头”。他所以发家致富，与“哥老会”的关照不无关系。王同春的佃户大多是晋西北和陕北人，尤其是河曲、保德、神木、府谷的人居多。这一带的人民大多信奉佛教，又善于耕作种地。所以王同春信佛，更迎合了这一带人的心理，收到了收买人心的作用。

刘天佑被杀后，后套人民很怀念他。民间艺人顺应民意，编成歌词辗转歌唱。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王同春死后，人民也就无所顾忌了，把流传唱颂刘天佑的歌词加工发展成《打后套》二人台，在民间广为演唱。其歌词是：

（一）主题歌：刘天佑，传下令，打牛具，

刁公中，要把后套一扫平，二日天明到包头，要打五原厅，活捉住王同春，给他个倒栽葱（杀头的意思）。

（二）对唱：

- 一唱辫子一格柳，那是英雄刘天佑；
- 二唱辫子一圪团，那是二弟刘老先；
- 三唱上下一般胖，那是三弟耿大王；
- 四唱辫子一大堆，那是四弟曹占魁；
- 五唱辫子一不浪，那是五弟谭木匠；
- 六唱辫子一大把；那是六弟达木架（蒙族）。

合唱：

1、朱二八少爷生的勇，怀抱一根五爪龙（指长枪）；

2、苍天爷爷心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

3、天下穷人一条心，气死孔军与财东（孔军，是指大同总兵孔庆唐，财东，指王同春。）

（三）《莲花落》曲牌：（八问八答）

1、问：今天队伍哪里行？答：东牛惧里扎大营。

2、问：东牛惧要干甚？答：夜间去打王同春。

3、问：今晚咱们哪里行？答：包头城西扎大营。

4、问：包头城里要干甚？答：城里去捉王同春。

- 5、问：穷人都恨王同春，答：给他来个倒栽葱（指杀头）。
- 6、问：好汉因此生了气，答：好汉不叫刁百姓（好汉系指刘天佑）。
- 7、问：狼山湾里大混战，答：打得清军团团转。
- 8、问：同义隆里行了兵，答：吓得清兵往后退。

合唱：口里遭荒年，好汉到五原，
沿途背老母（指刘天佑），挨门吃讨饭。
后套养穷人，落脚红柳滩。
王、陈争河水，好汉受牵连（王，是王同春，陈，是陈锦秀。）
来了清朝兵，好汉脖子平（指刘天佑被杀）。

十五、治家方针

河套老年人回忆说，王同春生前虽有万贯家财，但要家里的人在吃穿上一律节约。家里人吃菜、自己种园子，吃白面自己磨，绸缎不许上身。他本人一辈子穿过两件马褂，还是人家送的；一件是南神甫给的，另一件是农商部总长张季直赠的。每年到了开渠放水时，家里男女老

少，媳妇姑娘，或骑马，或坐车，或步行都得下地去，坐家偷懒是不行的，就是自己也杂在工人队里一起动手。他一生在待人接物方面，凡是服从于他的人，如有所求，往往慷慨相助。愿留者给安排生活门路，种田的拨给土地，做买卖的借给本钱，揽工的留在自己的牛犊做工。其流亡之徒来投者，从他者令其开渠劳动，若不从者，每人给马一匹，给银五两强令其出套远去。在清末，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到处鼓动革命，晋省的革命党人往往以金钱之需，慕名常访王同春输献，王无不慷慨解囊。如晋省同盟会员王建屏（民初任过萨县知事）一九一一年偕毛周祥来过后套大余太、隆兴长等处，策动革命。（见“山西文史资料”十九辑）民国初年，后套地方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王同春为保卫牛犊的利益，对一些公差支应主动地由自己的公中牛犊承担。如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骚扰地方的土匪队伍卢占魁，为绥远都统蒋雁行收抚，令其部众万余人开驻于乌兰脑包整编，河套人民闻讯大惊，因为这伙土匪进套，不仅扰害人民，就是口粮也苦于供应。当时的五原县知事王文墀也是苦愁支应之浩繁，屡上书于绥远，要卢他移。上书不准，约请王同春共商解决之策。这时王同春主动出粮数千石，负担卢部的口粮，这样

免除了土匪对他公中牛群的骚扰。

十六、与帝国主义宗教势力的抗争

自《辛丑条约》签定以来，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入侵我国，到处建立起了外国人的洋教堂，每座教堂都拥有大量土地，筑堡耕田，不受约束，形同一个小“独立国”。我国人民对清政府袒教抑民的反动政策强烈不满，激起义和团风暴席卷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是为庚子年，义和团传入内蒙，到处设坛练拳。在“灭洋人、杀赃官”的口号下，蒙汉人民群起响应，形成强大的反帝反封建力量。东起察哈尔四旗，西至阿拉善、三盛公一带，北达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南到伊盟乌审、鄂托克旗，凡是有教堂传教的地方，斗争风暴如火如荼，汹涌澎湃。是年八月二十一日，河套起义群众，将躲藏在三盛公教堂的十五个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接着蒙汉起义人民攻打玉隆永、大发公、蛮会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六人。与此同时，伊盟宁条梁地方，也发生了反对洋教士的斗争。

教案发生后，吓坏了清王朝各级官吏和蒙旗上层王公。他们向外国洋教会屈膝叩首，承认由官府追查惩办造反的蒙汉人民。绥远道台对洋教士提出的赔款要求，畏如虎狼，不敢违抗。蒙

旗人民苦于允赔的巨额款项无所出，抵制认赔。天主教堂南神甫慑于蒙汉人民的威力，惟恐事态扩大，威胁教堂的利益，他知道王同春在河套的影响，乃请王同春出任调停。达拉特旗允赔款三十六万，但贫不能出。王同春因与达旗王爷是结拜弟兄，为了息争，王同春捐输一万石粮食，以抵偿达旗的认赔款。差额经过调停，达旗允以放垦黄土拉亥河一千四百顷土地，连同黄土拉亥河，统归教堂管辖。

当时伊盟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的蒙汉人民，亦因攻杀了宁条梁教堂的外国教士，清廷亦拟赔款解决。然以地方贫困，苦于无可筹措。乌审旗王爷拟用大淖尔碱池抵押于教堂，容待设法出租、定分三期交款赎池。约定既成，乌审旗招商出租大淖尔碱池。但日久无人承租，教堂得知，索赔更急。王爷得知沙俄愿意出银买池，拟将大淖尔碱池出售给俄国。王同春闻知，觉得此利不可外溢，乃向该旗出五万两白银，承租了“大淖尔碱池”，租金定分四年交清。立约既成，乃开办碱厂，所产“乌审碱块”，物美价廉，行销北方各省，享有盛名。但时间未久，乌审旗接教堂通知，责难该旗应赔银子一再拖延之不当，并说：“闻碱池出租给王同春，此人最不安分，与教堂累有宿怨。”又说：“王同春既与教堂有隙，

又无现银交租，教堂自不能让其承租“大淖尔碱池”云云。由于教堂之反对，乌审旗只好呈报清政府，请示定夺。当时外人之气焰正灼，“庚子”之变，使清朝各级官吏，对于教堂的意见，不敢违抗，遂拟毁约，要向王同春收回租权。对于教堂的干涉，王同春坚持认定：一来碱厂经营已有成规、碍难任便放弃；二来与乌审旗立有文约，中途变更，事非所宜，更不能单方无故撕毁。王同春倔强地据理抗争。后有榆林镇田正凯镇台，与王同春有“莫逆”之交。打劝说：此事涉及外国人之干涉，列强环视，本国政府无能，国家如此局面，徒争无益，反招祸患。乃劝王同春由官府给予赎金，交由官办，以免争讼。王同春听从田镇台之劝，遂将办得很起色的“大淖尔碱池”交给官办。

教堂反对王同春，事出有因：王同春早先于包头南边，置有一处田庄，但田多不毛之地。经王耕作经营，多次犁翻日晒，复于田间修挖了一条水渠，利用山洪，以施灌溉，变沙田为沃壤，有百数十顷。水渠经过洋人教堂的土地（清末民初在包头南有洋人教堂），外籍教士凭持强权，霸水争利，而王同春又不示弱，因此常起冲突，积久种下了嫌怨。教士得知王同春租定“大淖尔碱池”经营已就时，眼红挑刺，图谋破坏，以泄

前愤。

据有关史料记载说：王同春对洋人“做事蛮横”没有礼貌。王同春压服不了教堂，教堂也压服不了王同春。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廷贻谷大臣放垦蒙荒，王同春的土地亦被迫放垦。时有天主教田神甫，以办教与王同春有交，打劝王同春说：“你当初何不将所置产业归入教堂，并信了天主？设能若此，则教堂必会厚酬于你，可保你余年无虞。”田神甫想以王同春在蒙汉人民中的影响，能拉他信了教，蒙汉人民必将勇跃效行，教会立可兴盛。王同春一笑置之曰：我是一个中国人，将土地渠道交给国家，是国民之份也，我这样做是应该的。《绥远通志稿》有一段文字说王同春：“……尔时套境中部，自广漠之田产，以至密如蛛网之渠道水利，悉为王同春独具之势力范围。苟非王之所许。虽西人具有超政治之伟力，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而妄想有所染指也。是以外籍教士，经四五十年之努力，亦仅能于近西至临河发展，而于五原东部，则无可托足……”从这一段文字所知，王同春当时对于外国教堂无所畏惧，采取了“深闭固绝”的手段。

十七、大富遭妒陷

王同春家产万贯，又有赈济灾民之举，影响

颇大，从而招致满清官吏对王同春的妒陷。先是王同春在未施赈前，有任甘肃道台某人，卸任流寓于绥远城，其属吏某人，自甘肃去绥远探视，路经隆兴长住在王同春府第。他见王氏豪富，羡慕不已。到了绥远城，派他部属赵荣，复来五原，要王同春给他准备几匹好马。王同春愤其所图无理，没给筹办。对于赵荣的款待亦欠周到，也未有所食奉，以是修嫌于赵荣，滋有害王之心。此时正值王同春施赈灾民，并利用灾民开渠之际，赵荣去到绥远城，在他的老上司面前，恶言诽谤王同春假借放粮，收揽民心，意在结好灾民，图谋作乱。道台及某属吏因为阴私未逞，横生妒恨，将赵荣之言转告于绥远都统。绥远都统对王同春之财富亦垂涎已久，愤其食赠不勤，早有积嫌。因而听其言，信其真，设下圈套，欲加罪陷害王同春。但他们慑于王之势力，乃决定以假赠“急功好义”匾为名，派兵来套，佯称奖励王同春开渠放赈的功德，实则监视，暗图迫害。他们觉得非除掉王同春，后套不好治理。绥远都统的兵马发至五原，戒备很严，初还瞒着王同春，意在举行授匾仪式时，就便定罪逮捕。王同春初不介意，及至传闻入耳，亦生畏惧。然以既被监视，欲去不得，亦无可如何，只好听便。在将要举行接匾典礼的头一天，王同春后悔得罪赵荣造成的后果，

忧心如焚，不知所措。至夜，忽然禾场中起火，风大火旺，烈焰冲天，薪柴延烧，房舍均炽。军士与居民均忙于救火，一时秩序大乱。王同春乘间，逃过黄河南岸，匿居于杭锦旗王爷府经年，第二年八月间，绥远派来的军士散去，灾民亦多归乡里，事遂平息。王同春始免于难。

十八、与外蒙协商垦荒大业

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鉴于外蒙所吃粮洽取于后套，而后套原来也是荒野草地，端赖王同春之开发，成为丰盛的产粮区。活佛欲拟效行，派遣梅令丹巴为使臣，携带请柬礼品，来后套要请王同春去外蒙代垦，使臣与王同春计议磋商数月之久。王同春寻思：为了开发西北边疆解决晋、陕、绥人民生活，并发展自己家业，遂慨然应允，但要求三个条件：第一，准带晋绥五万人民，一来运输耕具前去垦荒，二来教授蒙人学习耕稼技术；第二，准白库仑以南，向河套推进垦殖，但须以汉人五十万户移垦；第三，个人求租地千顷，以备自耕。使臣归库仑复命，活佛时对大清帝国臣服尚忠，权衡计议后，届时将用驼马来迎。不意是年，清廷委贴各放垦，尽收王同春的渠地归公，使王同春无力兼顾，因使此事搁置，人多惋惜。

十九、清廷放垦家业衰落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廷委派藩院兵部尚书銜左侍郎贻谷为绥远垦务大臣，下令放垦蒙荒，以此作为在蒙区实施新政的要务。贻谷又委姚仁山为西盟垦务总办兼理司法行政，调来大批军队作为放垦后盾。贻、姚为了大量地搜刮“押荒银”，以取宠清廷，向各蒙旗宣布两条命令：（一）除公共牧场外，一律放垦；（二）、即使已经私放私垦的土地，亦一律归公。

贻谷先是放垦东盟的蒙荒，由于西盟的三公旗王爷迟迟不报垦土地才亲来西盟和河套视察。但见土地肥沃，又临黄河灌溉之利，到处犁云遍野，麦浪波田，知为王同春多年开发的结果。又见王同春在蒙汉人民中有较大的影响，为利于办垦，决定拉他入垦，让他劝导蒙旗认垦报地。遂对王同春说：你办垦多年，很有治水经验，请你担任河套各渠道的总工程师和垦务劝导委员吧。王同春无耐，只好答应。王同春受命第一件差事，随同姚仁山等到各蒙旗劝垦。遂次第报垦的有：杭锦旗二千八百三十九顷，达拉特旗三千一百二十二顷，西公旗一千七百三十顷；后来陆续报垦的土地又有“四成补地”一千二百二十五顷，五原城基地五百顷，古尔班朝地六百顷（在乌兰脑包）。

到民国初年，先后总共报垦土地九千七百余顷。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劝垦既毕，姚仁山屡为谗言所聳，官员们贪羨王同春是一个特大老财垂涎三尺，有一天巧设圈套，摆开筵宴，假借慰问劝垦辛劳之际，席间恫吓王同春说：你以往私垦大片牧场是有大罪的，你前年杀了陈锦秀也是有大罪的，二罪并发，你长了几个脑袋！这不但害了你自己，连你的儿孙都害了。听我们的话你具个结，我们替你想个办法。说着拿出一张纸来，叫王同春划押。王同春听其言，知道他的渠道土地保不住了，他也不认识纸上写的什么，不得已拿起来按上了手印。这一按印，说他是情愿举全部土地归垦。计被迫献出数十年所修之渠道和所置之田产有：熟田八千余顷，垦地二万七千余顷，干渠五条，支渠二百七十余条，公中，牛具十八处所，而国家所偿仅五千两银子。王同春把渠地全部交公后，前往河西达拉特旗，另租蒙地三百余顷，再起炉灶，重建家园。就在王同春献出田产后，姚仁山仍让他督修永济渠，全面疏浚永济渠三年竣工。

贻谷放垦，尽夺地商人的渠地归公，侵吞了大量的放地“押荒银”，大小官员装满了腰包还嫌不足，而规定的蒙租又不按时付给蒙旗，招到各蒙旗上至王公下自牧民，以及汉族地商人的普遍

反对。又因他贪污受贿，分脏不均，就连他的部属也向清廷告发。不久，贻谷被参，革职拿办。后继者似沿用贻谷的老办法，横征暴敛，多方盘剥，以致民力不支，往往弃地而逃。在贻谷放垦杭锦旗蒙荒时，把蒙民应得的户口地也当成蒙荒丈放。由于大片牧场被垦，使蒙民无以维生，激起广大蒙古同胞聚集在河西闹“独贵龙”，以反抗清廷和蒙族王公勾结为害的放垦政策，事变二年之久。

贻谷放垦期间，没能充分利用王同春的治水长处，贻谷妒视王同春，官员们既无水利常识，且唯利是图，不愿整理渠道，结果渠道淤塞，无人疏浚，垦地荒芜，水利不振。王同春的渠地归垦后，公家设局专管，政府设立的水利机构，分利润则有余，策建设则不足。放水收租，在规定的水租之外，官吏员役又作额外的勒索，不肯给官吏贿奉的农民，就得不到水浇，不浇水就不能耕种，因使很多良田又荒芜了。

二十、北牛渠的兴衰

王同春的北牛渠建于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座落于五原北郊十数里远。其规模之宏大，管理人员之强干，经营制度之完善，为王同春的诸牛渠之冠。

北牛犊的土地经营范围，从五原城北到乌加河畔，是达拉特旗的领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离王同春的大本营—隆兴长很近，便于管理经营。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位于义和渠下游，以前由于陈锦秀卡水，浇水困难。陈锦秀的眼睛被剜瞎后，这种劣势一下子改观，用水大为方便，使北牛犊进入繁荣昌盛时期。

北牛犊的兴盛还与管理人员之精明能干密切相连。赵二贵与武勇分管义和渠和北牛犊的水利，米增寿掌管记帐财务，刘九负责牛犊上的全盘，人称“九掌柜”，是大总管。刘富存掌管土地的耕作经营和对长工短汉的管理。

刘九这个人，办事精细，说话和善，深为王同春所倚重。赵二贵是黑泥池赵炽昌（赵司令）之伯父，创业治产极有经验。后来离开北牛犊不数年，就在西至临河，东到包头西的中滩，置下五六处庄园。在后大套说起“赵柜”来，名气挺大，五原城北的“二贵子村”就是赵二贵的“老柜”。刘富存这个人也很能干，创业本领也很可观，后来离开北牛犊到了狼山湾，创业兴家成为一方大户。武勇这个人虽然逊于上述三个人，但对于管理水利很有经验，开挖北牛犊渠就是他勘测的渠路。北牛犊由于有这些管理能手，王同春又知人善任，所以在光绪二十年后空前繁荣。北

牛犊在当时雇用工人耕作的土地有一万多亩，雇用长短工六七百人。出租给佃农耕作的土地也有一万多亩。雇用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河曲、府谷人，因为这两地方的人忠厚实在，勤劳肯干，种地有经验。在场面上打场的人也有二三百人，因为场面很大，呼应不便，收工、出工、休息、吃饭，均听钟声为号，以统一行动。庄稼之多，概可想见。在平常年景，自种收获的粮食有一万多石，收租亦有数千石。场面上的麦垛远望如山，远在几十里以外就能看见。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陈锦秀被王同春杀死以后，王同春陷入多事之秋，北牛犊的产业受到了影响，走上了下坡路。这是因为陈锦秀不是个平庸人物，需要王同春用全付精神和大批银钱去应付。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清政府放垦河套的蒙地，北牛犊的土地是达拉特旗的领地，而达拉特旗官府响应放垦。王同春原想认购北牛犊的土地，但是因为他是包地商人，又为清政府所禁，再向政府包租经营又为情势所不许，这就给北牛犊的产业撞了丧钟。

大总管刘九看见好景不长了，就自创家业，另立门户，到乌加河畔包租了一片蒙地，创建了“继荣堂”，并将刘富存和米增寿两个人也带到了“继荣堂”。接着，赵二贞和武勇也离开了北

牛嶺。到一九〇九年(宣統三年)，北牛嶺在一片蕭條中歇業停辦。

二十一、率民團抗敵保境

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五原設治為縣，知事范書林命王同春組建民團，以保衛地方，王被舉為五原縣的民團長。是年，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鑒於民國建興，唯恐失去蒙古王公的封建統治，反對我國的共和國體，在沙俄帝國支持下，派軍隊持俄式槍炮，分三路向內蒙節節南侵。其西路侵入烏拉特三公旗及五原縣境，見剪髮者即殺，叛軍所至公開逞凶。時有晉軍第九師孔庚師長聘王同春為營工幫辦，協助謝營長進剿。王同春認為，蒙勢正盛，應堅守烏蘭腦包，暫不輕擊，靜觀其變。謝不聽，進軍狼山，受挫負傷，退駐于包頭。叛軍乘勝南下，烏蘭腦包和大余太相繼陷敵，隆興長也甚危急。

叛軍佔據大余太后，凡查獲剪了辮子的漢人，都認為是革命黨人，一律格殺。並舉火焚燒軍營及資本雄厚、牲畜繁多的商號十八家，計有通盛泉、廣厚泉、忠厚堂、福合喜、永盛興等。這些商號的房屋倉庫與糧毛皮貨都成灰燼。胡油白酒漫流於院內外的道溝，深處盈尺。破壞之慘，損失之大，駭人聽聞。經此浩劫，大余太之商業

遂一厥不振。乌兰脑包的天瑞德、广盛西、乾丰号等商号亦遭同样的洗劫。入侵者还窜扰四乡，肆意掠夺人民的牲畜财物，王同春组织民众向东退却，沿途车驾长达数十里，啼饥号寒，极其悲惨。王同春亲率民团护卫押后，其老弱不能长途跋涉者，王同春把他们安置到河西他的公中牛棚中。王同春到了包头，叛军亦向包头打来，一时绥包两地人心惊慌。驻包头的晋军，为避其锐，拟退守萨县。王同春向晋军建议说：叛军现在尚未全集，新到的没有扎稳，应当趁其虚出奇兵进击。晋军听其策，王同春亲率家兵和地方团队约百余人，配合晋军四团赵守钰和统领谭涌发的大部队，选拔精干勇士，组织一支百多人的“敢死队”，进击叛军之前线据点梅力更召。

梅力更召在包头西边的乌拉山半山上，“敢死队”由王同春指挥，沿山挺进。王同春的家兵中，有刘、杜二姓两个人，好枪法，百发百准。将至召，叛军觉，从山上居高临下射，“敢死队”分地防守不能进。刘杜二人伏于山下实弹以待。统帅叛军的一个指挥官，衣着华丽目标显眼，山下易识。刘杜二人举枪瞄射，叛军官长应声倒毙。众叛军见其官长死，皆无斗志。晋军与民团乘势掩杀，一鼓攻下梅力更召，获得全胜。为此，王同春曾受到北洋民国政府的表彰。

王同春在这场事变中，牛惧公中多被叛军劫掠火焚，死了二人，损失财产甚重。且这次外蒙叛变，亦为内蒙广大蒙古官民所反对。平叛安定后，西公旗以乌加河北近千顷地，达拉特旗以和硕公中土地近千顷赠给王同春经营，用以抵补他的损失。王同春又把这两处土地立起牛惧垦殖。

在这次事变中，晋军四团赵守钰和统领谭涌发，愤蒙古召庙容纳叛兵，以为私通，于是见召庙即焚，使后套许多喇嘛召庙被焚毁，文物遭到破坏。北京民国政府在善后会议处置此事时，以蒙汉两方互有损失，各不补偿了事。

二十二、王同春与阎锡山、冯玉祥之交

就在平定蒙变的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被北洋军阀和晋省反阎势力排挤，难以立足，曾一度下野，来河套隐逊。王同春竭诚欢迎，款待殷勤。王同春陪着阎锡山巡视了河套各渠道，报告了垦殖情况。阎锡山对王同春奖慰有加，嘱其努力经营，将来晋绥两省的军粮民食有以赖之。王同春受宠若惊，恭维益至，挑选骏马若干匹，赠送给阎锡山。王同春引其三儿王英，拜谒于阎前，被阎锡山收为义子。阎锡山逗留未几，晋局和缓，随即返晋，仍执掌军政大权。后来王英曾赴晋谒阎，令在晋军

中效力，不住地对王英升迁。到民国十七八年
间，就被提升为骑兵司令赵承绶部的师旅长，兼
绶远护路司令。王同春在阎锡山返晋后，由宁
夏、青海贩运滩羊皮和细毛羊皮，往河北省顺德
府出卖，再把绸缎运回河套做买卖，货车上插着
一杆书“王同春”三个大字的大旗，出入山西省
境地，很受保护，所经税卡，无验放行。可见王
同春是阎锡山所器重的人。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冯玉祥住西
北办防督边，曾聘请王同春为包西水利公署参
议。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冯玉祥的国
民军开驻河套，来到五原，当见到王同春第一句
话就是：“王哥，小弟我来吃你来了。”王同春
不加思索地随口回答：“好哇，叫公中给磨面
吧。”他见这支队伍衣衫褴褛，难以御寒，就主动
捐输数千张羊皮，交给部队制做军服，并支援木
料，在县城东门修建了军营。王同春死后，冯玉
祥还亲自为他在包头举行了追悼会。

二十三、到南通参与导淮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北京农商部
总长张謇（季直），派地理学家张相文考察西北
水利，得知王同春治理河套水利取得成就，慕名
致书于五原，聘他为农商部高等水利顾问，并召

他去北京共商导淮之策。王同春去了北京，寓居于中国地理学会，日与张总长就导淮工程及开发西北事宜，进言献策。整理成导淮意见书上呈，受到袁世凯大总统召见。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王同春陪张总长视察淮河，落脚于江苏南通。时北京政府已组成导淮委员会，聘比利时和美国工程师二人勘查设计，与王同春一起视察。按导淮工程有两条路径，一入海，费资巨，一入江，省开支。比、美工程师主张入江，拟就地招募工人用西式方法施工。而王同春则主张入海，要招募鲁、豫两省能耐劳、肯吃苦的人民当工人，用中式方法开凿，得到导淮委员会重视。视察既毕，即返南通，又自南通去了上海。在上海期间，张总长、章士钊等和比、美工程师共商导淮之策，王同春亦参与其议。对于工程经费，议向比利时借款解决。嗣因比国工程师欲独行其导淮计划，而张总长则坚持由导淮委员会自主施工，因意见分歧，借款协议未成，事遂中止。

导淮工程罢议后，王同春陪张总长去了海门，参与组织海门垦务公司。该公司接受王同春意见，沿海筑坝，利用潮汐为渠，引水至田，经炎日曝晒，使地碱上浮，适落潮时，又退田水入海，如是几次为之，围海淤田三百余顷。一年可

种草，二年可种豆，三年可种稻。此法获得成果受到该公司嘉许。

从海门回到北京，张总长与王同春研商开发河套事宜，决定组织“西通垦牧公司”。王同春知照家人，献拨自己在乌兰脑包土地五百四十顷，作为该公司的发展基地。张总长亦捐资数千元，作为开办经费。农商部遂派来数名农科大学学生作专业指导。到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因卢占魁的土匪队伍开驻于乌兰脑包，为害很烈，公司经营甚感困难。又兼垦殖人员不惯于边地的艰苦生活，相继他去，复因贻谷放垦后相沿下来的水利部门的水费、杂捐摊派甚巨，所养牲畜均行转卖，亏空无益，其余人员亦难于支撑而星散，维持没多几年，将土地转租于农民，公司解体垦业尽废。

二十四、去晋北指导水利

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王同春应晋北官商之请，去晋北指导治理桑干河的水利事业。提出他的独到之见说：河北永定河的水患，往往威胁北京的安全。以往与其治理下游与水争地，哪如治理上游以地与水。若能如此，晋北荒地禾田，利用桑干河之水流，开凿几条渠道，以分永定河的水量，施以灌溉，则上游可收利富

之功，而下游减少了水源，可以根绝威胁北京之水患。晋人听了王同春的治本意见，深以为是。根据他的建议与规划，朔县人组成“广裕水利公司”，开挖“广裕渠”两条。应县人组成“应济水利公司”，利用浑河水，自开两条水渠，不能用，且在浑河建筑起一座举水大坝亦被水冲毁，王同春为之设计改建大坝并开挖数条渠道，均适用，垦田大增。山阳人亦组织“富山水利公司”，请王同春为之勘定渠道，浚修了数条水渠，灌田可达千顷。当水渠开成之时，王同春主张先应引水渗渠，一可以检验渠身之高低和容水与宜泄是否通畅；并借水固堤，以杜绝隐患，再行放水浇田。当时王同春置有一片土地在渠梢，而公司之田则多在渠口，他的引水渗渠主张被公司所误会，人疑他怀私，欲先灌其田，没听他的意见，放水浇灌公司之田。水既放开，又不派人看水口，致使田水冲溢，逆流入渠，所携泥沙，尽淤渠内，使渠废不能用。该公司后来知悔，又向山西省银行贷款五万元，仍按王同春原来的设计，重新浚渠，并筑新坝，由是渠复能用，可灌田七八百顷。

二十五、一生坎坷十年监牢

王同春一生在河套，兴建水利，发家致富，

历尽坎坷。曾五次入狱，坐牢十一年之久。第一次入狱是在光绪初年，因争夺同和渠与陈锦秀武斗，陈上控于萨拉齐厅，王被捕入狱，后被抚民同知文均放出。（见第十节）

第二次入狱，亦在光绪年间，王同春与高占旺因地界之争发生口角。不久，高家有一男人被暗害，原因未明。后来查明是一个姓张的守家武士，无故被高革职，生计无着，遂愤杀人。高占旺与王同春早有积嫌，疑他所为，遂去萨拉齐厅告状。高称于月光下，见王同春越墙操刀入室，一口咬定是他所杀。经问官推考作案时间，正是朔日，并无月亮，审员疑所控不确，知是因为嫌隙构陷，悬案未理。高占旺不服，上告于太原。后提审王同春于太原严刑审讯，王终不屈。太原审官以查无实据，不能定律，复令提回萨拉旗厅再审。如是往返数次，讼争三年始息。王同春因备受酷刑，一毆伤骨，每值阴雨，必然作疼，直到谢世时犹然。

第三次入狱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王同春因与达拉旗王公台基秦斯发生了垦牧矛盾，双方武斗，各有死伤。王同春乘间火烧“公益社”（即今之黄合元），使部分蒙旗游击队遇难。事被达拉特旗与杭锦旗官府，以王同春杀人主谋罪，控告于榆林道，被捕入监，纠纷

三年始息。（见第八节）

第四次入狱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西山咀附近有一个盐海子，为乌、伊两盟七旗所共有，由蒙旗经营。贻谷拟收归官办，遭到蒙民组织“独贵龙”反抗。王同春应姚仁山之请，曾去给调解。贻谷说王同春调解有功，命他去绥远交差，并称将要奖赏“花翎顶戴”。但当王同春到了绥远，贻谷因受手下人谗言构陷，故称：你的田产虽已归垦，然终不能抵杀陈锦秀之罪。将王同春捕入归绥监狱。这次入狱，一直关了五年，延到辛亥革命爆发，北方骚动，狱犯酝酿越狱。绥远将军蒞岫为了安定人心，要把狱中五十一名罪犯一齐枪决。时值阎锡山响应武昌革命，举山西独立，率军北上，击清军节节败退。蒞岫知阎军多蒙人，与王同春素有交往，拟派王同春去包头讲和。一天，蒞岫尽提狱中诸犯，独留王同春。佯曰：诸犯均可放，独王同春因为罪重不得释，及后，提出诸犯均斩，留王同春独免。另一说因为王同春告发犯人越狱之事，被留下未杀。由是王同春得以出狱，是为民国元年。而与陈锦秀之十年争讼亦由此告终。王同春出狱后衔命去包头与阎军交涉，使阎军南走。阎军走后王将受伤的阎军官兵，尽留包头，多方救护得以不死。

王同春恢复自由后，**蒞**岫将军派他到河套办团练，以保卫地方。他回到五原，派人扛了一杆大旗，上书“王同春”三个大字，遍走四乡高呼曰：我王同春出狱了，奉**蒞**岫将军令，四乡办团练，保卫边疆，保护百姓。不到一月，他的旧属响应他的号召，参加了团练，使五原民团办得很有成绩，为**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外蒙古犯河套时，保卫河套的军事战斗取得胜利，立了军功。（见第二十一节）

第五次入监是，**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王同春奉农商部总长张謇之召，去北京途过绥远，谒见新任都统潘矩盈时，詎料潘都统手下的人想绑王同春的票，捞他的油水，在潘矩盈面前恶言进谗，以修建五原县城欠工人三千两工资为借口（见第十五节）潘都统拘他下狱。北京张相文闻悉，先给绥远卸任将军张绍曾致函，托他转请潘都统宽办无效。张謇总长紧急两次来电求释，亦遭拒绝。张謇特谒见袁世凯大总统下令绥远即刻释放，才发出了效力。王同春被护送抵京后，对张总长说：潘都统已将他判了死刑，若袁大总统令迟到一天，即被枪决矣，真险！这一次共坐监十八天。

二十六、组织汇源水利公司

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驻绥远的北洋军阀部队第一师旅长杨以来，视察河套渠道，为搜刮民财，又尽收河套八大干渠由他所组织的“灌田水利社”管理。因为该社成员都是军阀爪牙，既无水利常识，又唯利是图，哪管民生疾苦！不顾整理渠道，使各渠道淤塞失灌，造成河套大好膏腴之田日见荒芜。以前一村五六户者，今则仅有一二户矣，三百余里之河套平原，人烟寥落，荒草遍野。到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马福祥出任绥远都统，鉴于“灌田水利社”贪利忘公，弊端丛生，管理不善，民多怨言，请王同春共商改进之策。马都统接受王同春废官办为民营的建议，于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将永济、刚济、丰济、沙河、义和五大干渠自灌田水利社收回，交由王同春、李增荣、张厚田、杨文林等地商人，组织“汇源水利公司”经营。其余通济、长济、塔布三渠仍归“灌田水利社”管理。

“汇源水利公司”下设五原、临河二分会，王同春主持五原分会，李增荣主持临河分会。王同春将义和、丰济二渠各费银一万，沙河、永济二渠各费银二万，刚济费银未详，重新整治浚修，使废弛的渠道复具规模。王同春又将乌加河梢尾进

行了疏浚，使两岸之地都能灌溉耕种。

二十七、积劳成疾死后哀荣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委国民军第八旅长石友三为“包西水利公署”总办。水利公署设在包头，聘王同春为该公署水利参议。对改进水利，他提出仍以民营的意见，未被采纳。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开驻河套，石友三迁“包西水利公署”于五原新城东门外，尽收河套各渠道，废民营为官办。是年五月，石友三派王同春督察水利，他已“古稀”之人，仍屡赴黄河沿岸督修水利工程，返后略感身体不适，稍愈后，于六月间又受石友三命，赴黄河岸督修河口，中暑受疾，复染痢病，终致不治，一病不起，于农历六月二十八日病逝于隆兴长，终年七十四岁。生前尚有振兴河套渠道计划，留给子女嘱继承其志。

王同春死后葬于五原城北，子女们在陵墓建祠堂，每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祠堂前演戏三天，以示纪念。冯玉祥在包头亦为王同春举行了追悼会，表彰他一生勤奋地兴修河套水利的功劳。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在他的十周年祭辰之日，绥远省政府傅作义主席，追念他兴修

河套八大干渠与垦殖之功，拨款五千元重修了祠堂。祠堂落成后，国民党军政界显要人物冯玉祥、同锡山、马福祥、李鸣钟、门致中等送了挽联。

重修的王同春祠堂建成为一个院落，有北房三楹，西房三楹。北房内设香案，王同春的墓就在案后。香案上供着自景德镇制作的王同春一尊瓷像。瓷像前供一甬神主。上书文曰：清崇戴花翎即补都司农商部水利顾问显考浚川府君之神主。落款署名：孝男琢、玉、璟、英、喆敬立。香案一侧又供一甬神牌，文曰：供奉绥西河渠总河神王君同春之神位。祠堂有专人照管，辰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

河套一些群众认为他生前治水有功，死后成了河神，掌管着河套的河水涨落，因而每遇河渠水落、田禾干旱，或者河水暴涨、决口成灾时，就到祠堂给王同春祭奠，白天许牲摆供（即许愿、宰杀猪羊、供献食品），晚间到河渠放河灯，祷告降福消灾。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河套大旱，人心不安，临河县有人还在马道桥搭起采台，供奉起王同春的神牌，唱了几天祈水献神戏。这些活动，虽属封建迷信，然亦说明河套人民对王同春治水的信仰和纪念。

结 束 语

王同春自幼没有受过教育，识字不多，他来河套六十多年，发奋自立，雇用灾民，开渠引水，垦荒辟野。他通过和各种势力的争斗及对农民的剥削，发展了巨大的家业。贻谷没收了他的财产后，他毫不气馁，又重建家园。他一生以开渠垦地为业，不计失败，百折不回。他参与治淮，治河工程，是个水利行家，受到上层人物及群众的信任。他镇压过“刘天佑”的农民运动，也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并率众抵御外蒙古叛军的侵犯，保卫了家园。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狱，又借官僚军阀势力得以脱险。我们认为王同春在河套兴修水利的功绩应该予以肯定，他的一生功过是非，史学界都有不同的评价，现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评价。

附记（一）

撰写本稿参考的有关史料

1，顾颉刚写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见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报》。

2，张维华写的《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见民国二十五年《禹贡》六卷五期。

3，巫宝三写的《对王同春事迹补充》，见

《禹贡》四卷七期。

4，曲直生写的《王同春事迹考证》，同上。

5，绥远省水利厅长王文景于民国三十年写的《后套水利沿革》。

6，王喆写的《王同春轶记》，见《禹贡》四卷七期。

7，五原县档案局有关王同春史料。

附记（二）

陈锦秀女儿回忆录

五原县景阳林公社社员李四保的妻子，是陈锦秀的小女儿。她于一九六四年对她父亲死因作了回忆，经郑二巴、郝宏才两人记录整理的，兹抄录于后，供作参考。

我今年（1964年）六十二岁。杀我父亲是生我那年腊月三十晚上的事。我也是听家哥哥说的。那年三十晚上，我家的长工和打手，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们也在家熬年。我们的院墙很高，他们的人翻墙进院，先打死下夜的。我大爷听见动静，提上白腊杆子，从伙房出来，和他们打了一阵，寡不敌众，翻墙跑了。我父在家，听说敌人来了，就叫我妈寻枪弹。我妈弯腰在躺柜寻子弹，因柜子高，出不来，是我哥哥把我妈拉出

来。回头一看，却不见我爹。可能是我爹听见动静出去。被人家逮住了。我哥出院，听到当院灯杆下，呼鲁呼鲁有响声，一看，是我父亲。齐腰眼让人用“匕”子扎坏了，下半夜的那时，还有点气，有人说，灌青羊血能救活，立时杀羊，灌了羊血也没顶事，后来就死了。

我父亲眼睛是怎样被剜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两眼都被剜瞎了。我父亲被杀时，是在锦秀堂住的。我父亲那时的公中，有土城子，义成公，福泰昌，锦秀堂，协成等处。只开过协成渠，和一些小渠。我们是河南洛阳人。我们父亲手上是锦秀堂住。自我记事，我们就住在土城子。听我嫂说，我父亲娶我母亲时，已是瞎子。那时，我父亲就过得可以了。我母亲是人口贩子从后山贩上来找的。看来，我父亲被剜眼的时间，离被害早十多年的事。你算个大概时间的话，我是六十二岁，我大嫂六十八岁，属猴的，我大姐前头还生过两个小子，都死啦。这么一稽算，他被剜眼的时间，要比被杀早十多年。

关于被剜眼的事，是瞎进财为霸占我父亲的地。那时，我父亲的地很多。他请我父亲去他家吃饭，吃完饭，让两个打手去送。送到沙窝，打手说：我们掌柜让我们要你的两个灯笼。因寡不敌众，我父亲就让人家把眼睛给剜了。剜眼后，

我父亲黑摸上，走到瞎进财家大骂。后来，瞎进财说了好话，让人用轿车子送回来。

自刻眼后，我父亲常到瞎进财家，要粮食、要牲畜，他也不敢惹。瞎进财开了灶河渠后，他不给粮了。我父亲领上人，瞎进财前边挖开渠，我父亲引上人用哈莫柴，在后边给填了。瞎进财看见我父亲不好惹，只得要啥给啥。后来，我父亲坐上轿车子，常去找瞎进财，打问见他在哪里，就去那里找。闹得瞎进财躲着不敢见。我父亲向瞎进财要的主要是粮食和牲畜。他为了“磨楞子”，一去就是：“我吃不开啦，你给我闹些吃的哇！”一要就是三十多石粮，有时还拉上几匹牲口。因此，瞎进财领上人，杀了我父亲。瞎进财因早有准备，杀了我父亲后，就骑上他的灰骡子，连夜跑到包头，连觉也没睡，换上衣裳就拜年。

?

3

后套水利沿革

王文景

抄录者的话

后套水利沿革，系绥西水利总局编于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元月，迄今已有四十二年之久。该稿系原绥远省水利局长王文景生前亲笔直书的。这本沿革书写了后套解放前水利状况，阐述了从清末至民国年间等时期水利开发、组织改革等详细过程，即实况。

王文景解放后继任绥远省水利局长数年，因病不幸与世长辞。我热爱本职工作，重视水利文史及水利科技资料的保管。这本资料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不幸文革中丢失。三中全会以来，在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鼓舞下，我奔跑访友，克服困难，终于找到原稿，将此整缮成文。因原稿年久，纸质差，繁体字迹模糊，原著又无标点符号，加之自己文化低，难免有错误，请领导和同志们审阅时提出批评和订正意见。

临河县水利局

史明德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后套是属于河套的一部分，为中国罕有的冲积平原。面积有十六万余顷，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最适宜于农耕。并可利用黄河开渠灌溉，水源畅旺，尤为得天独厚的农作区，故有黄河富套之谚。因其具有种种优点，造成历代汉蒙战争重要根据地。有时汉人垦殖经营，有时成为游牧草原。蒙古歌曲形容后套之自然景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以想到蒙古人占据的时间多，汉人统治的时间少，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后套沃壤，虽为肥美的区域，但因雨量缺乏的缘故，使农业上发生重大的困难，必须依赖黄河开渠引灌。先哲已发端于前，吾人自当努力于后，以利用此天然富源，为我民生之一助。

溯河套水利兴办，最早远在秦汉时候就有很多人移到这个地方来。其中有犯罪充军的，有戍边的军士，也有专为垦发的农民。县城之建筑于此者亦多，可以想见当时水利规模之大，渠道之多，户口之繁盛。惟是有时候保不住这块肥美的土地，北方游牧民族跑到这地方来，立刻就会变成草原。类似这样的事不断发生。最后到了明朝中叶，又被蒙古民族夺去，改为牧场。这是关于河套历史上可以考证的事实。但是关于后套一部分历代水利的兴废很少明确的记载，而又经过黄

河转移的变动，以前垦发的遗迹，湮没无遗。所以关于河套史事上的记录，是否属于后套单独的事实，很难断定。兹且不去牵强追述，仅就后套现代形势及水利开发概况，依据见闻所得者，约略分为三个时期：

一、开发时期：在这个时期以前，当然是蒙族占领的游牧草原。至清中叶来此贸易之汉人，见黄河沿岸及接连黄河的壕沟附近低洼地带，经过河水涨溢漫流，湿润耐旱，土质肥沃，认定为优美的农作地。那时蒙人恐怕破坏其牧场，不许汉人耕种。嗣以经商汉人对蒙人皆有税贡，渐渐熟识，感情日厚。同时蒙人亦需用食粮供给，始许在所住附近种地，此为后套耕稼水利开发的初步。继而逐渐扩充，蒙人所需食粮较之运诸内地便利许多，禁令无形松懈，汉人始得指出荒地段落，纳租包种。嗣后以青苗时遭淹没，迭受损失，以经验所得，方知筑坝御水之益，因而咸获厚利。于是汉人闻风接踵而来，河水自然漫溢的区域不敷分配，乃包租干地，接连天然壕沟，导水灌溉，此为后套水利开发的第二步。厥后汉人势力滋长，互相集资，接挖大渠数道，贯通乌加河，作为退水，渠道之规模于以大备，是以至今仍有八大干渠之称。此时纯系人民自动，官厅概未过问。水利行政由各渠有势力者掌握。遇有紧

要工程或决口事情发生，号令一出，万人响应，不敢违拗。当时退水顺利，渠身通畅，支渠四通八达，田畴被野，禾苗菁菁，俨同内地，此为开发时期，亦可谓后套水利最初兴盛时期。

二、官办时期：民办水利得到相当成绩的时候，适值清政府筹议垦牧殖边。光绪二十八年，钦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一方推进垦政，一方将各大干渠收买归公，全盘计划修渠筑坝事宜。各渠经此次大事修浚，较前益见宏效。未几贻谷被参，信勤继任，既没有新的发展，但尚无溃决壅塞之弊。民国肇始，百废更新，以各渠管理不善，改由地商分渠包办。是时绥远垦务总局兼管水利，而绥远建设厅又与总局事权共分。在这种一国三公、事权不一的情况下，分利润则有余，策进行则不足。而渠道又于民国九年改由灌田公社包办。因为该社均系军阀爪牙，既无水利常识，且唯利是图，不顾整修渠道，结果渠道淤塞，无人疏浚，崩坏无人管理，水大即淹没地亩，水小即不能灌溉，垦地荒芜，渠道废弛。民国十二年以后，又归地商包办，依然疏弊发生，此为官办时期亦可谓水利废弛时期。

三、官督民修时期：因为经过长期的废弛，官厅渐知注意。民国十六年，绥远建设厅厅长冯公子和鉴于过去水利的失败，锐意整理，认

定官办商办均有疏弊，详加追求，定为官督民修。旧渠道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厅却有监督的职权，设包西水利管理局于五原。各渠组织水利社，由人民选举经理，秉承水利局之监督指导办理渠社事务。十七年召集各渠经理在包头开水利会议，拟定各种水利章程，并向山西省银行贷款十六万元，分给各社用以浚修渠道。查得经理有自私自利者，复派整理员代为整理。二十四年又成立五临安水利整理委员会为水利最高表决机关。水利行政设施，各社渠道之修理，悉依该会之议决行之。并由省库拨款九万元整修永济、丰济两渠，开挖乌加河、西山咀退水。于是渠道之淤塞者修浚之，溃决者堵塞之。尤特别注意革除疏弊，因而各渠水势畅旺，百废渐举。至二十五年，复鉴于水利局有责无权，县政府有权无责，事权不能统一，难收联合共睦之效，乃将包西各渠水利管理局改组为五临安水利管理局。由五原县长兼任局长，临河县长、安北设治局长，为分局长。一切行政，仍由水利整理委员会议决分飭遵行。然而这种办法，一则县长兼管，没有充裕的时间专办水利；二则三县分管水利，行政不能统一，难收统筹全局之效。所以不到二年间，管理局与各分局关于财政上、职权上动有冲突。管理渠道亦时因各私其民，各顾其渠，发生无益之争。七七事

变以后，省政一时停顿，对于事项纠纷，更无上级机关予以解决，遂乃各行其是，益滋纷歧，水利前途，至堪隐忧。是时适绥西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马秉仁兼任专员，念民及渠利关系抗战甚巨，乃呈请省政府将五临安水利管理局改组为绥西水利总局，由建设厅长兼总办，行政督察专员兼会办，另设坐办，处理日常事务。五临安三县局长兼任总局水利督察员，负责督导考察各县治境内各渠水利社事务，以收行政统一之效。此为官督民修时期，亦可谓之水利复兴时期。

现在后套大小干渠有四十余道之多，每年播种的青苗约三四万顷。但按全套十六万面积比较，骤然看起来似乎差得太多，可是后套渠道系在最近时期以人力用土法逐渐造成，与陕西的泾惠渠、渭惠渠情形大不相同。水利行政也不过指导人民兴利除弊的途经，从没有科学的设备与技术的改善。倘能一致努力从事发展，则后套水利之前途定属宏远。惟黄河自宁省携泥沙而来，因河流时常转变，有时淤塞渠口，有时冲断渠道，或遭干涸，或被淹没，实为后套改善渠利的最大障碍。因为地方与人民力量单薄的缘故，明知其痛苦而不能解除，殊为遗憾耳。

一、永济渠之沿革

永济渠原名缠金渠，又有名之为蟾井渠者，揆其蟾金之名，或因渠水萦缠似金碧色而得之；而蟾井之名或谓昔时掘井得蟾名。其地后浚渠灌溉，此地因而名其渠。又有谓缠金为蒙古地名，传说不一。但缠金之名今仍袭称，似可证明该渠原系因地而名，或无疑义。据乡老传说乾隆末叶，由甄姓创挖，仅宽一丈，长不足五十里之小渠。同治年间，清军剿除回乱，设防于后套。因军纪不良，搜括践踏，军事荒芜，渠道废弛，无人过问者数年。光绪初年，甄姓又联合崇发公、景太德、祥太玉等四十八家，继续整理接挖卜尔塔拉一带。至光绪三十年间，钦差大臣贻谷督办垦务，杭达两旗地亩报垦，将渠收归官办。因地亩辽阔，水不足用，乃大动工程，将该渠劈宽挖深，经二喜渡口、公中庙、景太德、崇发公等处至乌加河，计长一百五十余里，改名为永济渠。旋由二喜渡口向西支出一西大渠，长四十五里，又向东开东退水渠，总计费工款巨万，水流畅通，遂为后套各干渠之冠。民国初年招商承包，杨满仓包卜尔塔拉地亩，添挖旧东渠、新东渠，吴祥开挖乐善堂渠。杨分包三年，无利可图。其后屡换包主至灌田公社承包时，下游东退水一带

淹成水湖，以致废弛无遗。民国十二年，由地方人士王同春组织汇源公司，承包出资整理正梢，及乐善堂渠，又见起色。经营三年，正值国民军主持绥政，将水利收归官办，成立水利局管理之。至民国十七年，绥建设厅长冯公子和鉴于官办不宜，民办无力，在包召开水利会议，决定官督民修办法，贷款整理。更因经理不善，未能收益，不得已由水利局选派整理员代为整理。二十四年，又由省库拨款七万元，将两岸渠背通身加高，并将东退水旧东渠通身洗挖，以杜淹没之患。二十五年，修筑渠口闸箱。因负责者只知过去水大之患，将渠口闸箱之底铺垫过高，是年遂感缺水，大减灌溉面积，渠道几遭淤澄。二十六年，另委整理员负责整理。因鉴上年水小之害，乃在上年闸口之西重新另开渠口，藉用地势，吸引套河进水，并将永刚渠口之闸箱增筑，紧缩水量，以资灌溉上游地亩，减轻下游灾患。同时在该渠闸上段修挖转水渠一道，调节水势，不致闸水量过大，发生溃决。近年以来，水患得渐减少，灌溉面积亦逐年增加。民二十八年秋，绥西军政当局将实业基金地改建新村，组设农场，藉以安置抗属及难民。复经派委会郭彩青整理员履勘正梢及旧东渠退水，拟定修挖纳林河，通顺正梢，疏浚旧东渠及东退水，以谋空涸淹没地亩，祛除实业基金地之

灾患。决定之后，遂于秋后兴工。先将永济正槽挖通，第二年（二十九年）次第将纳林河及旧东渠、东退水疏浚竣工，以谋使永刚支渠通梢解除该渠下梢水患。并另在永刚支渠口对岸添挖大支渠一道，直过胜家营子村，入乌加河，用以灌溉焉。该渠原来灌域，兼有五安境内乌加河北岸面积。自民二十五年乌加河总退水成立水利社后，该渠灌域范围只有本干渠及支渠五十六道。支渠较巨者为永刚、百川、乐善堂、旧东退水等渠，尤以永刚支渠为大。现在干渠长度一百六十华里，深一丈五尺，宽八丈，灌域面积约一万顷，实能灌溉者约二千八百顷。如有巨款，尽其整理计划，该渠利益实具厚望焉。

二、丰济渠之沿革

丰济渠原名协成渠，初名中和渠，又名皇渠。先是同治初年，有甘肃人贺守明，号贺百万在祥太魁东开设协成字号。该号经理赵三鉴，见刚目河漫溢之水，浸润低洼之处甚多。遂将刚目河坐坝切断。俟水乾，耕种十年之久。旋因刚目河口淤塞不通，致全部荒废。至光绪初年，有达旗二官府维君出银二千余两，自刚目河向正北开挖长十二里之小渠，并开设天吉太商号，经营蒙古生意。不数年，亦荒废倒闭。延至光绪十六

年，倩人从中说合，将渠地全部卖给王同春。王君于十八年出资，重新自黄芥壕黄河开口，经马厂地、天吉太截断刚目河，送入维君先挖之小渠内。继又将协成渠劈宽，向正北开挖退水渠，入乌加河。前后修理八年之久，费银七万余两，共长九十六里，坡度甚好，水流畅速，故全年水量充足，最适灌溉。至光绪三十一年，渠地归公为公有，定名丰济渠。又由垦务局拨银，自五分了东向开挖什巴圪兔支渠。民国初年，随同各渠招商包办，由张霖泉、田喜亭、王在林成立五大股，承包四年。期满旋由灌田公社承包，渠道废坏不堪。后又由王同春、李增荣等组织汇源公司接包。不及二年，绥区政变，国民军执政，成立水利局，将渠收归官办。民十七年随同各渠改为官督民修办法，成立水利社。二十三年在渠口修筑闸箱，以节制水量。嗣因管理不善，于二十五年委员整理，筹款万元，将什巴圪兔支渠切湾取直，建筑闸箱，又在于渠下稍建筑三岔口闸，调节水量，极为适宜。二十七年绥西水利总局改组成立，以本渠无须派员整理，由民选经理实行官督民修原则矣。现计全渠共长九十六华里，宽五丈，深六尺，灌域面积约三千顷，实可浇地一千五百余顷，共有支渠二十六道，以什巴圪兔、塔尔湖、银定图等支渠为最大。本渠渠口稳定，水量

充足。不特本渠无乾旱缺水之虑，且可救济沙河渠、旧皂火渠两灌域之地亩。倘能款足其用，人胜于事，在工程上、人事上均再作进一层之整理，则渠利之富，诚不愧于丰济二字之名焉。

三、义和渠之沿革

义和渠乃后套水利杰出人才王同春创开之渠。前清光绪六年，王君因辞去老郭渠四大股经理与郭敏修分手后，深知后套地形东北低而西南高。若顺其自然形势开渠灌溉，当有可成之理。遂毅然向达旗沙花亩喇嘛承租荒地，创修渠道。自土城子北黄河岸开挖，经杭旗马厂地、五顶帐房向北插入哈拉格尔河。次年顺河洗挖，经苗家圪旦、羊油坊、西牛犊由东北挖至隆兴长北。光绪十一、十二两年，又向正北开挖退水城渠一道，由贾粉房入乌加河。十五、十六两年，适是时地方大饥，俄民广集，乃再向东北经老赵圪堵、银瑞桥、范家油房挖通乌加河，作为正梢。全长百里之大渠，前后经十五年之久，始告成功。因与郭敏修分渠和解，独自经营，故初名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

其灌域以隆兴长为中心，能灌地亩约计千五百顷。此渠挖成，河套遂以隆兴长为中心点矣。盖隆兴长适居河套之中心，以故官厅对全渠事务

皆在隆兴长处理。而王同春鉴于四方荒凉，亦以隆兴长为总号，以便处理各渠事务。即包五交通亦赖此渠作运输孔道，而成河套总枢纽矣。

光绪三十一年蒙地招垦，渠道已收归官有。经垦务局施工整修，办理五年，至民国初遂招商包办。王同春之子王璟以商人名义承包管理，五年期满后，因乌加河下游地亩全赖此渠灌溉，遂组织义和社包办。办理数年，不但下游未沾其益，即义和渠本身亦淤塞，水不足用。至民国九年，由灌田公社接包，管理四年，不但人民未获水利之益，反更感干旱之苦，难以居住。民国十二年，全套人民因感水缺，渠道淤塞，地亩荒废，纷纷请求当道辞退灌田公社，由全套人民管理整修各渠，复兴河套。当道顺从民意，准由五临两县绅董出名承包。王同春以董事长名义，集合全套绅董组织汇源公司，承包十五年。乃管理二年，适遇绥远政变，未到期而省府收回自办，成立包西水利局。分渠委人管理，办理二年，又行淤澄废矣。

民十七年，建设厅冯公为采纳河套大多数人民意见，在包召集包西水利会议，改为官督民修，由地方组织水利社，选举经理董事负责管理。冯公并为介绍借款，重新另挖新口，隆兴长南北亦行修洗。近年水流畅旺，地亩较前者耕种

倍增。二十三、四两年，又因乌加河水量过大，本渠水不能退入，复自银瑞桥向东顺营三壕修挖退水一道，送至通济渠北梢，以资宣泄义和渠之余水。二十五年，经人民以渠工服役办法，修挖渠口一次。二十七年，绥西水利总局成立，该社复以人民服役办法，洗挖渠身。二十八年又商请军政当局派兵工两营，洗挖渠口淤澄之段，计四千余土方。该渠始又顺流畅利，灌溉普及矣。现在该渠长一百零七里，均深四尺五寸，宽三丈六尺，共有支渠一百道，以二分子北牛犊两条最大。全渠灌域面积二千二百余顷，实浇一千六百余顷。惟因渠身过分淤澄，历年限于人力财力，仅系择要洗挖，其效自小。随挖随淤，徒兹劳费。至于渠口亦受黄河水流转移影响，常遭淤澄，历年须施工深挖。均应赶筹巨款，彻底施工一劳永逸，民负日减，渠利庶得以逐渐发展焉。

四、沙河渠之沿革

沙河渠系王同春于光绪十七年开挖。事前因达拉特旗发生内争，王同春亲为调解，费月余之力，消耗银二千余两，始告解决。达旗感念王君之德，遂将隆兴长以西地亩租与耕种。王君因识有地无水，遂立意动工。夙兴夜寐，奔劳辛勤，日无暇晷，亲率工人开挖。因渠口附近皆为沙

漠，故名曰沙河渠，又名王同春渠。此渠自杭锦旗马厂地沿黄河岸意德成开口，经十六股而入哈拉格尔河，长十七里，宽三丈六尺，深六尺。十八年春，顺哈拉格尔河，经柴生地而至黑进桥之地，计经修挖者长二十四里，宽三丈六尺，深四尺。十九年自黑进桥，经鸭子兔、一苗树至补红之地，计长十九里，宽三丈四尺，深五尺。二十一年开挖正梢，经梅令庙、马面换圪旦、继荣堂而入乌加河，计长三十二里，宽二丈二尺，深四尺，以资退沙河渠内之水。二十二年，又自补红向东北接挖，经后补红、通玉德又开东梢引水退入乌加河内。共长三十二里，宽二丈，深四尺，自口至乌加河全长九十里。工程费银九万余两。修挖此渠时，正值西北大饥，工人甚易，工资亦低，实含以工代赈性质，前后不出四年，全部大工告竣。光绪三十一年，蒙地放垦，设西盟垦务局于五原，兼管水利事务，将该渠收归公有。民初，随同各渠招商承包。王璟以地商名义包办，委杨满仓经理。期满后，杨满仓继包，均无利可图，即由灌田公社承包。管理四年，渠道淤废，人民吁请当道准由地方人民承包。于是王同春纠集地方士绅，组织汇源公司承包。办理二年，绥远省政变，国民军执政将渠收归官办，成立包西水利局管理之。嗣绥远省建设厅决定各渠

为官督民修办法，本渠已组织水利社，选任经理董事办理渠道事宜，以迄于今。本渠因坡度稍差，故水势盛衰不定。近年以来，口梢时感淤澄之苦，下梢则藉丰济渠什巴圪兔支渠余水之救济。渠口则年需施工洗挖，有待筹集巨款，作整个计划之整理焉。全渠共长九十二华里，宽三丈五尺，深五尺，灌域面积约二千六百顷，实浇地二千一百余顷，共有支渠七十八道，以五大股、广盛西两支渠为最大，但均长二十华里耳。

五、塔布渠之沿革

塔布渠原系由河水冲决而成之天然河流。塔布系蒙语数目字中之五字，或系第五道河流之意。咸丰中叶，有蒙人何里华者，耕种乌梁素海附近河水漫过地亩，以塔布河常有泛滥淹没之虑，遂在乌梁素海以西修筑长坝，杜水东流，此为塔布河水利之滥觞。同治末年被洪水淤塞，后经地商樊三喜、夏明堂、成顺长、高和娃及蒙人吉尔古豪等五股合作修挖，乃将塔布渠口北移，并向东南开挖退水渠一道，入乌梁素海，计长三十二里。后计划向东北开挖浇地渠一道，计长二十五里。至光绪初年，始告完成。灌地达千余顷。延至光绪二十九年，因连年失修，又形淤澄。光绪三十二年，贻谷督办绥西垦务时，收归

官办，另挖新口，又将杨福喜店至邓存店之五里，切湾取直，是为中兴时期。迨后其它各渠，经过官办商包阶段，均属经营不善，日渐废弛。灌田公社承包数年，竟点水不入，废坏无遗矣。民国十七年，绥远建设厅长冯公子和特别注意后套水利，考察过去得失，锐意整顿，始改为官督民修。向山西省银行贷款二万三千元，择要修挖后，切湾取直二十余里，水势方较前畅旺。此后历年修理，日有进步，年可淌青苗三百余顷。计干渠长一百二十五里，灌域面积三千余顷。惟此渠原系天然河流，虽经历年修理，弯曲之处，仍属太多，有碍畅流。如能筹款二十万元，切湾取直，即可灌溉能种之地二千余顷。其工程之关要洵堪注意焉。

六、长济渠之沿革

长济渠原名长胜渠，由侯毛骡、郑和等创挖。同治十一年，原与塔布渠共用一口，经天北淖以达粟西捷木村，计长五十二里，经营七年，始告完成。而侯毛骡因劳成疾，其侄映奎继承遗志，再向东北接挖，经大有公、昌汉淖以入乌加河，费时八年，计长三十二里。光绪二十三年有商号德恒永又自树林子村接挖，经二小吃堵、蓓亥淖亦入乌加河为退水，计长三十二里。旋侯映

奎鉴于该渠宣泄不畅，复请王同春先生勘察。自圪生壕境，由旧那林河转入乌梁素海，计长二十八里。至光绪二十九年，渠口淤塞，水不敷用。自光绪三十二年，钦令督办垦务大臣贻谷任内，发帑重修，另劈新口。自黄河起至刘召儿房后与旧渠衔接，计长三十三里。自新口完成，水量极其畅旺，迄民元以来，经过公私主办，历年失修，久形淤澄，尤以民国十一年灌田公社承包时，废坏特甚。国民军掌绥政，设局官办，仍乏成效。迄至十七年政变，冯公子和任建设厅长后，召集会议，改为官督民修制，并予介绍，向山西省银行贷款九千元，用以整修渠道。始由地方人民选举经理，组织水利公社，将淤澄之处择要洗挖。复自黄渠口至国虎圪旦切湾取直，计长五里。此后历年修理，颇著成效。惟因黄河转移不定，及坡度较平，流速略缓之故，仍不免发生淤澄，感受缺水之困难。计干渠长一百一十余里，灌域面积三千余顷。现能灌溉者不足千顷。如能加以救济，其前途之发展正未可量也。

七、通济渠之沿革

通济渠先系天然河流，原长二十余里，名短辫子壕。在清咸丰年间，即有汉人在此贸易。伏汛时期，浸过低洼地亩，湿润可耕，遂贿通蒙古

下级官吏，私行垦种。至同治初年，淤塞不通，地亦荒弃。同治六年，有四川人郭大义随军莅套，退伍务农，联合史二及李、郑二姓，组织四大股，推郭为经理，总其事。复将短辫子壕重新整修，并接挖干渠至板头圪堵，计长三十余里。艰苦经营历十数年，始告完成，故人称为老郭渠。郭歿后，其子明修继续经营。光绪十年，干渠向东修挖，经惠丰长、恒隆昌、致中和入乌加河，计长四十五里，费时十二年始行挖通，是为北梢。二十三年又接挖干渠，利用哈不太河入长济渠，转入乌加河。至二十七年，修挖告竣，长四十里，是为南梢。至此，两梢俱通，宣泄顺利，全渠始告成功，计长一百一十里。至三十一年，渠地归公，淤澄不堪。民国元年，始由第一师靳团长、垦务局长王济若筹款六万元，通盘修挖，水量骤然畅旺，为最盛时期。未几，又淤澄如初。此后经过官办商包，失败更甚。除废弛外，无可纪述。迨至十七年改为官督民修后，与其它各渠同时贷款修理。仍因经理不善暨黄河时常变动，渠口弗能稳定之故，缺乏成效。二十三、四两年，建设厅派整理员驻社，负责整理修挖渠口南梢，适值黄河水大，利用冲刷之力，始行拉通。然黄河移动无定，渠身坡度太平，数年间逐渐淤澄，亟应筹谋补救之法，图永远之计。全

渠灌域面积五千余顷，现有支渠六十余道，为八大干渠之一。

八、黄土拉亥渠之沿革

黄土拉亥渠，原为黄河冲决之天然河流，旧与兰锁渠同用一口，在鸭子兔分流，创于清同治十二年，系府谷人杨廷栋合股修成。其后屡修屡废，至庚子教案发生，达拉旗遂将该渠附近地亩租与天主堂作为赔款。教会又出资挖新口，接连旧黄土拉亥河，并重新修挖以灌溉陕坝及蛮会地亩，遂由商办转入教堂之手。民国七年，邓司铎由陕坝向东接挖，以浇灌大发公一带地亩，并退水于乌加河，向东北经长胜连圣家营子又开挖退水一道，迄民国十一年竣工，费银十万余两。十四年，达杭两旗地亩相继报垦。此渠已经绥西水利总局总办吕咸交涉，最后以无条件收回归公有，设立水利第五分局管理之。至十七年改组后套水利时，该渠已组织水利公社管理以来，水量畅旺，田禾丰茂，家给户足，村庄林立，遂为繁盛之区矣。计该渠至黄河起，至乌加河止，长一百三十里。该灌域面积六千顷，共有支渠九十五道。

九、杨家河之沿革

杨家河渠原为平鲁人杨凤珠创挖。相传杨某

先在西场贸易，乌拉河水甚大，常有运粮船筏自黄河经乌拉河、乌加河、乌梁素海，由西山咀仍入黄河，而达包头。时乌拉河有向东冲之支流。水退后，杨凤珠耕种管理之，故人称曰杨家河，为后套最先开垦地。至道光年，被风沙停没，水源断绝，杨家河遂从此荒废。迨至民国六年，河曲人杨满仓者，适包办沙河渠失败后，变更思想，另觅途径，转向荒漠之处创立基业，遂包租杭锦旗极西之地数千顷。并与附近各教堂接洽，借得巨款，订立浇过地亩尽先转租耕种合同，于是勘定渠线兴工开挖。经十余年之久，费银七十万两，始告完成。辛勤艰苦勉强支持，曾将家中金钗环开付工资，债台高筑，至今尚未清偿。其子侄春林、茂林、鹤林、文林，均因忧劳过度，相继早歿。该渠纯系生工，其直如矢。并同时开挖准葛尔河、老谢渠、三淖渠、陕坝渠、蛮会渠各大支渠，且有沙沟天然退水，水量畅旺，为后套各渠之冠。故其地虽开垦未久，而竟能成后套精华之区者，有由来也。当民国二十年，绥远建设厅收管此渠时，曾批示于原支修渠未抵清前，认为自修渠，准其自行管理。但杨氏父子对于岁修花费，毫不吝惜，且不计盈亏，不畏繁难，是以历年修理，日有进展，概未少有废弛。嗣因历年收入渠费不敷甚巨，地方人士不明内幕，反有责

言。在杨铎林经理任内，于二十八年呈请上峰，邀准另行选人经理。计全渠灌域面积七千顷，较大支渠有六十九道，子渠连贯有蜘蛛网，多系杨氏父子经手修挖。杨氏之功绩，可与王同春并垂不朽，后之经理者曷鉴诸？

十、乌拉河渠之沿革

乌拉河原为天然河流，水势甚大。相传可通至乌加河，经乌梁素海、西山咀仍流入黄河。彼时，后套尚未开发。黄河附近常聚集匪类，劫掠船筏。运粮者为避免险计，多有经乌拉河绕道西山咀，以入黄河，而达包头者。时有杨凤珠，在乌加河附近经营蒙古生意，能号召一方，人称之为老大王，将乌拉河漫溢浇过之地，施以耕种，又将天然支流加以整理，谓之为杨家河。旋被风沙积压，前功尽弃。旋乌拉河下游亦被风沙雍塞，仍一变荒凉之区矣。厥后，汉人之来兹者日众，利用乌拉河之宽深处，整修而衔接之，浇灌其两岸地亩，迄今已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原长不过百里，至乾隆年间，绥西场杨大义赓续接挖三十余里，共计长一百二十三里。该河因东有杨家河之阻隔，无适当退水路线，近年屡遭淹没。自由包西水利局收管后，将天生壕支渠劈宽挖深，直达太阳庙沙滩，作为退水。二十七年，在临河

水利分局管理时期，复请准由该渠梢接杨家河之三淖渠，开挖新退水衔接工程。虽然完成，但以遭三淖渠人民拒绝及三淖渠低洼未能遵令整修之故，终未放水试验。该渠上游在渠口附近属绥远地界，再下为宁夏磴口县所管，至下游平定平西两乡，又为绥远治地，致水利行政不能统一。上中游属于磴口者，分四坝。各坝有坝头管理之，均在宁夏境内。修渠费用按旧例，四坝担负六成，绥远境西场四成。虽有如是之规定，而实际下游摊款浇水均有无限困难。绥远建设厅有鉴及此，曾于民国二十三年，召集宁夏省府在临河开会，讨论乌拉河整个行政治渠各办法。各派代表参加，表决议案数起。公文往返颇费周折，似有统一渠政之可能。惟闭会未久，各行其是，年复一年，水患频仍。处此特殊情形之下，须待下游人民之加倍努力，促成退水工程，深望注意及此。约计全渠灌域面积二千余顷。在下游绥远境内者，有大支渠六道。该灌域内村舍林立，老树栎杈，为后套最古之区域云。

十一、民复渠之沿革

民复渠原名扒子补隆教堂渠，俗名曰洋人渠。原名塔布渠灌域，地亩自光绪庚子教案后，划其地与耶稣教堂耕种。法人费牧师始开挖此

渠，计长五十余里。至民国十九年，达旗报垦归公丈放后，该渠在官督民修政策之下，当然收为公有，改名曰民复渠。当是时也，渠道失修，废坏不堪。嗣经历年督饬修理，始有进步。计全渠灌溉面积一千八百顷，支渠三十九道。

十二、民新渠之沿革

民新渠原名韩元庆渠，系光绪三十年包商韩元庆创挖，继由杭锦旗收回，设立合少公中管理之。然因蒙人不识水利，时修时废。至民国十七年，蔺振业包种该渠地亩，于十八年另挖新渠：自黄河起至人字渠止，计长二十余里，宽三丈，深六七尺不等。嗣毗连杭锦旗东界之达拉旗地亦放垦，又由领地人凑资接挖。并由平市官钱局贷款五千元，出梢于王六子壕。蔺本年垫款达两万余元之谱，设计督工，辛劳备尝。蔺某幼失怙恃，孤独无依，常为人牧羊，故人皆名之蔺羊倌渠。二十二年，包西水利局收归公有，改名曰民新渠。旋并归长济、塔布、民复、民新四渠水利总社统辖。历年修挖，颇见进步。至七七事变，紧邻敌区，人民逃散，不敢兴居，渠地亦因之又形废弛矣。全渠灌域面积一千余顷，有支渠三十九道，为后套极东之较大渠道。

十三、民兴渠之沿革

民兴渠创挖于民国二十一年，原为杨家河渠、准葛尔河灌域。因水不敷用，干地连阡，地方人民遂另谋出路，开挖新渠。复以困苦无力，由黄羊木头、乌兰淖两村人民订立合同，公选段文清为经理，向天主堂借款八千元，始得兴工。告成后最初命名为黄乌自修渠。二十二年呈报绥远建设厅备案，改名曰民兴渠。全渠长六十里，宽两丈，仅灌溉黄乌两村地亩。厥后历年扩充，颇有成效。惟因无处退水，水大无用，必须堵口。辗转间，下游即遭淹没。二十六年，临河水利分局管理时期，接挖渠梢至黄土拉亥之三大股支渠，拟藉以退水入沙沟、转运乌加河。时黄土拉亥渠水势甚大，亦利用三大股渠为宣泄之处；又因渠身较低，恐受淹没之患，群起拒绝。酝酿经年，终未实行。严重之退水问题，迄今仍未能解决。计全渠灌域面积约八百余顷，为后渠开挖之最后渠道。

十四、乌加河总退水之沿革

乌加河为黄河故道。相传原黄河入套，南北分流。南流即今之黄河，北流由付家湾、梅令庙等处转入阴山之麓（即乌加河）越昆都仑沟汇于

乌拉山之前泊。清初北流断绝。旋付家湾至乌加河及乌加河昆都仑沟之两端，被风沙压平。但深沟淤沙尚有片断之遗迹，宛然在目。自各大干渠完成，统以乌加河（俗称前河）为天然退水。两岸之地，始得灌溉。安北烧壕内得利独厚。河北有乌拉壕（俗称后河），亦用为引水支流。然地势高亢，非在河内筑坝激水，弗能普遍灌溉。民国十七年，议定前后各分八坝。嗣杨家河渠挖通，退水日多。乌加河因无尾间汇聚之水，统归乌梁素海，以致日益澎湃漫溢，面积达四千余顷，皆系安北之地。至二十四年，绥远建设厅鉴于水患严重，拨款两万元挖西山咀退水，始转入河。但水多渠窄，又似乌梁素海地形洼下，势难釜底抽薪。二十五年，又令另测新退水渠线，拟自义和元开口，直达西山咀双全店，计长一百一十里，坡度为一万三千二百分之一，颇能适用。二十六年绥远建设厅冯厅长子和请准省府拨款二万五千元，动工开挖。未几，因事变停工，仅节段完成二里许，费款一万余元。二十七年，陈总办怡庭、白坐办月亭，复呼吁倡导，催收省府指拨之五临安三县普耕贷款（原贷款五原两万，临河六万，安北一万元，共九万元）继续接挖动工。截至二十八年封冻，即完成十三里渠，与通济渠北梢衔接一处，计费款三万九千余元。惟值全民抗战

时期，差徭繁重，人民困苦，只征起农贷款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余元，连同上年结存一万零七百九十余元暨平票盈余二千七百八十余元，共为二万四千八十元，不敷开付工资，又向地方士绅告贷五千八百六十余元，向绥远省政府借三千元仍属不敷。无已，将绥西水利局经费挪垫五千四百六十余元，方始将工资付清。在抗战极困难时期，艰苦支持，勉强应付，卒告一段之成功。现通济、长济下游赖其灌溉，均获恩泽，刻仍在设计推进中。如能仍照计划完成，则后套之水患问题，庶可解除过半矣。

十五、民祥渠之沿革

民祥渠在西山咀之西，原名吴祥渠，系民国六年吴祥创挖。至黄河起，入王六子壕，长三十余里，费洋三万余元。初次放水，极为畅旺，适时黄河北移，当年即将渠身淤澄十余里，能浇地三十余顷。次年黄河又向南转，淤澄更甚，竟至滴水不入。本人以无力修挖，转包与朱庆林之手管理。两年毫无进步，经过两人之失败，遂致无人过问。此后形成废渠，只有少数人提倡重新修挖。然因不能团结，终成画饼。至二十四年，该渠人民申请长济等整理员并归一社。二十五年，由人民自行垫款二千余元修挖渠口，改名曰

民祥渠。此后仍由人民垫款整修，以应征渠费抵还。计灌域面积四百余顷，支渠十三道。每年可丈青苗地五六十顷。现因渠邻最前线，人民不能安居，渠道亦受牵连矣。

绥西各自修干渠道概况

一、召滩渠

查本渠长二十三里，宽一丈六尺，深四尺，灌域面积约四十余顷。由渡口堂起，经和平乡至王爷地止。于清光绪三十年，由补隆淖天主教堂承包杭锦旗地支款，经赵商人开挖妥以后，分给各教友耕种。自民国二十三、四、五年，河水陡涨，竟被淤澄，有干旱之虞，正拟设法修挖。

二、十股渠

查本渠长十五里，宽一丈二尺，深四尺，灌域面积七十余顷。由黄土拉亥渠口起，经康家圪旦及镇番圪旦至侯家圪旦止。原系民兴渠支渠，于民国二十年经杜维周另开新口。二十四年改推刘二牛经理。二十七年又改推王润牛经理。现已淤澄，拟筹款修挖。

三、三大股渠

查本渠长九十里，宽四丈，深五尺，灌域面积约有五百余顷。由马厂地起，经永胜、永嘉乡至桃元公止，系田喜亭、赵海、李增荣三股出资修挖，故以为名。开挖于民国六年，嗣于民国八年、十二、十六年、十九年继续接梢修挖，而成今日之渠形。

四、色尔蓓亥渠

查本渠长二十里，宽一丈四尺，深三尺，灌域面积约一百七十余顷。由兰锁渠口西起经杜四增、曹家、张四泉、鱼杨三等圪旦至沙海子止。于清光绪八年由王文祥开挖，并于光绪三十年以地户股的办法接梢修挖。光绪三十二年，公家放垦收归公有。民国五年，由地方人自修之，公选由乡长代管渠政。民国二十八年，地方公选经理管理之。

五、兰锁渠

查本渠长七十五里，宽四丈，深五尺，灌域面积约九百余顷。由永济渠口西起，经永圣、永宁、永康、永福、永加等乡，至达拉地止。原系

天生壕，清光绪三十一年由垦务局开挖，三十三年始告竣工。宣统二年由李三夸子管理，并接续修挖。民国二年，公选李增荣经理。后按工程大小，陆续修理之。

六、五大股渠

查本渠长一十五里，宽一丈，深五尺，灌域面积约四十余顷。由永济渠口东起，经永兴乡、和圣源、陈三杨家等圪旦，至教育基金地止。清光绪初年，兴工修挖。至所需款项，以五股均摊，因此取名五大股。地势偏狭，佃户较少，经营数十年，未获利。又兼经理谢昆山逝世，更为废弛。至民国二十六年，公推张振铎为经理，当即兴工洗挖。又遇黄河南移，只由一小套河进水，水稍底落，灌溉即感困难。如欲振兴水利，非重改挖新口入手不可。

七、魏羊渠

查本渠长二十八里，宽一丈二尺，深四尺，灌域面积约八十余顷。由塔尔湾起，经永兴乡至临河西门外止。在宣统元年，由魏经理所挖。中间淤塞十余年，不能灌溉。后由李庆荣经理，修挖畅通。

八、天德元渠

查本渠长三十二里，宽一丈，深五尺，灌域面积约六十余顷。由塔尔湾起，经永兴乡至永刚渠桥东止。自清光绪年间，有商家名天德元者开挖。此渠确系天生壕，天然形成一道沟壑。迄光绪二十年，始选定王福田经理。至光绪三十三年，更换经理李子卿，继任至民国二十二年间挖永刚渠，始将此渠截断，颇费交涉。当许永刚渠以东以南，归此渠所辖。嗣后因渠短、水弱，旧口淤澄，又在塔尔湾开一新口，水流尚畅，至民国二十六年，改选张振铎经理之。

九、德成渠

查本渠长三十五里，宽一丈六尺，深四尺，灌域面积约二百余顷。由塔尔湾东起，经永昌乡至赵二圪旦西北，归入永刚渠。开挖以来，业经数十年之久，经理之人诸多逝世，历历细情，无法稽考。查民国二十四年以前，经理蔡来子失于检点，竟将该渠淤成底背相平。至民国二十五年，改以吕宝山为经理，借款修挖，水利复兴。及至二十八年，又改选李元守经理，亦肯负责。现此渠较有进步。

十、土默渠

查本渠长四十八里，宽一丈四尺，深四尺，

灌域面积约一百五十余顷。由马厂地起，经永昌乡、义生成至帐房王三等圪旦止。以在土默地，即名之曰土默渠。原为蒙人牧畜场，后与汉人接交，渐知种地利益，于光绪三十三年始由蒙人土默二字完成此渠。嗣因包出废弛，宣统三年，由昱立樵系奉天人，将此地买成转包与茂业成承管，重新洗挖旧渠，从此又见完整。纵有淤澄，时坏时修，因此将近二十年之久，并无废弛情形。至民国十九年，由昱立樵转售与茂业成等众花户，经过四五年之久，渠身渐次淤澄。至二十三年，另觅新口，由各花户选举经理焦长门重新整修，灌溉较易。至二十六年，改选经理，此经过之情形也。

十一、户口渠

查本渠长三十五里，宽一丈二尺，深四尺，灌域面积约一百余顷。由杨满子圪旦起，经永昌乡、汪家台子、靳家台子等村至孟鱼子油房止。灌域系杭锦旗王爷纳素朝之地。光绪七年，自行雇工开挖，招户垦种。迄民国三年，纳某去世，后继由伊乎阿吞格利管理。因年幼不谙世事，不数年间，遂行衰落。至民国六年，始由住户靳大向阿某包出重新修挖，十余年并无缺水情形。至十八九年，天道亢旱，黄水浅低，由靳某等借款

择要修挖，后于二十一年垦务放地，所有之地，半为各花户买出，无人整理，逐渐废弛。至二十六年，花户环请靳大整理。适逢黄河南移，虽费尽心力，求收实效，每年在黄水暴涨时，或可灌溉，否则由土默渠借水灌田。

十二、刚目渠

查本渠长八里，宽八丈，深八尺，灌域面积约十三顷。由炮台起，经永泰乡至孟鱼子油房止。据闻此渠系王同春在光绪二十三年间开挖。因系新挖，水势盛畅；即有淤澄，时坏时修，迨至民国七年，渠口废坏，地方人困难无力整修，因之渠废地荒。嗣于民国十六年，经花户吕宝山、杨振业等出资修挖至中途，黄河南移，旋即停工。延至十八年，由永济渠经理韩仁山召开会议，从永济渠挖口，仍用旧刚目渠下游之渠身引水灌田，较前更觉适用矣。

十三、同兴德渠

查本渠长十二里，宽一丈，深四尺，灌域面积约二百余顷。由丰济渠起，经过同兴德村、四分子滩至白占元渠止。于民国二十年四月间，经辛某开挖。

十四、长青牛渠

查本渠长二十九里，宽二丈二尺，深五尺，灌域面积约五十余顷。由黄芥壕起，经过白二挠、丁红、谢拉五、王家喜等村至韩六沙后止。于同治年间，经倪长青牛开挖，故名长青牛渠。

十五、厂汗淖渠

查本渠长二十五里，宽五丈，深七尺，灌域面积约四十余顷。由正义乡所属之塔尔湾起，经鳞头合少西商公中至石屈圪旦兴盛渠止。于清光绪年间，经毛姓开挖，故又名毛家渠。

十六、旧皂火渠

查本渠长七十里，宽三丈六尺，深八尺，灌域面积约五百余顷。由杨三淖河头起，经过正义、和瑞两乡至场包止。此渠原系天生壕，于民国六年整理成渠，嗣后又经白二修挖。

十七、新皂火渠

查本渠长一百三十里，宽三丈，深六尺，灌域面积约五百余顷。由塔尔湾起，经过正义和瑞小庙子明轩村负暄和悦等乡至乌加河止。此渠原系神柳子圪旦至贾三人渠接引丰济渠之退水灌溉。

于民国六年，经王同春由塔尔湾开至三合公。二十三年，续挖至乌加河。

十八、新义渠（即熊万库渠）

查本渠长四十里，宽一丈八尺，深四尺，灌域面积七十余顷。由杨三淖圪旦起，经过史大柜沙窝至史大柜止。于民国二十四年间，由常兴堂开挖。

十九、广泽渠

查本渠长六十里，宽一丈，深六尺，灌域面积约五百余顷。由德顺和河头起，经过正大、正义两乡至小庙子村止。于清宣统元年四月由任常有开挖。

二十、中兴西渠

查本渠长三十里，宽一丈八尺，深四尺，灌域面积一百五十余顷。由德顺和河头起，经过正大乡至四道堰子止。于民国七年四月间，由中兴西财主姜言杰开挖。

二十一、邬家地渠

查本渠长三十五里，宽二丈，深四尺，灌域面积约二百余顷。由德顺和起，经过机器圪旦至

赵海停圪旦止。原由邬姓在清光绪年间开挖，后经垦务局邴总办于民国初年重新整修。

二十二、哈拉乌素渠

查本渠长五十里，宽二丈，深五尺，灌域面积约二百五十余顷。由公中堡经过工头圪旦、李银记圪旦至正风乡之蛮圪素止。于同治年间，由肖瑞开挖。

二十三、阿善渠

查本渠长五十里，宽一丈五尺，深五尺，灌域面积约一百八十余顷。由公中堡起，经过正风乡至正风乡之蛮圪素止。于光绪年间，由肖瑞开挖。

二十四、十大股渠

查本渠长三十里，宽一丈，深三尺，灌域面积约八十余顷。由阿善渠口东起，经过南十大股至十大股止。此渠本系天生壕，在同治年间，由张老六整修成渠。嗣后因开挖沙河渠，从中切断成为断渠，有碍灌溉，逐渐废弛。以后拟筹款修挖。

二十五、哒啦渠

查本渠长四十五里，宽二丈，深四尺，灌域

面积约五百余顷。由王来仁河头起，经过张秀桂西牛犊、敖利不利等村，至南牛犊大坝止。在清光绪二十六年，经王同春开挖，嗣后由李庆林包办其地。民国二十三年，垦务局收放移民，现仍为各移民耕种。

二十六、李仲宝渠

查本渠长三十里，宽一丈八尺，深三尺，由七虎子河头起，经过李仲宝东西敖池杨银珠老谢村等，至芦官壕止。灌域面积约二百九十顷。此渠之地，系李仲宝包到天聚公之地，并于民国八年由李仲宝开挖渠道，故以为名。后由垦务局卖与彭化芳承管。

二十七、永成渠

查本渠长二十五里，宽深四尺，灌域面积约一百五十余顷。由捣色湾起，经过塔布什拉至王留子壕止。此渠之地系蒙古哒拉地由韩二白包出。在清光绪三十年开成渠道后又由哒拉旗收回转包于什令拉米。

二十八、刘三地渠

查本渠长二十里，宽一丈三尺，深六尺，灌域面积约四百余顷。由魏家河头起，经过永泰乡

至天吉大桥止。此渠所属之地，在民国三年前为杭锦旗蒙人牧畜场，由刘三润、明亮二人承包。于民国四年春季，集资修挖。厥后，由公家垦殖，遂售予崇原堂。嗣后又转卖与威厚堂。于民国十九年，又转卖与仁和堂，即重新整修。至二十年，仁和堂将此地出包于屯垦队，渠亦随之归其经营。二十九年，黄河水低落，水流不畅，因力量单薄未曾修挖，至今依然如故耳。

注：河套八大干渠之沿称，于清中叶时期便形成。清光绪二十八年，欲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此时将各大干渠收买归公。八大干渠：

1、永济渠，2、刚济渠，3、丰济渠，4、沙河渠，5、义和渠，6、通济渠，7、长济渠，8、塔布渠。此时因乌拉、杨家、黄土拉亥渠未列入内。黄土拉亥河，由天主教管；乌拉河，绥远省和渠道范围宁夏共管，非在垦务之内。

民国年间组织了十大干渠水利社，十大干渠之沿称：

1、乌拉河，2、杨家河，3、黄济渠，4、永济渠，5、丰济渠，6、沙河渠，7、义和渠，8、通济渠，9、长济渠，10、塔布渠。刚济渠于民国十八年，王同春改挖丰济渠口，被打断后归永济灌域后取消。此为八大、十大干渠之大概情形。

(临河政协供稿)

黄杨闸 解放闸施建简介

刘培荣 史明德

黄河灌区创于汉唐，盛于清末，是一个历史悠久几经兴衰的引黄灌区。过去后套灌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既未作长远打算，也没有短期安排，更谈不上科学管理和技术设施，各自为政，各司其事。因而在黄汛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尤其后套地形系由西倾东，各引水渠皆由南趋北、或自东南而下东北，各渠之水流从口到梢，大都逆势而上行。致使水利效益与灌溉面积都受到一定限制。原来各大干渠之渠首，多就高处修筑，昔日虽进水易，但因黄河河道变动，水位降落，而致进水殊难，使引水发生了困难，势必进行改建，以趋利而避害。尤其经过八年抗战，后套农民负担奇重，农村经济已至“十室九空”的危机边缘。后套一向以粮食生产为民生之基础，农业以水利建设为第一要务。故于一九四五年傅作义主绥时，在陕坝成立了四首制石闸筹备委员会拟将后套多口引水，草筑闸口的旧习加以改变，计划统一规划为四首制石闸。四首制石闸即：黄济渠杨家河闸、永济渠闸、丰济沙河连环渠闸、义和渠闸。黄扬闸灌域属于后套灌区的一部分，位于后套西

端、设灌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包括着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三大干渠的进水，原系引黄直口灌溉，除杨家河是由人工开挖外，乌拉河、黄济渠均系天然壕沟所形成。这些渠道在解放前因渠首无控制设施，而引黄又任其自流，水小则旱，水大必淹，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连年不断的遭受黄水灾害。由于灌区退水无排泄渠道，致使引黄灌溉的余水，大都退入乌加河，该河亦无排泄出路，而导致了乌梁素海的不断扩大。据资料考证，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就在这十六年期间，乌梁素海已由七万亩逐年扩大到九十余万亩，由此可见八十多万亩土地被灌区尾水所淹没。

一九四七年前后两次在乌拉河渠口试建，由于黄河水位升降幅度较大，结果只挖了两个大坑，劳民伤财，无所进展。群众气愤的说：“折腾了一年半，挖下两个坑，一曰坑国坑，二叫害民坑，闸基成了沙口袋，渠首移位到耳朵。”黄杨闸经过四年时间的筹建，仅仅做了一些护闸基土方工程。

一、四首制石闸之机构及人事

一九四五年秋冬之际，在陕坝成立了四首制石闸筹备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主任委员王文景、副主任委员王庆轩、白焕瑜 各县县长、参议

会议长均为当然委员，计：

五原：张玉璞、白焕瑜

临河：高映明、王炜

米仓：王中、赵士英

狼山：刘璞、赵伯雄

晏江：张亨信、张鉴三

安北：陈质文、韩士甫

陕坝：王乐天（省参议员）

下设办事机构、总务、工程二处。

总务处长白焕瑜，工程处长边子元，每处设工作人员四至六人，分别按各自主营业务开始筹备工作。

二、绥西水利建设委员会之组成及机构

为了适应和推动水建工作，一九四七年绥远省政府又将四首制石闸筹备委员会改组为绥西水利建设委员会，地址设在陕坝绥干团旧址，其机构人事如下：

主任委员王文景（省水利局长），副主任委员国祯（绥西行政专员）、赵伯雄（通晓水利的地方人士），委员仍以各县县长、参议会议长为当然委员，计：五原：刘思之、刘仁俊；

临河：樊库、崔玉春

米仓：张风来、刘培荣

狼山：高淑远、赵伯雄；

晏江：郭映宽、李逢春；

安北：王元魁、韩士甫；

陕坝：王乐天。

特邀委员：赵家璞、白焕瑜、李述唐、王乐愚、李干臣、贾八宝、陈克忠、周二马、汪增祥，并推举王文景、陈国祯、赵伯雄、白焕瑜、赵家璞、王乐天为常务委员，李述唐为驻会委员。

委员会下设总务处、工程处。

总务处长白焕瑜，副处长王午亭，工作人员有徐益之、高彤云、马步蝉等人；

工程处长赵家璞，副处长陈瑞琮，工程技术人员有陈靖邦、王维舟、刘尚杰、梁九顺等人。

三、黄杨闸的资金来源

(1)着手筹建时，傅作义又以善后救济总署晋察绥分署向张彝鼎洽妥，给拨了一万袋加拿大面粉每袋五十公斤，由赵伯雄经手在归绥变价处理，由唐山购回一万袋水泥（等于一袋面粉换一袋水泥）。(2)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水利部为资助黄杨闸工程捐款一万金元券，相当于一万元银币。(3)绥远省政府从后套仓虚空票粮内拨给了一万绥石糜麦，每石三百市斤，实际收回的仅有五千绥石（一百五十万斤）。米仓、临河、狼

山按拨付的粮数，只交了三分之一；五原、安北、晏江抓得很紧，也只收回了三分之二。后将所收回之糜麦，买了胶车十辆，大船五只，汽车两部（内小吉普一辆），由工程处长赵家璞从天津运回。赵家璞又从宁夏石咀山给购回石子几千万斤，柴油机一部以及解木料用的轮锯一盘，一并运往工地。赵又从兰州购妥一千几百根木柱，亦责成高彤云运到闸口处。（4）傅作义从察哈尔宣化给黄杨闸拨来十吨烂铁，由白焕瑜、王午亭前往洽办，运回后套全都打成铁锹，运到工地使用。以上四宗资金来源，合计当时银币五万元左右。

四、解放后黄杨闸工程处之成立 及其机构与人事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起义，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绥远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对黄杨闸的施建非常关怀，省水利局副局长李质同志亲自来陕坝视察水利，成立了黄杨闸工程处。关于水建会所备之料，全部移交给黄杨闸工程处接管，李质同志主持了交接事宜。并鉴于历年黄河洪水灾害，对后套地区的农业生产，影响范围较大，党和人民政府决心要把黄河治好，要把黄杨闸尽快建成，以消除水患，造福后套人民。

黄杨闸工程处之机构与人事安排：工程处处长赵家璞，下设工程、政秘、后勤三科。工程科

科长陈靖邦、科技人员有王维周、刘尚志、梁九顺和陈志斋等人，政秘科科长康玉龙。后勘科徐益三、高彤云、招工队队长马步谦。

五、黄杨闸兴建时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三月正式开工，参加的民工四千多人，其中有米仓县一千五百余人，临河县一千余人，狼山县六百余人，晏江、安北、五原县亦派来一些民工，但为数不多，三县合起来不过一千余人。

黄杨闸兴建时，四面八方都来支援，整个工地欣然成了一个小集镇。帐棚遍野、货摊林立、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小商小贩也云集于此。可谓热闹非凡、购销两旺，呈现出一派火热的气氛。

临河的民工队由永济渠管理局局长李洪臣送往工地，临河水利局工程股股长史明德和赵承州、马秉和带队，并承担黄杨闸泄水渠开挖任务。因难度大，临河队一马当先，勇挑重担，进度快、质量好，誉称为“临河老虎队”，后来被评为工地上的先进县队。并在评议会上选出临河三区光荣乡王巨才同志为“特等模范”。新华、民乐、杨盖沟的民工队长高牛小、队员王七小（外号叫半挂车）被评为“一等模范”。工地上还给编了一首顺口溜：“新华、民乐、杨盖沟，黄杨闸上显身手，民工队长高牛小，勇挑重担带了头。”米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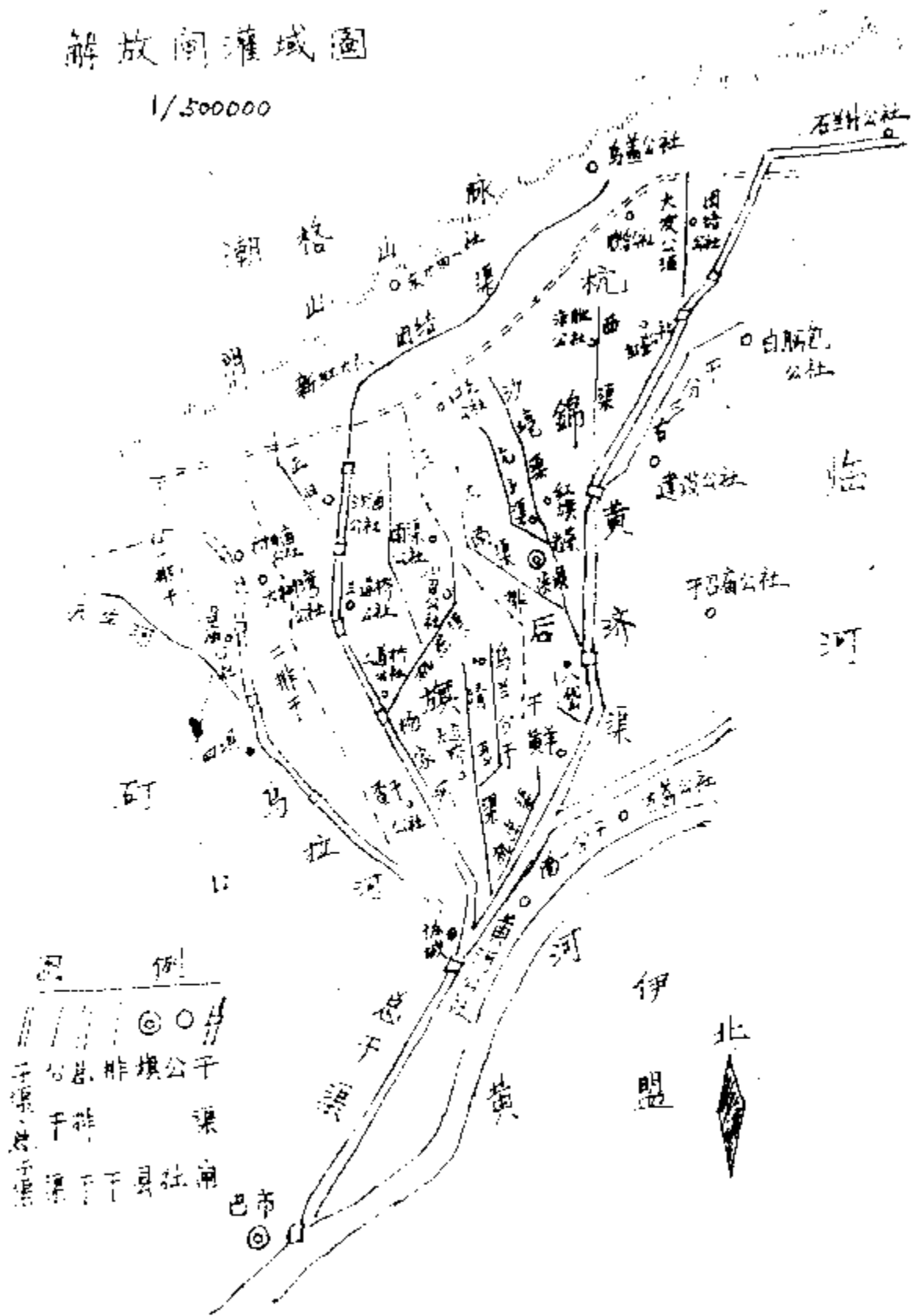
县民工分配到石闸工序上劳动，他们在工地上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潮，受到了好评。

一九五二年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提前放水，除工地上的大量民工和招工队的劳力外，又增加了一部分劳改的犯人，他们在人民政府的劳改政策感召下，同样也展开了立功赎罪的劳动竞赛。黄杨闸于一九五二年顺利建成，改名为“解放闸”。它是屹立在河套平原上的一座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主体枢纽工程和泄水渠工程。总计投资三百二十多万元。

黄杨闸的建成，不但杭锦后旗受益很大，而临河亦有所效益。如临河合济渠、东三大股渠，以及南一支渠等之进水，是从黄济渠开口，浇灌着干召、丹达、建设、白脑包、黄羊、友谊、团结等七乡境内之部分土地。因而临河灌区虽以永济渠为主，但黄济渠的进水，也发挥了辅助作用。为了纪念解放后河套水利成果，遂于一九五二年竣工时，将黄杨闸命名为解放闸，管理局设在补隆淖尔北闸西，后迁到陕坝。一九六三年人民政府修兴建了黄河枢纽工程，修建了总干渠，黄杨闸通称为总干一闸。工程质量经过十二年时间的考验，仍保持了施建中的设计原状。

解放前灌域圖

1/500000



河套公路杂忆

石兆奎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率绥远省军政驻河套。设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绥远省政府于陕坝。

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后，河套公路十有九破坏。一九四一年五月，建绥远省公路管理处于陕坝，为该省最早的省级公路管理机构。

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处随省府迁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留设省公路处陕坝办事处，以后又改为陕坝公路管理段，主管绥西河套公路管理与修养业务。一九四八年七月绥远省撤销公路处后，陕坝公路段改为省建设厅直辖的绥西河套公路专业机构，一直到绥省“九·一九”起义。

绥远省公路处（段），于陕坝设置历时八年。其间绥西河套公路与航运交通有较大变化。仅据个人在该处工作之经历与耳闻目睹，缕述一二，以期有补于河套公路之沧桑。

（一）

一九四一年，是傅作义将军于抗日战争中取

得胜利的“五原战役”之头一年，绥远省府此时已迁往陕坝。由于河套道路大多数破坏，交通阻断，恢复通车迫于眉睫。仍由省建设厅交通二科承担已不能胜任，道路修建计划方案及指挥发动兵工修路的工作陷于停顿。河套公路之专业机构，绥远省公路管理处因事而生，隶属省建设厅，并委派建设厅长许其昌任第一任处长，立即筹建，以使河套交通早日畅通。

许其昌山西赵城人，毕业于太原育才馆。以主建山西某公路著称。一九三三年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兴建五太（即今陕五北线）公路时，聘来河套主办该工程、工竣留用。绥远省府迁陕坝时，许以其公路业绩受任建设厅二科科长，以内行身份主管政务。他搞公路设计施工或可，但发动兵工修路或现场指挥则力所不及、困难殊多。许其昌当了公路处长，不论是出入于修路现场，或频频与军人接待皆大伤脑筋。莅任不久即以他故离职。接任者是一位军人出身的高级幕僚赵恩绥。这位赵处长绰号赵迷糊；他每天散步聊天，悠然自得，岂能专心路政，又何能把“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恢复公路通车的重担挑起来，按时完成上方所赋予的任务。在河套军民不满中，傅先生（当时对傅作义称号）对他岂能久留，也就无声无息的下台，不知去向了。第三任公路处

长，由一位少将衔的八战区副长官部副官处处长温永栋兼任。温以军政大权在握，搞军工修路、指挥军民调配得心应手。调军队修路谁敢不听他的命令，征民夫上来那个敢抵制！但傅作义这样安排，也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温永栋经常忙于军务，不能全力致于交通。乘机把这个兼职公路处长让给他的助手（副官主任）刘鉴训。

一九四三年秋，刘鉴训以上校副官主任职，晋升为省公路处五级（行政职）处长。

刘鉴训名建勋，字荇忱，山东平阴人。幼年家贫，曾就学私塾三年即弃学从商。时值农村破产，商业萧条，家中人多，不能度日，目睹军阀争权，列强辱国，乃弃商投西北军入伍。后又转傅作义部充文书。一九三六年参加“百灵庙”抗日战役升军旅文书，一九三七年初调绥省国民兵少校书记官。“七七”绥包沦陷前随国民兵退入河套任中校副官主任。傅作义将军进套组建长官部后，升上校副官主任。刘素以处事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常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自勉。对上级毕恭毕敬，保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尤有独到之处。因常出入于傅作义身边，是多次受傅表扬之中级干部。

刘鉴训到了公路处，的确人手不凡。他一面报请上级批准扩大机构。把原来只有二十人专修公

路的机构，扩充为绥省全权的交通管理机关，综理水陆运输之全部，不久又兼任了绥西军电局局长。他广招工程技术人员及各种木、铁、砖、石技术工人。把一向默默无闻的小单位扩展为十几个科、室、队达三百人，从而扬声西北。他把以专家自居的第一任处长许其昌，几次拜门求教，最后请来充任其助手，屈任副处长。两人珠联璧合，七年来为公路修建出力颇多。当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胜利，刘鉴训随傅作义东进后，许其昌便代理处长，达三年之久，至该处撤销。

刘鉴训于陕坝为主持绥省公路大兴土木，使当时河套公路面貌有所变化。他亲率工程技术员工，由三盛公过黄河去河东、经萝贝召，百眼窑，棋盘井、直达石咀山间反复勘察绥宁公路改线工程，经过三次始定线新修，从而为包宁公路，即今日包银干线伊盟至乌海段奠定了较好基础。

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将军部队驻绥西，首建的包宁公路，原三盛公至石咀山段，系由三盛公西南而行、经二十里柳子，穿跨“乌兰布和”沙漠，沿黄河西岸过老磴口、上江、河扬子而达石咀山的。该线不仅穿沙、傍河，行车异常困难；且有塌岸之险。沿途人烟绝少，盗匪出没无常，截路抢劫，图财害命事件屡生不鲜，车旅叫苦怨

声遐迩，历年虽有改线之计，说说而已无人兑现。

刘鉴训到职后，把原绥宁三石路（三盛公至石咀山）段，改线河东后，确实获得了车旅的欢颜。汽车得以畅行于戈壁草原上，此则省公路处改建公路之硕果。该线自一九四四年，正式通车于今。一大批公路员工所付出的艰苦劳动亦绝不能泯灭。

（二）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阶段。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穷凶极恶扰民愈烈。抓壮丁抓得路断人稀！河套地区也不能例外。适值公路处大兴土木之际，只靠一批“官兵”修路，实乃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唯有另谋地方以增人力之不足。办法为：一、征派民夫修路。各村镇既然已没有壮年，那么征派体弱的老汉们去公路处充夫顶数，也较无人好。可是供给军队的豆制副食品，是由地方承担的。由军队把黄豆发给各乡镇居民，由他们负责生豆芽，做豆腐以供军需，这些事多为农村老人所承作。但豆腐房的老汉们被征去修路后，豆制品生产只有由留在家里的老婆婆们去承担。于是“老汉去了公路处，老婆婆应差豆芽铺”的顺口流就出来了。

二，用省监狱中的犯人修路。经傅先生批准，提出一批在押的轻刑犯人到公路处修路。刘鉴训起初觉得不妥，经多方面研讨无一致管理办法。带刑具上路干活，既不利操作，且有碍观瞻，取掉刑具，又怕犯人乘机逃跑发生问题。不用这批人力，既违抗上级指示又失了一批无偿的不讨酬的劳力。最后还是取得了一项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折中方案。即“先礼后兵、先小人后君子”的办法。首先在公路处的铁工班赶制了一批刑具手拷、脚镣，作为对那批犯人逃跑、捣乱者的处罚工具。把犯人接收到公路处后，由刘鉴训向犯人讲话，说明傅先生的指示是看他们此行表现，积极修路表现好的，年终竣工一律将功折罪，遣返回家或释放后留公路处当工人；调皮、捣乱的则从严处罚带刑具上路……。由于用这种办法，那批犯人在修路中，不论是修陕坝至三盛公段，还是修黄河东三盛公至石咀山间的改线段，均无反抗行为，全年施工表现不错，所以那批刑具并未使用。不过此举，社会上人们不明内幕，流传着“公路处阎王殿，制刑具管囚犯”的口歌。

有了这批劳动力，充实了公路处，投入了河套公路整修上，刘鉴训到任三年顺利地整修了陕五南北线、陕兰线、三石段改线等主要干线外，还

新辟了陕大（陕坝到大顺城），陕梅（陕坝到梅林庙）、五万（五原到万和泉）等九条支线。总计干支公路近五百公里，是旧中国河套地区公路较大变化时期，达到了各线都能通汽车的要求。此外还为傅作义将军修建了接待外来人员的住处——塞上新舍。

但是，公路处也并不是清白无污，1944年冬，公路处新调来的测绘员因为犯了强奸并杀害受害者丈夫的罪而被长官部侦察处逮捕枪决。1945年春该处牛科长，也因贪污一项巨款而被逮捕法办。

（三）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刘鉴训忽然接到临河电话：“马道桥告急！黄河冰块已从永济渠口进来了，先头凌块已流过马道桥、大冰块正汹涌冲撞桥柱，可能桥毁路断……。”他立即把工程科长李长青找来商量防护办法。

李长青宁夏永宁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土木系，系高材生，抗日战争中流落河套。陕坝最大建筑“中山堂”建修时，原由一位高技士主持设计施工，因高对屋架计算错误，修不起来，一再拖延工期，末几高弃职工停。省府招聘李长春继续设计施工。不数日屋架即按李设计安装完毕，

迅速建成，因此为河套人士所称誉。公路处组建后被任为技术科长。马道桥出险，刘鉴训自然要征求他的处理方案。经商定，由李带领石兆奎等工程技术人员携带破冰工具赶赴马道桥抢险防护。不料，他们刚要投入治理的一刹那间，就听得“咔嚓”一声响，桥塌人陷，桥面木料连续被水冲走，不幸落水的几位护桥工人有的堕落到大冰块上，有的落入水中，由于都是年轻体壮，也先后上岸脱险，没有伤人。

一九四五年新建的马道桥为深基大跨木桥（俗称吊桥）。那年春季，水利部门在旧桥上游两公里处将河道裁湾取直，新桥位选于旧桥上游500米取直道上，重建竣工时已是八月中旬。

突然，有一个夜晚，临河城内灯火齐明，爆竹声连连不绝，胜如白日热闹！发生了什么事？马道桥工地的员工们都莫名其妙。一会儿城里来说：“日本投降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了！”当真吗？人们纷纷跑去城里弄清楚。果然是真的。马道桥工地与居民老乡们也是人人欢庆，闹了个彻夜不眠！

第二天早晨公路处来了电话：“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天皇已发布日军放下武器投降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更大了，赶快使马道桥竣工通车，确保日内汽车通行。傅作义将军就要去绥包

受降，接收……”。

大约是八月二十日左右，果然傅作义坐在一辆大卡车里，由他的高级参谋李英夫开着，从马道桥第一次通过去包头了。

自从傅先生第一辆汽车过桥后，陕北的中央与地方军政机关人员、眷属何能久留，于是每天日夜车马行人不绝。那些军政官员们先后打着东进的旗号离开曾兴旺五六年的小城镇后，陕北立即出现了市面冷冷清清、商业萧条、十室九空的凄凉景色了。

五原至西山咀之路段几年来处于失修失养中，绝少数车辆来往；西山咀至包头段公路为日寇侵占区，公路处未曾插手。为了保证进绥包的路线畅通，绥远省政府发布了紧急指令，征集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民夫限期修好公路。公路处员工大部分下了公路，参加了施工与指挥。

过了些时，傅作义将军急电刘鉴训率一部主要骨干到绥远首府归绥（现呼和浩特市），接收整顿沦陷区公路任务。经过商定，由刘带百余名员工首批迁绥并携带主要工具设备东去。公路处迁绥后，河套地区公路管理养护，由许其昌负责，后来第二批人员赴绥，原公路处改为省公路陕北办事处，由秦宗益任主任，只有工作人员十余人。

秦宗益，山西河曲人，一九四一年绥远省公路处于陕坝成立时，由省建设厅派来，曾任工程员、技士、工程队副、科长等职。处事稳重机智，为刘、许二人所器重。但是原来一个堂堂三百人的省级单位，只留了十几个，安能全面管理其业务，从此河套公路每况愈下。原公路处大院，空空如也，真是走得痛快，留得凄凉。不久办事处又改为公路管理段。

此后，绥包汽车不断开来河套，陕坝汽车商运站点建立。东线（即陕包段）交通量日渐增加，转而成为河套的大动脉。西线（陕宁段）却日显冷落，车辆往来很少，而河套物资源源已转向绥、包、平、津。

不久，张家口、大同解放，切断了平绥铁路交通，河套西线交通量又日增，包头的商人找买卖跑运输，向宁夏、西安、青海等省市接洽营运。西货东来，东货西去，绥宁公路又开始繁忙起来。但公路管理段，虽然人力有所增加，终以交通量日增，公路连年失修，路况不断下降。过去所修的其他几条支线，也相继湮没，成为大车道了。

（四）

一九四八年解放包头时，国民党军的陕甘宁总司令邓宝珊就住在包头。他与其所部军长冯钦

哉等率领守军向河套一带撤来，河套地区的绥西警备军、骑兵师以及其他人员眷属都人人自危。五原、临河、陕坝主要城镇商铺纷纷关门停业，人们很少出入。

那时，河套公路以西山咀为界中断，汽车已不通包头。包头解放前几日，包头大量的汽车开到河套各城镇，而且都是“包车”，多数是由一批军政大员的官太太眷属包用。汽车上满载着她们的金银财物。他们又怕河套解放无处安身，就又一户或几户包汽车西奔宁夏、兰州找她们安身之地，到了三盛公却过不了黄河，被驻守在黄河边的宁夏阎王马鸿逵军队阻止。马鸿逵早已派兵驻守黄河岸口，决不允许那批“逃跑鬼”的汽车进宁夏而引起宁夏人心不安，影响社会秩序。于是那些人只好停留在三盛公沿线乡村苟安。一时附近村庄大有人满之患。好在为时不长，包头解放军作战略转移离开包头后，那批逃跑鬼又渐渐地回来，住在河套各城镇。

正在这乱糟糟的时期，有一天，大批汽车从包头方向开来陕坝街头，有的车上旅客并不拥挤，汽车上仅有几名妇幼老少，衣箱器具。如此情景，自然为人所瞩目，不免暗中议论一番，以为这是“国民党就要垮台”的前奏。这天的深夜，陕坝公路段院的大门早已紧闭，我正待睡觉

还没有熄灯，忽听得有人砸门，声音越砸越紧，急中夹杂着吵声：“开门！开门！不开就把它砸开。”又听得劈啪咔嚓一声，只见从大门外，进来几个持枪的丘八（当时对国民党兵的称呼），大喊，“负责人在那里！出来管事的！”一直闯进我们的房间里来。“你是管事的吗？你知道那些官太太包车跑了吗？他妈的，只许她们逃跑，却叫老子卖命、挡枪子，不行！你给汽车，老子们也要坐。”至此我始知是找汽车的。我当时已被任命为段长，只好说我无车！他们就把我拉着，“走！没车枪毙你！”这时我的老婆孩子都被惊醒了。正在紧张时刻，汽车站的站长樊孟瀛闻讯赶来了。这位站长会办事，眼皮活。他立即把我拉开，对那些散兵说：“老总，我有汽车，干什么？咱们到站上去，这里无车，你看院里哪有车，老总走吧！”那些散兵又说：“今天陕坝进来了多少汽车，那里去了？都拉的什么臭东西？你还不知道？装蒜！她们往后跑，叫老爷们卖命，不行！今天非给我派汽车不可，老爷也去宁夏！”这时樊站长又甜言蜜语地把他们劝领到汽车站去。走到大转盘车站门口樊不进，却引到站西的一个旅客饭馆里，立即找到“堂官”（服务人员）请他备洗脸水、沏茶、准备酒菜，并说：“老总们先休息休息，吃喝好了，再派车，好

办，不要忙。你们从包头回来，一定几天没休息了。”在樊站长招待下，他们正在大吃大喝中，我悄悄地溜走了，返回公路段家中。当时全院住的眷属都已起来，正在劝说我那哭泣着的老婆孩子，她们都眼巴巴的盼着我回去。

那几名散丘八大吃大喝后，汽车也不要了，又不知干什么去了。类似这样的要车事件，时有发生。

(五)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后，北平陷于孤城，已传来酝酿和平解放的气息，介于平津绥包与宁、甘、陕西北咽喉的河套，开始动荡。从平津一带退来的国民党人员要去大西北，也都从陕坝经过。

绥西行署于一九四八年设陕坝，成为绥西专员公署的上层领导机关。

一九四九年七月，绥西专署的官员们，突然大忙特忙。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绥远省军政首脑人物，将与南京政府派来的要员在陕坝开会。过了几天，陕坝镇西南十公里处的飞机场已修好，可以停小飞机；去飞机场的公路虽然没有做到清水泼街，到也来了个黄土垫道，较昔日显然平坦多了。一天，该专署发出了紧急通知，招集河套县

以上军政官员去飞机场，迎接要人，陕坝城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有一天，我在陕五北路的五分子桥修水毁公路时，突然陕坝汽车站站长樊孟瀛来了。一见面他就说：“有事告诉你！你的思想要冷静些。”我说：“什么事，我思想还有什么冷静不冷静……。”我话没有说完他又说：“赶快把这里的工作安置好，咱们回陕坝去。”我问有什么要紧事，他说：“到陕坝就知道了。”后经再三询问，他才说：“你已被撤职了！新段长傅次曲已经到段，回去吧！”到了段上，始知傅某委实带着夫人和上方宝剑—董其武主席手令：“石兆鑫撤职查办，派傅次曲为陕坝公路段长”，来上任了。原因为何？据说这次陕坝会议，本是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坐飞机带蒋介石信件与巨额黄金，招集绥省军政首脑董其武（省主席）、孙兰峰（总司令）、刘万春（军长）等秘密座谈，目的是游说董其武等不要起义……。会上董等加以拒绝，大员徐永昌自然是首返南京而去。董其武也乘飞机返归绥了。不料董等上机后，飞机突然失灵，起飞时没起来就翻了一个跟头，董主席受了轻伤，便改乘汽车回绥。汽车行至天吉太桥西十余公里处，发现渠已决口，淹没了公路，汽车不能通过！此时董其武大发雷霆，怒气冲冲的对随

行人员说：“到陕坝找公路负责人！”董返陕时适巧我又去了五分子桥工地，当时董旧部军人傅次曲与董关系弥深，以察南专员身份逃来河套，董一到陕坝他就找董要工作，我便成了替罪羊，只好领着老婆孩子，从公路段院里迁出来，离开我呆了七年的岗位！

此事发生后，绥省建设厅厅长张立苑，认为处理欠妥，当即电告我去绥，向厅长面陈此事。最后决定由建设厅派员到河套调查，过了一个多月，已查清：“水淹公路责由水利部门承担，水利局已处理了事”。自然是与公路无干。不过傅次曲已充任了陕坝段长，不久省府又任命我为包石公路工程处七级主任，赴包头主办包石公路工程，当时包头至石拐沟道路正在修建中，至此所谓“撤职查办事”告一段落。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主席率绥远省军政举行了起义！我所建的包石公路，正开始整修，于同年竣工。从此结束了我的旧公路生涯。参加了革命。

一九五〇年一月，绥远省人民政府在归绥建立，我被分配到省人民政府交通局工作，正式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我后半生从事新公路建设的开始。

一九八四年二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改稿

解放前后套的交通工具——大木船

安子兴

解放前，河套的交通运输很落后。各种物资，如河套的粮食、皮毛、药材等外运，西路的木料、煤炭、盐碱、磁器，东路的布匹、糖茶、磁器运进等，全靠木船。那时的园子渠口在陕坝东南，距城五六里，是陕坝进出船只的码头。夏秋这里很繁华，商店、饭馆、车马店等都有。住户也有百十家，全靠河路吃饭。每年这里七月十五唱戏，放河灯，物资交流，跟口里的庙会一样热闹。所以园子渠口很有点名气，河套段跑河路的都知道陕坝园子渠口。

放河灯虽然带点迷信色彩，但群众很感兴趣，各处来观灯的人很多。河灯浮在“黄土拉亥河”上，透过倒影，点点红星闪动，别具风格。如遇天朗气清，皓月当空，月光射进河里，水天一色，再点缀上河灯，那更是美观迷人了。

园子渠口虽是小地方，可吞吐量不小，每年有四、五百只木船出进。旧社会河套船只东至河

曲，西到宁夏吴忠堡，这段河路有千余只大木船。船主即养船的资本家，船夫是靠拉船分红的劳动者。每只船一个季度分一次红。每只船上共有五个人，一个艄公，四个纤工。按入股分红，每人一股，船主三股，船上的家具、布帆，全是船主负担。船上的伙食，由全船分担。分红时把伙食费用除掉，剩余按入股平分。

1939年傅作义进驻陕坝以后，园子渠口更显活跃了，仅八战区分监部就有一百只大木船，除军运外也兼运民用物资。盐碱是河套工业原材，包头的复新和、义德成每年用木船经从磴口运红盐，不下几百只船。奥陶旗郑柜，理郑梅峰是石咀山地方的绅士，包销王爷府的盐湖、碱湖，从石咀山往东运盐、运碱大都使用木船，木船对河套来说是项主要运输工具。

水上由西往东的运输工具除大木船外，还有一种木筏子。木筏子是用行条或椽子绑捆成长方形，根据货物轻重，体积大小，安排宽度和长度。木筏子又分羊洪桶木筏和牛洪桶木筏两种，羊洪桶木筏比较轻便，因此使用羊洪桶木筏的多。羊洪桶木筏是把整个羊皮从羊身上剥下来，把空气打进去，然后把几十个羊洪桶绑在木筏子的底部，这样浮力很大。到达目的地后，货物卸在码头上，木筏拆开，木椽和行条卖掉。羊洪桶

里的空气放了，折叠起来，有的打成背包，有的捆成驮子，带回原地。木筏子只能顺水使用，不能逆水用。木筏子也是河套的一种交通工具。

汇源公司的始末

王兴亚

一、汇源公司创办的背景

一九一六年，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但是称帝不久，就病死在全国讨伐声中。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并由西北边防督办，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部总长。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爆发，段祺瑞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想在全国树立威信，并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打算向德国宣战，把所属的边防军改为中国参战军，私自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凡所属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都要入该团受训。所以他一上台，就拟定了一个对德宣战加入同盟国，并把所属边防军改为中国参战军的方案，提交国会通过，遭到国会拒绝，他千方百计胁迫、恐吓，使黎元洪下令解散了国会。

一九一八年二月，段祺瑞即通电声明对德宣战，把所属边防军改为中国参战军，并借口装备

参战军向日本借款三亿元（包括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现金）。

边防军第一二三师改为中国参战军后，段自任中国参战军总司令，任命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段的亲信、学生）为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北京。任命三师师长陈文运为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团长，陈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他又调兵遣将，命令第一师曲同丰部由东北进入俄境；第二师马良部由西北外蒙进入俄境；第三师陈文运部为后备队，驻北部边境。这三个师是段的嫡系部队，也是最精锐的部队。

部队出发前，参谋长徐树铮，在私邸宴请三位师长，明是饯行，实系传达段琪瑞的密令。其密令的主要内容为：

- 1、此次行动是为了扩充我们的实力，提高在全国和国际上的威信。

- 2、布置各师出师后待命的地点，明确规定没有段先生的亲笔手喻，不准前进一步。

- 3、对部队的一切行动、番号、军官姓名绝对保密。

- 4、在不暴露身份各方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搞些经济活动。

徐树铮说完，有侍从送来一张当日的报纸，上面有醒目的红色大字标题，徐乃大声颂读：“我

国通电声明对德宣战，派出最精锐部队由东北、西北分两路出发，越过西伯利亚向欧洲战场挺进。”话音才落，曲同丰即刻笑着说：“这是段先生的八字锦囊计。”徐树铮和马良、陈文运等忙问哪八个字，曲同丰说：“宣而不战，挺而不进。”四人相视而笑。

嗣后，陈文运、马良二师长会同视察绥远特别区。当时中国行政区划分为二十二行省，五个特别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川边）及三个大地方（蒙古、西藏、青海），以及外蒙古。两人商同，在张家口、大同、平地泉（集宁市）归化城（现呼和浩特市）、包头、五原、大库伦等地设置参战军军用物资转运站（简称军运站）。

当时大同有山西晋军阎锡山部驻防，平地泉、归化城、包头有绥远特别区都统马福祥部驻防（马是后来国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的父亲），包头以西无驻防部队，陈部的一旅人就分驻在包头以西到五原之间，除了各军运站派驻一连的兵力接送军用物资外，总共不到三千人。

马良的部队除一营的先头部队驻在俄境，其余部分驻在大库伦，即现在的蒙古首府乌兰巴托。

二、汇源公司创办前的筹备

根据段祺瑞“在各方面许可的条件下，可以做些经济活动”密令的指示，马、陈二师视察防地后，在包头把军运处副处长陈洪棹（陈系河南光山县人，是陈师长的远门兄弟，对理财颇有办法）叫来商议。经陈洪棹提出计划，主张创办一个运输公司，总公司设在五原，军运处也设在五原（当时陈师长曾要把军运处设在包头），凡所有的军运站所在地，都设立分公司。这样作有许多的有利条件：

1、五原是个偏僻小县，地广人稀，消息不易传出去，并且行政单位只有二十多个人的县政府，也无军事机构，是个能够保密的好地方。可以任我所为。

2、运输物资的工具，可利用军用车辆，必要时只须少量增添即可。

3、押送人员也都是军运站的，勿须另外雇用，同时也利保密，出不了意外事故。

4、贩卖的物质就同军用物资一起启运，包装和军用物资一样，减少费用。

5、军运站与公司两位一体，军运站工作人员兼办公司的业务，不但便于保密，关卡不能检查，不纳一元捐税，并且资金充足，十分保险，

万无一失。

陈、马对他的办法，大加赞许，就指定他负责筹办公司，任他当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内的一切工作、业务都由他全权处理，总公司和军运处合署办公，地点就设在五原境内。

三、汇源公司初创时的情况

一九一八年七月，军运处处长兼公司总经理陈洪棹选择了距县城三十多里正东处，有二三十亩一块平地，做为军用站和公司所在地，开始建筑房舍、院墙。以一个连的兵力（约一百五十人）挖草坯、垒墙。一面挖，一面运，一面盖。草坯不怕湿，又省力、省时、省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盖好四十多间房，垒上二十多亩的围墙，为了预防外人盗窃，又在墙外挖了一道护墙河，一丈多宽，一丈多深，并灌满了水，在四围墙上插了白刺。

军运处和公司，两栋房都是相对的，公司住北房，军运处住南房。两房当中开小门能相互出入，在外面看两处是分开的，里边有门可通，军运处向北开大门，公司向南开大门，这样使外人认不清“两位一体”。军运处院子比公司的院大一倍多。因为公司的物资冒充军用物资，包装外皮也用军用品字样，为了保密，处处不能使外人

看见生疑。

四、汇源公司名称的由来

“汇源”这个命名，也使总经理费了脑筋，千思百虑，最后，想到陈文运师长弟兄五人，老大陈文汇，师长是老二，原名陈文涛，后来改为陈文运，老三陈文波，老四陈文洪，老五陈文源。把老大和老五各取一个字，一头一尾把哥五个都包括在内。并且“汇源”组成的词也有讲究，真是一个极恰当的名称。

五、汇源公司经营的业务

首先是交通，当时京绥铁路还没有修到大同，大同到包头已修了公路，可以通汽车。由包头到五原只有大车路，由五原到外蒙大库伦可以说没有路，当中有一段沙漠连大车也不能通。

包头到五原这段路易修，把大车路加宽，稍加平整即可。由沿途驻军分段修补。从五原到大库伦经过一段山沟，可以修条马车路，而沙漠地带只可用骆驼。过沙漠到库伦还有一段大车和汽车路，也要经过修整方可通行。在当时，这些工程也算是很大的了。乃商定：五原包头段由陈师动工，库伦至沙漠段由马师动工。因此，工程再大也不用公司的一文钱。

部队在各驻地因地制宜的开荒挖渠。当年不能种植，只能作些准备工作，第二年春天再播种，农作物以黑豆、高粱、玉米为主，也种些糜米、小米。收获后，除本单位所需马料留用外，其余全部上交军运处，作全军马料分拨食用。

运输工具，陈文运师有军用汽车五十辆，负责由张家口至五原的运输。马师的汽车负责由库伦至沙漠地带的运输。马师有大车一百辆，交军运处统一使用，与陈师的大车分担由五原到张家口，以及山后到外蒙的运输任务，运输路中途经沙漠二三百里，汽车、大车不能通行，公司购得骆驼一百峰负责这一段的运输。

开始经营的商业是在外蒙及当地购得皮毛、药材、马匹等，运内地出售，再由内地购得布匹及日用品在牧区及外蒙出售。后因利润太少，便增加贩运粮食，用部队的余粮换得鸦片，去内地出售。以后又勾通俄商贩运武器弹药、大小汽车、黄金银币、石油等。获利高出开始的十倍甚至百倍，并且两地出手，又是热货，又快又省事，对毛皮、马匹、布匹等货物仍然继续来往贩运。总之不让运输工具得闲，歇人不歇马。但因沙漠地难行，有误时间，双方常积压物资，又购买了驮运骆驼一百只。

一九一九年春，公司开始向外贷款，贷给从

事开垦的农户，贷款不能挪作别用，如查出做了生意，立即将贷款退回。并规定了“贷款开垦三年计划”。即贷款不索利息，三年后全数归本。开垦土地公私各半，即垦地十亩，三年后，公司要五亩，垦户五亩。如不还本，即将垦地全部没收，不许再行贷款开垦。借贷时必须取保人或交押物资，指定开垦的地点。贷款数字一般在二百元至一千元，还可以陆续借贷。开始借贷的人很少，以后越来越多，到第二年借贷开垦的更多了。公司这时经常派人，挨户查看，惟恐借贷者逃之夭夭。

为了发展运输渠道，增加利润，也使借贷扩大，多收垦地。公司计划开挖一条大渠，直通黄河，物资就能由大渠运到黄河，直达包头。当即请专人进行了设计规划，又抽调近处驻军一千名分段施工。并且购木材，雇木工，修造了大船二十只。

天长日久，没有不透风的墙，引起了当地政府注意，向特区报告：称参战军军运处，乘运送军用物资之机，往来贩卖私货，并有贩卖毒品、武器的事情。经特区转报北京政府，段下令参战军总部查明处理。总部负责人参谋长徐树铮早已知情，他也从中得到好处，遂上文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八个字就把这桩公案不了

了之。

一九一九年的严冬，库伦积压物资甚多，不少积压在沙漠边上，大车不足，公司向县政府代征雇大车一百辆，将近半个月，只凑了二十多辆，再催交，县长说：“这已经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再催，就是撤了我的职，也办不了啦。”气势不可一世的参战军，安能把这小小的县看在眼里，双方越闹越僵。在不可开交的时刻，适驻包以西的陈师宋旅长来军运处，向陈洪棹说：“上令参战军取消，军运处也要随之取消，部队也要撤走，马良部业已陆续由东路撤去。积存的物资应速运回。可能师长还详电告。”当时宋旅长已知公司与县政府因征车事闹僵。他说：“派我的汽车跟几个武装，以师长的名义请该知县前来商办。”遂让小车带着武装卫士四名去县府。县长听说师长找他，吃惊不小，不敢说不去，勉强去了。县长把宋旅长当成了师长，面呈曰：“实在催不上来啦。”宋旅长说“你不是说撤了职也不办吗？好！我没有权撤你的职，我有力量把你送到特别区！”说着强迫知县上了车和他一起走了。宋旅长本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把县长带到归化城，把他扔下叫他自己去特别区报到去了。直到一九二〇年春节后，才派来新县长接任，五原县政府，有两个多月是群龙无首的光景。

六、汇源公司的结尾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北洋政府和总部命令，参战军取消，部队立刻开回北京，军运处名义上取消，办理善后工作。

陈师长派专人送来亲笔详谕：将“军运处”和公司的财物清点，物资除贵重的外以汽车火速送京。不能携带的动产不动产，做适当的处理，公司是否还有可能存在，请你斟酌适宜办理”。

当时陈洪棹急于把库伦运集在沙漠边上的物资运回，遂派出百余武装士兵四出抓扣车辆，忙了十几天的工夫，才抓来二十多辆，连县政府派来的才五十多辆，仍然不够。这时由青海来了一批驼商，带着驮有满满物资的骆驼一百二十峰准备去包头，陈以强迫威胁手段，并答应把驼商的货物用军用汽车送往包头。驼商只得把货卸在军运处，一百二十峰骆驼往返两次运回了四五百件物资。

陈洪棹打算，军运处撤消后，公司继续整理一下，仍可做转运工作。但事不遂人，一九二〇年直皖军阀战争爆发，他不得不先把这一摊清理好，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他首先停止开垦贷款。清理垦地，连部队开垦一起清查。一年来的时光，垦地就有五六千

亩。第一年的收成不多，贷款则有十万元，因双方订下合同（三年），不能当下收回。

开渠工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地冻天寒，停工待明春开工，部队则在一九二〇年初全部调走，工程才完成三分之一，还是分段开挖，衔接不上，只好停下。

当时军阀混战正在进行，谁负谁胜，尚难预卜。陈洪棹还想让公司继续办下去，打算抛掉大库伦在包头以西至张家口一线，做转运生意，所以没有下定整个彻底结清汇源公司的决心，只把贵重物品，如黄金、银币、鸦片、石油等处理了当，其他物资仍想看战情再办。

但战况日趋愈下，皖军节节失败，在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已遭彻底失败，段祺瑞求和停战，通电下野。陈师长电催陈洪棹急速清理公司物资，停业回津。

清查处理结果，放出去的垦地贷款，只收回一二万元，物资尚存五百多箱件，大船二十只无人购买，骆驼全部售完，大车尚有六十多辆，畜料（黑豆、高粱等）尚有百余担，骡马大都赶入内地，汽车也都开走，陈自己留下载重汽车一部，以备急用。

这时，县政府派来送信人，信内说“为商研扩大贷款垦地事，请贵县经理来县一叙”。陈洪

棹看罢，心里明白，凶多吉少，决无好事，乃对送信人说：“请回报知县，今天我忙得很，明天上午再去吧！”送信人忙答道：“知县吩咐，经理无论多忙，也非请你去一趟不可。”陈沉思片刻，就说：“好吧，你稍等一等，我把贷款垦地的一些材料带上。”说完走出去，等了没有半个小时，陈挟着几个卷宗，走进来说：“我们一块坐汽车走吧。”送信人推辞不坐。这时候汽车已发动马达，陈同送信人走出，再三叫送信人一起上汽车，送信人执意不从，他骑马来的，坚持要骑马回去。陈强拉硬拽叫他上车，他仍不上，这时候，由房后走出三个人来，都持手枪，威胁逼吓，吓得送信人浑身乱抖，看情形不上车是不行了，陈也取出手枪，对着他，其余三人搬运了十几件箱装的物资和行李，陈坐在驾驶室里，那三个人和送信人都上了车箱。汽车飞也似的向包头方向驶去。那三个人在车上拿出骨牌，开始赌博，也叫送信人参加，送信人说“无钱”，这三个人要借给他，他也不要。约走了有四五个小时太阳快落了，汽车有意放慢了速度，送信人乘这三个赌兴正浓，无暇顾及的机会，跳车逃了，车上人大呼停车追捕，但车仍飞驰不停，而且速度加快了。这是陈经理的脱身之计。他考虑到如当时把送信人放走回县府报告，县府有电台、给包头发

报拦扣。这样把送信人带出一段，让他跳车逃走，再返回报告时，汽车已到了北京，他们想追也追不上了。

汽车到达包头，天色还没有黑，包头军运站已被查封，汽车继续奔驰，到归绥、平地泉，军运站也都被查封了。只有大同、张家口两处还没有查封。这也证明马福祥记恨前嫌，早已处心，密令所属各县查封军运处，而让五原县以稳军计留下陈洪棹交物资。陈决定逃走，避免了一场磨擦。陈逃走时，对公司临时雇用的三个工人说：“我们现在就要走了，这些物资不要了，但也不能都便宜了公家，你们可以趁机会用大车拉点走，可是千万不要贪得太多，叫官家碰上扣住。”可能最少每人也拉一车吧！

计算下来，汇源公司丢弃的物资和贷款约值五六十万元，还不算公司的房屋、家具。一九二四年战事稍，稳陈洪棹又去五原，得知这些财物被县政府派了几辆大车拉了三、四天才拉完，最后连门窗扒下都拉走了。汇源公司经营两年多来获利现金一百多万，载重汽车四十三辆，送人二十多辆，卖掉二十多辆，小轿车十一辆，除自留两辆外，其余都给了当时的重要人物。汇源公司获利总共将近一百五十多万，由陈马两师长平分秋色。以后陈师长在河南焦作开了一个“中兴煤

矿”，在天津法租界开了一座“国民饭店”，在北京开设“永新园饭店”和“永新园鱼塘”（在北京前门糖厂），又在天津日租界多美蓉街购置价值四万多元的一座楼房，也都是这些利润所办的。

陈师长后来全家都住在天津日租界私邸，陈洪棹当了陈宅的大管家。

陈文运是我的姑父，我上小学、初中就住在他家，陈洪棹是他的远房兄弟，我称他叔叔。汇源公司是他们亲历的事，他们向别人述说时，我象听故事一样从旁边听到。我所记述的，仅是他们说到的一少部分，汇源公司所在地他们虽没有提到在五原县，但我经过考证、分析，肯定是在五原县。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

民国初年至解放前五原 工商业的兴衰

张晋仁

前 言

五原的商业，远未考证。民国初年，今日的五原县城，还处于“风吹草低见牛羊”一片红柳、芨芨、哈蟆滩的境地。民国二年（1913年），五原建县后，原县城中心义和桥附近，有零散的几家买卖。而比较成器的买卖大都集中在乌兰脑包（今中后旗德岭山公社），这时的乌兰脑包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商业集镇了。

五原县政正式设置乌兰脑包镇（以下简称乌镇）之后，五原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

笔者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来到五原一直从事商业。但对五原最早的商业活动，只知一鳞半爪，且乏于文字记载，这个资料是经过访问老者提供的加上本人亲身经历而写的。年久失记，挂一漏万，只能描绘其概况而已。

五原工商业解放前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虽历史短，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动荡，其工商业也是几经兴衰。为了叙事清晰，循序分述之。

一、民国初年五原工商业发展概况

(一)

五原的商业，有据可考者，始于清朝初年，做商的多是山西人。如绥远之大圣魁，包头之复字号，阿左旗之祥太隆，都是在清朝初年成立的。而来五原最早的首商是万和长。据李德春（他父亲曾当过万和长的掌柜）说：“万和长之前身万长久，于康熙年间，从包头分出一部分人，来五原北山下之任二明圪旦（今中后旗红旗公社红旗一队），开设万和长字号”。至今万和长一带还流传着康熙三十五年，帝亲征，葛尔丹涉黄河，到宁青，途经阴山，曾在万和长住宿过的说法。那时的河套还是一片浩瀚的大草原。商人来的多是做蒙古生意的，即历史上所说的旅蒙商。之后，随万和长来的商人很多。清朝末年，五原虽未形成具有规模的商业，而这些旅蒙商业为五原后来工商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五原商业之形成，初具规模，始于乌兰脑包。民国二年(1913年)，五原置县后，乌兰脑包始建镇。在这之前五原属萨拉旗厅所辖。那时较大的商号多集中在大余太(今属乌拉特前旗)。随着五原县政的建立，大部分商人渐次由大余太迁来乌镇。民国十年(1921年)乌镇商业发展较快。那时有同心公、天瑞德、广生西、同义恒、德丰号、义和长、和义成等十八家大字号，资本都很雄厚。如广生西字号除经营蒙古生意，还经营土地数十余顷。牛羊驼畜数千头，职工一百多人。自己开有作坊，加工油、酒、米、面，经营茶、布、烟、糖。一次向蒙地出房子几十顶，远至外蒙古乌兰巴托(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民国十三年(1924年)，广生西就盈利白银十几万两。财东是山西河曲人，小名叫筛扣子(王同春之女王爱卿的女婿)，这年仅财股就分得白银十万两。其他不一枚举。据知者谈，民国二年至民国九年(1913—1920年)乌镇商业全部资财约在白银千万两之多。可见当时乌镇商业已发展到十分兴盛的时期了。

乌镇商业大部分是做蒙古生意的。商人每年春天出房子，到外蒙古境内。交易场所在外蒙古

代庆公召庙内，交易时先公议价格。蒙民卖的是以马匹为主，商人经营油、酒、米、面、茶、布、烟、糖。交易方式：商人先拿走蒙民的马子，到冬天蒙民才来驮取货物，那时一匹马折价白银十两。有时蒙民还驮来皮毛、木材、蘑菇相互交换。

商人和蒙民之间的交易，是以不等价交换方式和欺哄手段进行的。商人用的是九升的斗，不足的称，斗是带梁梁的，斗刮子用的竹片子，抹斗时，用手将竹刮子使劲一弯，竹刮子中间弯成个弧形，一刮一道濠。这样一来，一斗就成了九升了。算帐时商人用的是高超的管帐先生，又用的是算盘子，蒙民则是手掐珠珠计算。算得结果，一百两银子，商人总得多占便宜五六两。蒙民是诚实的，只要他信得过的人，一向是确信不疑的。一旦他们弄清算错了帐，就出了麻烦，凡是来的蒙民，都来打吵子、找后帐，这时商人就不好应付了。还有的商人拿走蒙民的马匹，到冬天蒙民来取货，如果马价低了亏了本，只能给蒙民几成货。甚至有的商人如天瑞德，停业后，还领着四、五个人，去外蒙古骗走蒙民的马子一百多匹，卖了钱逃回了老家。

民国九年（192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商路受阻。此时外

蒙边界上已设有关卡，还让商人过往，但需照像、证明方可入境。自俄国人把持关卡后，商人过境一匹马子需纳税白银四两，一张皮子需纳税白银一两。蒙民来时还得有往来的时限，并交纳出境费银币六元。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俄国人在外蒙成立公司以后，外蒙牧民就不来了。至此乌镇商业日渐衰落。

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部队进驻五原，时商会设在乌镇，粮饷悉由乌镇各商号筹垫，负担极重，约有银元数万元之巨。乌镇商业纷纷关闭停业，留下的商号，逐渐迁来隆兴长（今日的五原县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绥包相继沦陷。以西山咀为敌我分界线。商人冒着风险，贩运土产、皮毛等运往敌区换回货物。有一部分商人往来，要通过乌不浪山口，先到乌镇歇脚中转，乌镇一时又出现新的生气。1942年日寇进犯，占领乌镇，对乌镇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从此乌镇成了废墟。

二、隆兴长之名由来及其发展始末

（一）

隆兴长之名由来已久，清朝同治年间，淮军西平马化龙叛乱，途径五原，有流散的淮军官佐

郭向荣，借仗清军的余威，在五原一带收购土地，并在今之县城外开设隆兴长字号，因它来的最早，名声远著，相沿成习，故隆兴长由此而得名（详见五原县地方志史料荟要四期）。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军进驻五原时，动用军工修筑包、宁公路，从此商路畅通，而黄河水运也较顺利，私营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绥远省的平市官钱局、山西丰业银号、仁发公银号、先后相继开业，发放信贷、通汇省内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山西阎锡山屯垦河套、弭平匪患、垦殖开荒、兴修水利。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开办屯垦合作社信用部发行纸币，对五原农牧业生产与工商业发展，是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笔者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来的五原，这时是工商业鼎盛时期。新旧城人口已发展到一万余人，城内工商业户已发展到五百余户。商业有绸缎棉布、五金百杂、烟酒糖茶、酿造糕点、软硬山货、中西药房、皮行、毛店、粮油加工、糖粉作坊；饮食服务行业有：饭馆、熟食、小吃、旅店、小澡塘、理发、照像、镜、表、镶牙、刻字印刷；手工业有：红炉铸造、铁木二行、画工糊裱、麻绳口袋、生熟皮张、毛毡地毯、笼箩柳编、银炉、造币。此外还有娱乐场所：戏园、评弹、杂卖场所等。商贩

们下乡排贩，沿街串巷，就地设摊。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时五原县衙设在旧城，而一切企事业单位和附属行政机构多设在隆镇。这时隆镇已成为五原的政治经济中心了。

五原商业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山西、河北两帮。较知名的工商户有复兴西、兴隆茂、德星明、福和隆、福义隆、义盛昌、协记号、吉兴和、中和庆、义昌茶庄、裕兴厚、金盛兴五金行、日盛盐店、永生号、永兴西皮毛行、亚北、民生西药房、集仁堂、明远堂、达仁堂、中和堂中药店、义盛酱园、德玉兴、德恒录、晋源兴酱园、天恒永、大恒永、广泉涌、复义涌、广和成、德兴茂、陆陈行、德玉成缸坊，天德堂、太山堂理发馆、东西二澡塘、大北照像、文华斋、元记印刷局、会元芳、宴宾楼饭庄、德和元回民食堂、天昌旅馆、东西楼房等。

(二)

五原工商业历史虽短，商人成份却很复杂，来至不同的阶层，其组织形式也不同。有自作东请掌柜做生意的，如复兴西、兴隆茂。财东不上门，人、财权由掌柜支配，设有万金帐，财、人、股分立，赚了钱一般三年一算帐，按财、人、股均分；再有自己作东自己作掌柜的如：大

恒永、广泉涌；合伙经营的父子兄弟班子的有德星明、金圣兴、义感酱园；有夫妇看店，家庭买卖；有跑单帮做牙纪生意的；有走蒙古买卖的。经营手工业的一般自带手艺，领三、二徒工，资本都很小。

店章店规：大的商号用人一般分吃劳津、徒工和勤杂工。吃劳津的（柜头、管帐先生、跑外的），年工资七、八十元不等。徒工初入店，年工资二十至三十元，勤杂工如炊事员、下夜打杂活的，月工资五六元。一日三餐，吃在柜上，每月一次洗澡理发，由柜上开支。医药费自理，病事假一般不扣工资。跑外地买卖的，不分职务，三年一回家，假期三两个月，路费由柜上开支，工资照发。每到年终，每人有几元压岁钱，赶上生意好，还有酬劳金，论功行赏。而手工业条件较差，徒工管饭没有工资，三年徒满，谢师一年，以后就可以自立门户了。旧社会学徒难，住大的字号，必需有盈富的铺保，一般也得有身份的人介绍方可入店。一年到头除了春节休息三五天，再无休息的时候。手工业学徒就更难了。

（三）

五原盛销牲畜皮毛、粮食。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前,天津做出口商的常年驻地收购猪鬃肠衣,就地粗加工外运出口。包头粮行如义德成、复兴和、通和店也常年派人驻地收购粮食油料。此外,小茴香、黑瓜籽也远销外省。做皮毛行的,多是河北邢台人,如永生号、永兴西,除收购一般皮毛外,特别是肚剥羔子皮,为出口名贵皮子。清末民初,每一张肚剥羔子皮曾卖过白银七、八两,一般年份价也在银元五、六元。皮行买怀孕母羊一只,剥了羔皮,留下羊皮和肉等于白拣,而一旦赶上行情,即可获成倍利润。做皮毛生意,资本雄厚,但风险大,倘遇出口停滞,皮价暴跌,随时有破产的危险,资本小是做不成这种生意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口停滞、皮价大跌,国内经营皮毛行的大都破产。五原永生号就在这年亏损倒闭的。后改名力生玉,但已成“力不生玉”濒临于苟延挣存的境地了。

(四)

五原为西北要道,交通也比较便利。时有山西大同汽车运输公司汽车,经来于五原、临河之间,也有个别私人养汽车的,但运输还是主要依靠畜力。那时有知名的养车户张登成、王闯金等人,养畜力轿车多辆,承揽客货运输,远可达宁夏、甘肃等地。包头来五原多靠驼运。水运可称

方便，义和渠直通黄河，横贯五原城中心。每逢夏秋之际，舟楫往来频繁。船户多是托县人，所产皮毛、药材、粮食，多靠水运输出，每只大船可承载五万余斤。宁夏来的是皮筏，运来贺兰山木材、干鲜果之类，虽不及木船负荷大，但比木船稳妥，运行也较速。

(五)

自阎锡山屯垦河套以来，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在这一时期，五原经济是较为稳定的。商品来路广阔，商人广购远销，东可达京、津、晋、察，西至宁夏、甘肃等地。较大的商号，在包头设有分号或常年驻地作客。因为包头是京绥铁路的终点，水陆交通发达，商业信息灵通，为西北贸易中心。商业购销活动多在包头，而包头的座商和省外贸的客商也常来五原兜揽生意。

包头一年之中有四季标期的定例。所谓标期之说，即商人往来债权债务清理的期限。尤以到冬标最为紧张，凡债务户，到期偿还不了，就有被挤跨的危险。五原是农业小镇，资本小，一般不敢冒大的风险，也有个别商号，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交官接府，不务正业，而造成亏损倒闭的也有。

(六)

商人念的一本经，常说：“交官穷，接客富，赚的好人钱，受的赖人的害，宁肯话吃亏，不让钱受制，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分什么三教九流、达官贵人、男女老幼，只要上门都一样待承。营业时间一天都在十二小时左右，饮馆时间较长，一早上灶营业，晚十时后才落灶。经营付食行业和中药店，门市上还留有小窗口，虽说收了市，深夜有人敲门还得支应。

五原是农业区，消费对象主要是农民，在反动统治年代里，工农产品失调，常人说：“谷贱伤农”，有时农民卖一石糜谷，只可买土布一匹（仅做单衣一套），一斤羊毛只可买火柴几包，一车柴禾只能卖几角钱，何况受着租税的层层盘剥。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山固阳一带，连年荒旱，颗粒不收。贫苦农民四处逃亡，那时逃来五原的很多，而粮商与地富相勾结，乘机囤积，垄断市场，高抬粮价，每斗糜米竟售银元五元，有的粮商甚至掺杂拌水，乘火打劫，逃来的农民被迫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其境甚惨。虽几经沧桑，而当年目及者，记忆犹新。

五原历来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称，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广大贫苦佃

农，租种地主土地，受租税的双层盘剥。农民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无钱换季，被迫出卖“树梢粮”，形同高利贷。即拿商人的钱和布，折成粮食，卖一石树梢粮，秋后收下粮后用二石还帐。还有的商人派出干练的伙计，人叫“拉黑牛”，分赴四处，见了老实的农民进城，甜言蜜语，强拉硬扭，兜揽生意。一贯以次充好，缺斤少两，漫天要价，往往农民上当受骗。对蒙民的欺骗手段就更加一层了。五原工商业者绝大多数人是中小成份，资本大的寥寥无几。但资本积累是来自剥削，没有一套经营管理的本领、盘剥的手段也是不易维持的。

三、抗战开始后的工商业

(一)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弃守，绥包相继沦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傅作义部队由山西转战而来。那时真是官兵似海、司令如毛。包头沦陷后，首先撤退到五原的部队有中央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以及游杂部队。时挺进军兵饷无着，公开抢掠，加之物价上涨钱币贬值，商人受害不浅。五原县长王兰友，胆小如鼠，闻包头失陷、席卷私囊逃之夭夭。这时日盛盐店经理

唐兆铭其人，是声名狼藉的恶绅，乘机出头，总揽财政大权，对军方表面应酬，实则心怀叵测，致生卖国求荣之心。该唐某与隆镇镇长康三元密谋策划，私自印发户口、做投敌的资本，并密函包头敌酋，约时里应外合，纵敌入侵。不料事机失泄，被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查获扣捕，以汉奸论处执行枪决。文化斋经理李景芳曾承揽印制户口，知康、唐被处决，恐吓成疾，不久死去。商会会长由义盛昌经理车云生担任。康、唐被处决，大张旗鼓惩治汉奸游踊，市面顿现安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后绥远省政府迁至河套，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大，商人冒着风险，深入沦陷区贩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换回日用杂品和紧缺物资、文化用品等，解决当时军需民用的困难。绥远省政府，为了管理战时物资，在五原设有物资管理机构，商人运往沦陷区物资，必需经批准方可，但必须换回布匹来。那时中国银行在五原设有办事处，还可通汇天津。如兴隆茂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次从中国银行汇津一万元，由天津美商花旗银行提出现款，转汇包头蒙疆银行，买回白市布一百七十匹。有些沦陷区的商人由张家口运来砖茶、生烟、火柴等货物，对战时军需民用有所贡献。

(二)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日寇大举进犯，五原二度失守，敌人烧、杀、抢、掠，商人受此浩劫，元气大伤，已呈一蹶不振的状态。加之敌机出没无常，不断骚扰，白天防空，行人绝迹，形成死城一般，夜间开门营业，苟且维持。因此有的商人，经受战祸损失，无力经营，转入农业的为数不少。五原战役之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自顾不暇，从此敌我处于相持状态。时绥远省政府设在陕坝，国营企业有资源部、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毛纺厂等；还有来自大后方陕、甘、宁等地的客商，常年驻地设庄，日用百货源源不断而来，这时陕坝已成为河套商业辐辏之地了。绥远省政府撤消了平市官钱局，成立了绥远省银行。发行新钞，收回旧钞。为了振兴工商业，省银行放宽信贷，商人多从陕坝进货，银行可以办理代收贷款，便利购销，五原商业日渐复苏。

四、抗日胜利后的工商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全城人民激奋若狂。这一天，各族各界人民纷纷集合游行庆祝，盛况空前，为历

来所罕见。经受八年抗战渴望胜利后复兴的工商界，孰料一声炮响，物价一落千丈，不欠债的则可，负债的大都沦于破产。如振德商店，欠银行贷款，被银行查封逼迫倒闭。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全面内战，军费浩繁，反动当局为了解脱其即将崩溃的经济困境，嫁祸人民，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日盛一日，国民经济已濒临全面破产的境地。加之反动派抓丁要粮，巧立名目，什么购抢小麦、以马代丁，苛捐杂税、敲诈勒索，致使田园荒芜、商路窒塞。迨至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纸钞已成废纸一堆，市面废止流通。商人交易均以银元计值，黄金、鸦片风靡一时，商人公开交易。那时小麦一石只卖银元一元，黑瓜籽当柴烧，农村男女衣不遮体，而工商业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和平起义后，私营工商业才摆脱了反动统治的桎梏。是年十月间，成立了工商联，在党的发展城市工商业政策的扶植下，才有了新的生机。私营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日

陕坝市商会的始末

高德福 王廷英

一、陕坝的变迁与商业的形成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冯玉祥将军率国民军西进，扎五原，辖丰济渠以西之杭锦、达拉特、乌拉特旗等地。

临河设治局，局长萧振瀛，筑城于强油房。一九二九年十月晋级为县，县长彭继先。辖域为：东起丰济渠，西至阿拉善旗的东南界，南临黄河，北至狼山湾义和久活水泉。东西长约二百五十里，南北宽约二百里，面积约五万余平方里。其境内划分四个区：一区设永康乡德和泉，二区设公中庙，四区设杨柜，三区管辖五个乡（即太平、太成、太昭、太彰、太武乡）、两个镇（即太和、太安镇），区公所设在太安镇，就是现在的陕坝。当时市区十分狭小，东起大转盘，西至现兽医站，南临小南门，北达天主堂，人口仅五千余人。但因天主教堂长时期以教代政统治，向信徒出租土地，因而，种地人多，经商人

少，只有王乐天是农商并营的。他先奉教领地雇用长工数十人耕种，兼营油粮加工，逐步形成信德懋粮店，因而太安镇虽有商店三十余户，但市场冷落，买卖并不兴旺。

一九三九年绥远省政府由榆林迁来陕坝，一时军政人员猛增。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胜利光复五原后，第八战区傅司令长官部，也进驻此地。他们火速整顿治安，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傅作义确定陕坝为临时省会，积极筹组市政管理处，规划市区，以大转盘作中心，东西大街为中正路，南北大街为中山路，两路交叉于大转盘，形成十字街；南北复兴路与中正路交叉于现杭后商业局南侧；抗建路与中正路，相交于小转盘；忠孝路与中山路在现杭后人民法院南相交叉；维新路北接中正路，在现杭后自行车另件厂东侧，成为陕坝六大主街。并陆续营建长官部八大处，省政府各厅处，及中山堂、奋斗中学、奋斗日报、塞上新舍等，成为当时塞外唯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地。

一九四三年陕坝市已初具规模，其辖区也随着扩大，东起黄济渠的元子渠口，南临三大股渠与临河太成乡毗连，西北两面与临河太乐乡交错。东西长约十二里，南北宽约十三里，面积约一百五十余平方里，郊区治即团结、丰产、辰

光、跃进四个乡保，其土地肥沃，支渠纵横，灌溉便利，是得天独厚的农作区，居民在房前屋后及渠旁广植杨柳到处绿树成荫，其间衬托着苹果、桃李、杏等果树，美观雅致，空气新鲜，市里人早晚常来此漫步、游玩。

在市区内以中正路为界，南北划为两个行政区，第一区设在现西二街管理区院内，区长徐焕魁。第二区设在现实验小学西侧，区长陈庆麟。区以下编组保甲来管理。

沿街马路机关林立，人口已达五万余众，仅抗建、中正两路，就有商店二百余户，经营行业商品繁多，行人往来，进行交易，十分热闹。

在中正路朝鲜巷西南开辟了摊贩综合市场，在八百平方米的地段，筑有高一米，宽两米的土台四行，二百余户摊贩的货物，堆放在土台上，百货五金，绸缎布匹，医药文具，甘鲜果品，糖业烟酒，高档商品，手工铁器，车马挽具，一应俱全。在市场外围，还有缝纫照像，钟表修理，理发食堂。测字、算命、说书、小茶馆，热闹非凡。

市区内还有两家官字号的买卖，一是绥远省贸易公司（现杭后经委院内），人员约三十余人，经营日用百货，纺织品，针棉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等，并在昆明、重庆、

西安、兰州等地住有坐庄的，信息灵通，因而常依仗权势，利用巨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另一是国民党绥远省地部的文化服务社（现大转盘供销社楼旁），经营文具用品、书籍兼石印，他们凭藉中统特务关系，目中无人，称霸市场，欺压同行，哄抬物价，牟取国难财，藉销售反动及黄色书籍，毒害腐蚀广大人民。尤可甚者，他们利用售书之机，侦察青年人的思想，稍一不慎，就会遭到特务追踪逮捕，遭受迫害。

交通运输业也发展极快，陕五公路：北线由陕坝经狼山、塔尔湖抵五原，南线经临河、天吉太桥、鄂家地抵五原。陕宁公路由陕坝经三盛公、石咀山达银川。水运线以元子渠口作起点，东至五原包头，南达石咀山、银川市以及甘肃省的近河城市。在夏秋通航季节，木船皮筏经常停有一二百余只，承负物资的运转。在卸货场上，堆积着粮食煤炭、磁器木料、水烟火柴及杂货水果，是塞外西部地区重要的水陆码头。

二、商会的成立

一九四二年傅作义实行新县制，陕坝正式组成市政府，由常佩山任市长，设置秘书及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科，会计总务、统计两室，也成立陕坝市商会，选举孙梅坞、王乐天为正副

会长，在其他豪商中选出张玉源、徐诚等为委员。孙是大学生，具有聪明才智善于开展业务，打开局面；王虽是大老粗，却敢仗义直言乐于助人。他们二人配合默契，周密计划由王掌管内部，孙全力对外，积极健全了商会组织。商会下设秘书股，由许干臣负责；征收股由薛振泉负责；财务股由周润生负责；总务股由李广臣负责。共计九人处理本市商务及兼管五原、临河、安北、米仓、狼山、宴江等六个县商会的业务、表报统计、商业进展等工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定节日或当地召开重大集会时，如高搭彩棚的布匹，桌椅板凳，炊事用具，都由总务股李广臣向商店筹借。就是各机关召开扩大会议时，或职工办理红白喜事时，也请老李代为租借各种用具，因此李广臣是很忙的一个。

人们风趣的说：“李广臣是各机关的管理人员”，这为疏通商会与各机关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商会成立后的工作情况

（一）划分行业各负其责。为便于领导和管理，整顿行业归口，计分为十大行：即百货棉布行，副食杂货行，五金颜料行，饮食服务行，文具书籍行，中西医药行，货栈旅店行，粮油酒糖加

工行，手工业行，综合市场等。各行选出代表两人，直接管理本行业，建立各行业责任制。传阅文件时有两种形式：一为木传牌，将文件条列写在传牌上，挨门逐户的传阅；二是召开代表会议或工商群众会议进行传达。

工商业者因有了商会的统一领导与管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见到收益。如业务的改进，产品的更新，供求的调剂，服务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市场繁荣。名牌字号的小食品丰富起来，如玉记酱院的双醋，恒玉兴的糕点，蚨来号的八宝酱菜，恒玉永的稍美、炒菜、包揽酒席，回民马寿祥的清真茶食，都在此时驰名于陕坝或绥西。

（二）兴建剧院。抗战时陕坝忠孝路，仅有杨作舟私营的小型剧院（现杭后医药公司批发部）能容纳三百余人，成为当时的唯一的娱乐场所，当时陕坝已有五万人口，弹丸之地，岂能容纳这么多人，常出现拥挤，秩序混乱，也难维持。陕坝市政府也正在筹建“中山堂”剧院，商会主动认担五万元，用作内部桌椅木凳装饰之类的投资。该院系土木结构，在当时来讲是设计精致，风格别具，雄伟壮观的一座建筑，能容纳一千余人，成为绥西唯一的大礼堂。一九四四年张治中将军来绥西检阅青年团时，就在这里开会。

“中山堂”兼做剧院、电影、二人台的舞台。在

该院上演的剧种有山西永和（傅作义的老家）的楣擢，黄河剧团李锦华（别号二挠子）演唱的秦腔，李膺夫的戏剧学校演出的京剧，有名演员张丽英的山西梆子戏曾一时轰动陕坝。还有康培元领导的山西晋剧，有二八黑小桃花曹菊美等名角，也驰名于绥西。中山堂的建立及各种剧种的演出，为陕坝市人民业余生活增加了内容。从当时抗日战争的前沿地区来说，这种盛况是罕见的。

（三）兴办义坟。当时陕坝市民除地主、豪商、教民持有土地外，其余各行业的人，都无立锥之地，死后安葬或寄埋，找一栖身之地，十分困难。副会长王乐天有见于此，欣然奉献义地十亩（现陕坝变电所东面），使直、鲁、豫、陕、绥、晋等十三个省市老死异乡的人，得到了安息。

（四）甘冒风险为民请愿。一九四三年物价波动早晚飞涨，投机倒把屯积居奇之风盛行，市政秩序混乱。当地政府有见于此，组成了物价评议会，将商店所有存货，进行造册登记，以防止商店私售或转移，销售时须由物价评议会开出介绍，手续繁琐，遭到市民的反反对。而贸易公司及文化服务社，却不受此限制，乘机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物价评议会也不敢管理，更激起市民

的愤怒，几乎造成罢市。适临河商会长高玉堂，也为限价问题来此请示，经陕坝市商会研究，始选出孙梅坞、王乐天、高玉堂、张玉源、胡耀成五人，冒着风险向傅作义反映，傅已深知此举利少弊多，采纳了代表们的意见，解散了各县的物价评议会，恢复了正常的营业秩序。

同年制酒商吴有福，有友人张培西（系山西屯垦队上尉军官）寄放大提包一个于店内，短时间张被长官部军法处逮捕，并宣判死刑。将吴有福也扣押起来。后真相大白，张存放在吴店之皮包内，藏有大烟二百两，吴却蒙在鼓里，同行业得悉此情后，火速向商会反映，随发动全体商民，联名具保证书，向傅作义申诉保释。傅为了转圜息事，将张培西连同大烟，一并移交屯垦办事处处理，将吴有福释放回家。

四、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云集陕坝 给商民带来了灾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全国物价回跌百分之三十，举国欢腾，渴望休养生息，重振家园，安享和平生活。但昙花一现，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大举向沦陷区进军，为了抢夺地盘，利用汉奸，不惜加官许愿，委以先遣军或保安司令。为了扩充军队，收

编敌伪军宪流氓土匪。为了收刮财物，组织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他们穷凶极恶，大肆掠夺。此时傅作义部也奉命东进，强占绥包及张家口，一声令下，将河套地区的国民兵，一扫而光带去。给工商业带来了极端凋蔽不堪的景气。但是不久官僚资本开始兴起。由于陕坝地区长期偏安，南通滇、黔、蜀、秦，西达宁、甘、新，东至绥、包，在这个区域里，官僚资本开始云集。如傅作义的志成公永义号，马鸿逵的积成厚、敦厚成，孔祥熙的信孚号，他们运来的商品，大批存放在货栈内，而市场却出现货物畸缺、供应紧张的局面，加剧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的现象。因而物价一涨再涨，其速度之快，超过抗战八年时间。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五、商会长的更替，工商业遭受新的危机

一九四六年陕坝手工业户增多，工种复杂。当地政府指示，工商会分家，另成立了陕坝市手工业联合会。全体手工业者，选举老铁匠樊祥为会长，主持联合会事宜，下设秘书、财会两干事协助。原陕坝市商会会长孙梅坞，随傅作义东进归绥，担任了绥远省商会会长，副会长王乐天因年事已老，不经常主持会务，且忙于国大代表的活

动，商会的委员们，有的返回平津，或随傅也东进归绥，致使陕坝商会瘫痪名存实亡。

一九四七年秋，杜晋文、韩生美被选为陕坝市参议会正副议长，议会地址设在商会。悬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商会的人员也办参议会的事务。绥西专员公署又派来王敬五秘书参预主持会议工作。为精减机构，经过各行业的商民讨论，正式选出杜晋文、韩生美两人兼任陕坝商会正副理事长。参、商两会合署办公后，国民党陕坝市党部书记长张如春，又指令王敬五在参、商会开展党务活动，为南京伪国大的召开制造舆论准备，并积极支援内战加紧掠夺，动员商民补充兵源，强迫商民献金献物，加征行商过境杂费百分之一，慰问前线伪军，向解放区进犯。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小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崩溃。蒋政权已到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之时。蒋介石为挽救危局，采纳了一九四八年八月份财政部长王云五提出的“图穷匕见孤注一掷”的建议，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卷代替法币。（即每金卷一元，收兑法币300元，收兑东北区伪满洲国币300000元）企图把人民手中的金银和外汇，一网打尽，从而饱其私囊，挽救其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僵尸局面，遭到包括民族资产

阶级工商业和银行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崩溃，造成全国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我区的市面上，人民也成群结队，手持法币，进行抢购各种商品，唯恐花不出去变成废纸一堆。商店吓的紧关店门，群众挤到省党部的文化服务社，将油印机也抢购一空。木器店的棺材，唯恐有人来买也贴上“早已售出”字样的标记。市场秩序极端混乱，伪党政军宪，也无法维持。

会长杜晋文见此残景，也束手无措，无能为力。加以他和阎锡山沾亲，心有余悸，乘机溜回原籍山西五台。

1949年元月末，北平和平解放，给绥远省带来了光明。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国民党蒋政权已陷入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状态，胜败已成定局。绥远省何去何从，成为当时突出的课题。绥远当局主战、主和两派，意见不一，左右摇摆，动荡不安，但在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指导下，傅作义将军的不思劳苦、亲临绥远循循善诱，终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实现了“绥远方式”的和平起义。人民奔走相告，机关商店高悬国旗，四处墙壁贴满标语；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砰砰砰，嘭嘭嘭，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扭秧歌，舞龙灯，踩高跷，跑旱船，人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人山人海，成为陕坝自有史以来的一次空前的大盛况。

一九五〇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坝由市改镇，成立了陕坝镇人民政府。在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筹建了陕坝镇工商业联合会，为统一战线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

一九八五年五月

解放前河套地区税征 工作的见闻

王廷英

一、陕坝地区工商业发展的过程

陕坝原是临河第三区公所的所在地，人口不足三千。虽开设着义合诚、蚨来号等几十家铺，但因居民稀少，市场冷落，买卖并不兴旺。

1939年傅作义进驻五原后，绥远省政府由榆林迁到陕坝。一时军政人员猛增，社会秩序紊乱，房屋畸缺，供应紧张。省府有鉴于此，火速整顿治安，恢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傅作义确定陕坝为临时省会，并积极成立市政筹备处，扩大了市区范围。市区以大转盘为中心，南北大街为中山路，东西大街为中正路，南北抗建路在小转盘与中正路交叉，南北复兴路在大转盘东，也与中正路交叉，成为陕坝四大主街。以后还陆续营建了中山堂、奋斗中学、塞上新舍、长官部等。

1943年陕坝已初具规模，市区整齐，机关林立。人口已达五万余人。仅中正、抗建两路就有商号二百余户，商品繁多，行人接踵，进行交易，一片热闹景象。

中正路东段沿朝鲜巷西南，开辟了摊贩综合市场。在八百平方米的地段，筑成高一米、宽两米的土台四行，行与行之间相隔约二米。二百余户摊贩的货物，堆放在土台上，衣帽鞋袜、针线纽扣、绸缎布匹、糖业烟酒、医药文具、甘鲜果品、五金颜料、车马挽具，一应俱全，使人眼花缭乱。在市场外还有镶牙补眼、照相裁衣、钟表修理、测字算命等摊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这些摊贩，经营灵活，百拿不厌，一问介之，市场繁荣，生意兴隆。

沿陕临公路五里许的园子渠口，屹立在黄济渠中游的大桥上。水运线东至包头，西达石咀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水旱小码头。码头呈长方形，开辟于1900年间，东靠渠岸。西边向东开设着十几家小店铺，经营着百货五金，糖业烟酒，杂货药品，行人在喧闹吆喝声中进行交易。卸货场上，堆放着木材水果，煤炭磁器。夏秋通航季节木船停泊在渠里，帆杆林立，炊烟四起，影桅交相辉映。每当天气晴朗，夜深人静时，皓月当空，繁星闪闪。船上的灯火，被月光映照到渠里，景

象格外幽静美丽。

二、抗日战争时期河套地区征税情况

傅作义为了抗日，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也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便将来立足于华北，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为适应其需要，在国民党中央已明令田赋改为征实征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征购。这样无穷无尽地向人民要粮，致使多数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一九四〇年七月份，财政部组织晋绥区直接税局，抵达陕坝，任命于肖塘为直接税局长。下设征收，会统、总务三科，人员约计二十余人。其征收税目如下：

- 1、营业税：按销售金额，征收2.5%。
- 2、所得税：按工资、稿费、版权、发明专利权、遗产等，征收10%。
- 3、利得税：按纯利润征收20—30%。
- 4、印花税：按件贴四角，如帐簿文契、合同、证书等，按金额征收千分之三。

任安恭为货物税局长，赵光裕为科长，共计人员十余人。其征收税目：

- 1、货物出厂税，如酒征收50%，迷信品征收百分之百。

- 2、按货物征收的，如皮毛征收30%，盐碱征收20%，其余货物按不同税率征收。由于三税

的征收，使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工商业者也遭到挫伤。农民购买力显著降低，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繁荣。

三、抗战胜利后河套地区商业及征税情况

抗战胜利后，由于军政人员东调，陕坝人口减少，工商业远不如前。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反人民内战，致使交通断绝，城市孤立。河套地区，东至绥包，西接甘新，却暂时稳定。一些官僚资本家通过其代理人云集河套地区，如傅作义的永义号，马鸿逵的敦厚成，以及宁夏的八大家如天成西，广兴元、晋义泰、福兴永等。他们借雄厚的资本，贩运鲜美的甘果、畸缺的商品、名贵的药材，依仗特权，互相勾结，有时将市场紧缺商品抢购一空，囤积居奇，待有暴利可图时，再投放市场出售。一进一出，他们的荷包，就装满了金条。他们的活动，也使陕坝出现畸形的繁荣。一时货栈业兴旺，除原有的义合成，鸿祥栈，又开设了民生、玉隆等十余家客货栈。为争夺马鸿逵四太太的生意，特开了张老五、杨兆遂、永兴隆纯回民客货栈。货栈的老板们，充当资本家的经纪人，除收1%的佣金外，有时也能额外啃几块骨头，喝碗腥汤。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设在陕

坝地区的直接税局，奉命东抵绥、包、大同、太原，开辟更大的税源。一九四六年四月份，在陕坝正式成立直接税陕坝查征所。刘耕民任所长，设征收、总务、会统三股。我负责会统，共计人员十三人。在五原设查征组，由张守荣负责。临河组由曹丹侯负责，征收直接税。

早在一九四五年，陕坝地方税局已正式成立，任刘英为局长，张巨川为地方税科长。不久直接税局奉命将营业税划归地方征收，因而将有关案卷及人员杨振声、王廷英一并移交地方税局。地方税局又增设营业科，由杨振声任科长，王廷英任会计主任。其征收税目：

- 1、营业税，按销售总额征收2.5%。
- 2、屠宰税，按头数结合价格征收10%。
- 3、牲畜交易税，按牛马等销售额征收5%。
- 4、娱乐税，按座票总金额征收20%，妓女卖淫按估计或承包方式征收20%。

四、征税中的见闻与回忆

（一）关于营业税。一九四七年地方税局采取了包干制，即将财政厅分配营业税任务数20万元，按60%包给了陕坝工商联，由工商联按季代征入库。其余40%由行商负担，工商联的委员们，多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他们的店铺大，资

金厚，营业好，收入多，又掌握着纳税的分配权，往往假公济私，将他们应担的纳税义务，转嫁给中小商店，畸轻畸重，极不合理。

在行商营业税的征收中，中小行商资本少，经营范围单纯，容易管理。大的行商，经营面广，数量大，存放点分散，售出商品的时间长，常有漏征或偷税的事发生。特别是官僚行商的代理人，如马四太太的敦厚成，它的资金厚，经营范围广，数量又大，一种商品故意分存两地；或者同一种商品开着几张进货单，不易检查，同时征收人员也不敢强行检查，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依仗权势公开请客送礼，或请征收人员赌钱，故意输或打通牌有意赢，最后不要钱认个朋友，或从外地给征收人员捎货，回来高价出售获利。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公开送礼或暗中馈赠。送礼多寡，依据征收人员的权限与地位而定。通过这些手段来拉拢征税人员。一些意志薄弱、见利勇为的人，就会下水的。一但下水，就变成资本家的看家狗，服服贴贴由人使用，允许他们以多报少，或隐藏商品不报，或者商品已全部售出却由他们填报货物转运单（内容为此种商品本地区无法售出，请准许转运×××城市销售），经征税人员批准，全部税款便逃之夭夭了。

（二）关于印花税。由于印花票金额小，不

能全部贴在发票上，为简化手续，仅盖一个戳（刻有销毁字样）即可。印花票由经办人员当场销毁，否则印花票能周而复始再用，肥了经办人员。再者贴花涉及面太广，如帐簿文契合同证书等都得贴用，稍一不慎，就要按偷漏行为论处，因此群众讽刺说“印花章程，人人牢记，吹牛放屁，免贴有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吹牛皮不贴印花”的由来。

（三）关于利得税。由于战时物价暴涨，货币不断贬值，有时出现虚假利润。例如某种商品售出获利润，账面金额数字变大，但再也买不回已售出的商品。商人戏说：“这是镜子里的美人，做不得媳妇的”。为逃避利得税，商人记着两本帐：一本对内，是真实记录；一本对税局，是编造的假帐。但假帐容易出现破绽，一经查出，征税人员便乘机敲诈勒索或补税加罚款。特别在解放前，直接税人多事少，经常查帐，商人受害的更多。

（四）关于娱乐税。当时的戏班，是社会生活中最黑暗的角落。班主多系把头，利用拜把拉帮，残酷剥削演员。他们中有些卑鄙无耻的流氓，强迫教唆腐蚀女演员使之走向堕落，好被他们掌握利用，捞取昧心钱。这些人对上层人物阿谀奉承，带着十七八岁的女演员，四处拜客，当面清

唱。甚至让有钱有势的人，任意玩弄，而她们的血泪收入，也征以20%的税。在征收方法上，既落后又苛刻，如在戏票背面盖章，当天有效，过期即废，因此常有积余废票。况且地痞无赖警特宪兵，自由进出剧院，霸占好座，影响售票。所以剧院叫苦连天，演员们挣扎在饥饿线上。

在旧社会身为女子已是不幸，再沦为妓女尤为悲惨。她们沦为妓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原属善良，但经不住天灾人祸因走投无路流落为娼；有的被骗上当，而又不能自拔的；有的被流氓教唆引诱，身陷火坑的；有的是轻浮浪荡，生活腐化，而误入歧路的。总之，她们在旧社会恶浊的环境中生活，过着非人的生活，随时被人糟践，成为老板挣昧心钱的工具。稍有姿色的妓女，受害尤重，有的甚至神经失常，而反动政府却向这些人征20%卖淫税，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民国万税”。

时隔多年，有的税率已记忆不清，难免有纰缪，希知情者给予补充或纠正。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于临河

（临河政协供稿）

广和义中药铺

李枝荣

我于一九三五年从石哈河来陕坝，经亲友张彦（已故）介绍到广和义中药铺当学徒工。那时当学徒工得经过有一定身份人物的介绍，然后把你领到需要学徒工的药铺去拜见各位掌柜们，让人家相看后再由本人填写身世表，听候录用。如果相准才能正式招为学徒工。就这样我让这些掌柜们相看后才正式当了广和义中药铺的学徒工。

那时陕坝的中药铺只有广和义、福享益、福义堂三家，广和义的掌柜叫石义（又名石仁斋）山西代县人，此人对中药中医懂得很多，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中医大夫，尤其对妇科有研究。据传说石义原只身从包头担挑卖药来到后套走乡行医而发了家，然后开了广和义中药铺的。此人善长外交，爱交朋友，所以开创广和义中药铺的资金来源除自己一部分外主要依靠亲戚、朋友的协助和银行、官僚以及地方绅士的筹划，因此那时的广和义资金雄厚，流动资金也较多。

一九三七年广和义开业后，石义到处寻找有

经营中药材技术专长的药工人员来替他掌管业务，第一次招收了刘继业、聂汗章、赵玺等人。他本人专搞外交活动，联系业务。在精心经营下，加之这些人的大力协助连年获利。常言说：“财是惹祸根苗”，随之买卖的兴隆，这些人之间的矛盾也急增。后来刘继业退出广和义，另建了福义堂中药铺，聂汗章前往渡口堂自筹药铺，赵玺因系石义的姨表兄，仍留在广和义药铺。此时广和义药铺大有垮台倒闭的危险。

一九三九年石义又从山西代县、内蒙包头等地招来了董世锦、李向华、张致中、孟如华、武子英、刘培华、张僖等人重整旗鼓，并依靠雄厚的资本和高明的手段一再扩大经营范围。石重用董世锦，叫他负责药铺的全盘业务，李向华负责门市部栏柜，张致中驻西安当采购，孟如华驻银川当采购，武子英负责加工制做丸散成药，张僖负责中药材的加工剖制切片，刘培华负责跑外联系业务。

广和义药铺设有门市部，专门零售中药材，还成立了收购、加工、剖制丸散的中成药部和办理批发中药材的业务部，并在门市部后院设有库房。人员由原来的十几个人猛增到二、三十人，仅学徒工就有十余人。中药材业务扩展到整个河套地区。这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向东交通

不便，所经营的药材只靠西路（银川以西）进入，但药源还是比较充足。广和义药铺注意对中药材加强质量把关，所售出去的中药材完全是经过加工、剖制后挑选出来的标准药。零售门市部的中药材配方，每一味中药材都包成小包，每包上附有印好的中药材的图样说明，注明主治、功能、性能、产地等字样，并且明牌标价让顾客、患者也能识别中药材，知道治什么病而对症买药，从而给顾客方便，以扩大宣传，增强竞争能力。

广和义药铺还给外地小药商办理批发中药材业务。方法采取赊欠，期限灵活，有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甚至是春放秋回。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小药商资金少的问题又使广和义赚钱的来源更广。实是两全其美。所以小药商上门赊药者日增，广和义还派专人分片联系下乡送货，买药的单位或个人，只要开个药单，人不来也可，就按着单上的一味不缺，无论数量大小均能送货到门。这是做生意的信用。广和义还经营收购当地药材，如芒硝、蒲公英、艾叶、茵陈、青蒿、篇蓄、黄芩、子草、全虫、欠芸等，除自用外还调往外地销售。所以广和义中药铺一跃成了后套经营中药材行的霸头。

广和义的职员工人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

习，由掌柜们挑选出来的。起码的条件得懂得药性、割制方法、中药的方剂、君臣佐使，而且初步能对病下药，背诵“十八反歌”，“十畏”等柜台知识，还得掌握了解一年四季发病规律。在服务态度上，要求顾客、患者上门买药必须掌握其心理，绝不能轻而易举的让他们空手而归，想方设法叫他们满意而归。

广和义门市部还设有代客加工丸散成药，如顾客（患者）不能吃汤药而需要吃丸散药者可随时加工制做。门市部本身还加工制做通常用的中成丸药、散药，如六味地黄丸、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山楂丸、附子理中丸，人参健脾丸、天王补心丹、参苓白术散和冰硼散、益元散及各种膏药等。

门市部还为顾客（患者）治疗急病、小病，问病开方卖药，能给患者解决当时的痛苦。并设有坐堂先生（医生）每天在门市部给患者看病，这和医院现在的门诊一样。如果外边有患者来请也随之出诊。那时诊费不明收，都加在每个处方内，如药价一元，加诊费三角就是一元三角。医生遇到有钱人、地方绅士、大官僚或者急于求医的患者，先吃几服汤药，最后配一剂丸药，处方上总要开些不需要的贵重药材，如患者真的需要贵重药材时往往是需五钱人参医生就开上一两，把多开

五钱人参的钱扣下由医生所得，或补助员工的伙食费及其它费用。

广和义药铺的门口牌子上挂着专门经营川广云贵四地区药材，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招揽顾客的招牌。那时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帐快利钱多。”“货高招远客。”“人无笑脸休开店。”“骗死人不偿命。”“若要发，众人头上刮。”那时广和义经理及石义及其掌柜们最善于运用这几句话，从而构成了广和义中药铺经营的特点。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物价下跌，国民党的货币贬值，石义又从事收购皮毛杂货生意，精力不全用在药铺上，这样广和义药铺的买卖就被催垮了。不久，又由石义的内弟赵银福负责，带领所有从业人员又干起了广和义药铺的生意。这时石义已跑到包头居住，另谋他业，对广和义的业务经营一概不管，只是到年底时才回陕坝分红取利。

一九四九年春天，由于全国快要解放，石义由包头重返陕坝，将广和义药铺又重新整顿改组，仍由其内弟赵银福和外甥女婿刘汉章二人负责经营。这时的资金很少，难以维持，全靠向外借贷。陕坝解放后开始扫毒运动，赵银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改造，广和义的业务经营就由刘汉章

一人负责。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开始，广和义药铺因为偷税漏税被罚款，补税后就没有资金再继续经营下去了，将所有的职工全部解雇。记得那时的职工有刘汉章、冯荣二人参加中西医诊疗所工作，杨万华参加复兴永药铺工作，崔兆瑞参加松公堂药铺工作，武子英参加德兴永药铺工作，孟如华、赵玺二人组织了太和药店，刘培华、张致中、郭同强三人组织了四义生药店，剩下其它职工同志有的改行，有的下乡种地另谋他生。广和义药铺就这样结束了。

百川堡屯垦的始末

刘培荣

一、阎锡山军垦的历史背景：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秋，阎冯联合反蒋战事，由于东北张学良的奉军援蒋参战，使阎冯联军在中原失败。阎锡山只做了九天国民政府主席，就宣告垮台。阎锡山见大势已去，率国民党扩大会议的主要成员汪精卫等人退回太原。随之阎部军队亦陆续撤到晋绥。阎为形势所迫，决定下野，逃往大连。蒋介石委派张学良负责华北军事善后事宜。

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张学良正着手整编晋军之际，石友三叛变了张学良，接着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阎锡山乘机东山再起，担任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集晋绥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时绥远主席李培基已由傅作义接替。而统治晋绥两省的太上皇阎锡山，目睹日寇侵略势力已威胁到山西；又察觉陕北的刘志丹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动摇了他在晋绥的割据局面。因之阎锡山急于设法开拓新基地，以维护其“存在就是真理，

需要即是合法”的哲学信念，便以“御侮实边”之名“拨兵屯田”。先从王靖国的七十师、李生达的七十二师、傅作义的七十三师中，抽调了三百多老弱病残的退役军官，组成了军官屯垦队，前来祥泰玉、罗缸房一带扎落垦殖戍边。接着在一九三二年，由王靖国七十师二〇五旅四〇九团侯振清部、四一〇团石焕然部，以及四〇八团徐子珍和四三〇团孙福麟等部队，相继开进后套地区。因当时后套匪患猖獗，故一面剿匪清乡，一面开拓垦地。实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当时阎锡山的处境来看，不论是为了抗日，还是为了防共，运用军垦开辟资源，加强割据地盘，是其谋划立足边陲，而图长远之道所必须。阎锡山的军垦，客观上是以开发河套之名，屯垦实边，实际上是为了扩张地盘，掠夺河套资源，以巩固和扩大其统治晋绥的实力。因此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包头成立了“绥区屯垦督办公署”，阎锡山自任督办，任王靖国、傅作义、张荫梧为会办，任石华岩为坐办，而真正实权则操纵在阎的亲信王靖国手里。公署内设文书、技术、庶务、经理、农林等科室。一九三二年九月五原设立了屯垦办事处，下设经理、文书、庶务、农作、水利、林牧、军事、交际、测量等科室。一九三二年进入河套的屯垦队，以王靖国所属的二〇五旅

(四〇九和四一〇团)为主,其次还有傅作义、李生达所属的部分官兵,以及王、傅、李三个师编余下来的退役军官队,总计有三个团辖连队和三个军官垦殖队,分布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上,从事屯垦。军官队驻在临河二区祥泰魁和祥泰玉,以及五原城东的双马寨圪旦。

二、百川堡命名的缘由:为了永铭阎锡山“屯垦实边”的事迹,使之传闻后世,就在早已破落的祥泰魁旧址东侧,兴建了一处高五米,长宽各百米的围堡,命名为百川堡(现临河新华乡)。因阎锡山字叫百川,堡者取塞上堡垒之意也。百川堡建于一九三五年,堡内有砖瓦房近百间,花卉温室各一所,城垣四周和马路两旁都栽种柳树。内有办公室、会议室、库房、食堂和宿舍等设施。同时又将距此二十华里的祥泰玉改名为永安堡(现临河狼山乡),以映托阎百川的疆域永远昌盛,长治久安。在确定永安堡之前,曾拟以王靖国字叫治安而取名治安堡,王靖国为回避阎锡山的忌妒,怕犯分庭抗礼的罪名,故把治字改为永字,以示忠诚之意。

三、百川堡屯垦办事处的设置:一九三二年随着屯垦军的入套,先在五原筹建了屯垦督办办事处。一九三五年百川堡建成后即迁来新址。阎锡山自任屯垦督办,包头设有督办公署。王靖国为

屯垦会办，实际代行督办职权。抗日时委田树梅为屯垦坐办，常驻百川堡，主持有关屯垦的一切事宜。任屯垦办事处处长的先后有周建吾、郭维藩、吴相山、张圣宇等，其中张圣宇任处长的时间最长。因其是五台人，深得阎锡山、王靖国之宠信。屯垦办事处机构，经调整后，设有外事室（主任骆时），并分为农作科（包括园林指导，科长张汉卿）、水利工程科（包括林业，科长常子敬）、庶务科（包括购销，科长杜伯松）、经理科（包括行政财务，科长张文瑞）、秘书室（掌理文书监印等，秘书郭登州），并为推广造林，绿化荒原，在五原东门外，设置了农林试验场，栽培果树、育苗、种子田，（场长张立范，技正张志芳）。试验场内分作物、畜牧、蔬菜、花卉、苗圃、加工等坊，并为培训垦区技术人员，还专设了农事训练班。在五原县城设立了六年制实行小学，百川堡亦有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所需教育经费，统由屯垦办事处筹措。并在办事处统一规划下，开挖了一条屯垦渠。其容量相当于干渠，由缠井河南端开口，北到乌加河归尾，为二喜渡口闸箱所管制，于一九三四年建成。灌溉地域从现在临河县的乌兰图克、新华，直至十二红圪旦一带，皆能受益。现在的新华渠，就是解放后重新洗挖后的屯垦渠。又由孔宪智营开了一条十二连

渠，从二喜渡口到百川堡，即现在人们所说的甜菜渠。

为了军民购物方便，一九三五年屯垦办事处在五原设立了屯垦合作总社，资金来源大部分由阎锡山筹发，少部分则由垦区官兵认股。该社不但直接掌握各营连的消费合作社，而且经营私商的消费、信用、供给、运销等业务。为了进一步充实基金，扩大经营范围，还大量发行了“合作流通券”纸币，票面有一角和五角两种。合作总社不但适销当地农村的土特产品，同时大量进销平、津、沪等外地百货，对河套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垄断地位。

屯垦发行的流通券，等于当时的山西省银行和绥远平市管钱局发行的钞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了法币，为全国通用之货币，屯垦办事处所出的流通券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吃香了，便逐渐收回，销声匿迹了。

屯垦办事处为了自身运输上的方便，有利于垦区军民的交通，于一九三四年修筑了一条五原到陕坝长约二百二十华里的北公路。其路线为：一出五原经沙河桥、新公中、乃马召、二楞、乾旦、塔尔呼、五分桥、七股地、百川堡，往西经祥泰玉、店圪梁、世成西，通到陕坝园子渠。并在沿路两旁栽植树木。为绿化百川堡周围，曾向德

和泉购进大量树苗，营造林带。但种植的不少，成活的不多。现在到了临河新华公社，还可欣赏五十年前粗大成荫的树木。在永安堡的附近除垦殖造林外，孔宪智营长还办过一所私惠小学，但为期不长就停办了。各垦区均设有医务所，在当时后套缺医少药情况下，对农民患病求医亦有帮助。

四、屯垦队的分布：一九三二年屯垦军进入后套平原，预定以三个团从事开垦，即四〇九、四〇一和四〇八团。每团十二连，共编屯垦队三十六个，分布在五原、临河和安北三县境内，拟在河套平原上建立三十六个新村。北从乌拉山边狼山脚下，南至黄河北岸，东由西山咀乌梁素海起，西到杨家河、头道桥一带。屯垦队的营盘星罗棋布，新村亦渐建成。并以各该屯垦队的营长名字为乡名的有：五原境内的富煊乡，折桂乡、坤原乡、良辰乡、道五乡、敬生乡、觉民乡、子厚乡，以及临河的贵元乡、宪智乡、广成乡、寿轩乡、贵生乡、可言乡等。在临河百川堡附近分布的屯垦队第一大队贾世海，二大队李文符，三大队孔守恒。每个大队下属四个分队，建立了十二个垦区点。计有：醋铺圪旦（今隆强四队）、大拴虎圪旦（今隆光三队）、公中庙（今隆强四队）、移民村（今隆光六队）、黑圪梁（今胜丰一队）、通

元成（今红旗大队）、永顺和（今隆强六队）、东圪旦（今新丰三队）、白唠圪旦（今胜丰二队）、西大营圪旦（今新丰五队）、沙盖即五合圪旦（今前进大队）、西人圪旦（今民乐大队），其它分布在临河境内的还有永安堡、罗家缸房、白脑包、八岱、世成西、格汉图以及红鞋店等处的屯垦队。

从一九三二年开垦以来，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屯垦队新村棋布，田园毗连。在这四、五年中，每年都有发展。屯垦队扎营遍及原野，能够一呼百应，互相支援，对大股土匪派遣部队剿灭外，小股或零星散匪，皆由各屯垦队就地扑灭。又经过一九三二年及三三年两年的剿匪清乡，基本上平息了后套多年来的匪患，维护了地方治安，稳定了社会秩序。

屯垦队垦殖的土地面积经督办公署划定地区后，由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垦务局丈放并颁发执照。规定每团以一千二百顷为度。每连丈放土地一百二十顷，所需经费由阎锡山统筹，山西省银行和绥远平市管钱局贷放，三年还清。据不完全统计垦地就有五千余顷，还兼并了山东移民地在永济渠西的三百五十余顷，并没收了王英牛犊的一些土地。各屯垦队除种植粮食蔬菜以及油料等经济作物外，还大量种植鸦片，收入占到一定比重。

经过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各屯垦队所需粮食，不但生产自给，而且达到了仓有余粮，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各屯垦队都有碾磨房、铁木工房，一般耕具做到自制自修，在百川堡开设油粉房，由武及山承管。

五、屯垦队出租土地：在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后，所有驻绥部队，大都调守山西雁门关。后套一带的守护落在屯垦队身上。故将散在各地的屯垦队集合到一起，编为五临警备旅。各屯垦队的官兵，抽出85%年富力强者，参加抗战，所余15%留在垦地照门看摊。由各屯垦连付掌管土地经营和收租事宜。从一九三七年后大部屯垦地不再自耕，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沿用的三七分股之租佃合同，土地所收获之产量，屯垦队分三成，其余七成属种户，而地上所应摊派之军公粮，田赋粮以及水费等项负担，全由种地户来负担。这就叫“三七股子不带害”的租佃关系。种户使用屯垦队的耕牛，每头耕牛出租糜子二石，秋收后交付。

六、屯垦与蒙汉农牧之矛盾：阎锡山在开垦过程中，对蒙旗王公和地方豪绅，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方法。这些人为了上取阎王的恩宠，下获地利以自肥，让出了一些牧场和熟荒。在丈放土地时，不但蒙旗王公捞到利禄，而当地官商

地主亦能贪污中饱，垦务机关更加营私舞弊，再加上承包大片土地之地商借机转手渔利，致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残酷压榨。由于开垦，蒙汉农牧民甚至中小地主和牧主的利益，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损害。在开垦进程期间，虽遭到蒙汉居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由于屯垦队凭恃政权在手，又有军事做后盾，未演成重大对抗行动，所以能按照预定步骤进行垦殖。

七、百川堡屯垦队的消亡：屯垦队因抗日军事的需要，合编为五临警备旅，肩负起河套地区的保安任务。这支屯垦队，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在傅作义的指挥调动下，参加了包头绥西和五原战役。阎锡山为了把这支屯垦队调回山西去，于一九四一年春，改番号为陆军独立第二〇三旅，编入第二战区作战序列。一九四二年九月傅作义又将该旅编为骑四军步兵旅，归属董其武建制。这支以屯垦为基干的部队，便归于消亡。百川堡屯垦办事处及屯垦队的部分营盘，在一九四〇年日寇侵入河套时，因为一九三九年傅作义从晋北转战进入河套后，曾在百川堡召开举办过抗战建国讨论会和军政训练团，故日寇对百川堡进行纵火烧毁。一九四九年绥远“九一九”起义后，董其武指派三十七军接收了屯垦办事处的财产及其所有物资，办事处的官员

张圣宇、李耀庭、王雪琴等连同职工士兵数十人，均编入三十七军后勤处。所以在实行土改时，屯垦土地房屋农具耕畜等，分给贫苦农民使用，其它实物资财，早已零落一空，人民所得无几。

八、屯垦队的功过是非。阎锡山创办绥西屯垦，兴修了五陕公路，开挖川惠和华惠干渠，引进并推广了农艺，在发展生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消除河套多年来的匪患，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防建设。可是阎百川的屯垦，却给官僚资本、封建势力开拓了道路。屯垦的官种大烟，影响了禁烟令的贯彻，不能尽快根绝烟毒。后套的娼妓虽然在屯垦未来之前就有，但在屯垦进套以后，更加严重，屯垦队的纪律松弛，使官兵行为浪荡。相传“当兵进门狗不咬，闺女接待娘不恼”的流言，籍以证明屯垦队有伤地方风化的事实。屯垦队官兵参与赌博包庇赌棍，干与诉讼，影响非浅。有些官员在后套发家致富，成了地主，暴发户恶贯满盈的亦不乏其人，如在百川堡一带屯垦的三架王：王子贯、王青煊和王尚，由于民愤很大，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被依法处以极刑。屯垦连长杨福兴，在狼山境内胡作非为，血债累累，纵容其护兵强霸赵春和之姨嫂为妻，因赵母不允，老人遭到枪杀。临河地区称霸一方的白阎王(贵元)在人民的控诉下，也被镇压了。以强凌弱，豪富欺

贫的旧社会里，正如老乡们所说：“肥了大户，饿死小户，出差出害是中户，屯垦队官员是大肚。”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我过去曾在屯垦军五临警备旅，后改为二〇三旅、骑四军步兵旅担任营指导员与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我所见所闻之追述。为了准确，经过进一步核实了解，加以整理。由于时隔年久，及记忆的局限性，当然不够详尽，有差错之处，在所难免，尚希有关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于临河

乌梁素海的形成和发展

赵培新

乌梁素海犹如一块半月形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狼山与乌拉山之间。其面积广阔，环境优美，物产丰富。是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中最大的湖泊；水质肥沃，水产资源丰富，也是内蒙古重要淡水渔业基地之一。它盛产鱼、苇、蒲等水生经济动植物，同时，也是一百多种鸟类栖息、迁徙的场所，堪称北国江南。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曾达八百多万斤，蒲、苇最高年产量达六千多万斤。这样丰富的水生经济动、植物资源，为发展我盟水产事业及多种经营，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建国以来，乌梁素海渔场的广大干部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养捕并举”“以鱼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把乌梁素海建成自治区商品鱼、苇、蒲生产的重要基地。据统计：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二年总产鲜鱼四百零九万九千九百三十吨。所产鲜鱼不仅供应了区内市场，还支援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苇、蒲主要用于造纸及手工艺品的生产。仅六六年至八〇年，苇、蒲总产量为十

九万零七百一十吨（仅国营数字）对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

一、乌梁素海湖泊的形成及演变

乌梁素海位于后套平原的东部。北靠狼山南麓山前冲积洪积平原，东岸接乌拉山洪积阶地，西岸与南岸皆为黄河北岸之冲积平原。乌拉山、狼山海拔高度为二千米上下；黄河北岸的冲积平原海拔为一千零五十米左右，整个平原地势平坦，倾斜度小，从西向东坡降为三千分之一至五千分之一，从南至北坡降为四千分之一至八千分之一。乌梁素海地势最低，湖底平坦，一般在海拔一千零一十七点五米至一千零一十五米左右。最低处位于湖区的东南部，海拔为一千零一十五米。

乌梁素海的前身为昔日黄河之故道中的一部分，它的形成及演变，与黄河改道和后套平原发展灌溉事业有着密切联系。其形成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公元一八五〇年以前，黄河流入后套平原，便分为南北两河，南河即现在的黄河主道，而在当时并非主河道，而是以北河，即现在的乌拉河和乌加河为主河道。由于地球表面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使阴山山脉持续上升，后套平原相对下陷。至使北河于现在的乌梁素海处受阻，

不能继续东流而转向南流。形成一段南北走向的弧形河道，再沿狼山山脚下东流，并通过色尔腾山之间的明安川继续东流。与后门河（即现在包头市昆都仑河）相汇合，而后转向南流，于现在的西山咀镇附近与南河汇合。这一段南北走向的河道，就是现在乌梁素海的前身。

近代，由于草原植被遭到破坏。阿拉善流沙在西北风力的作用下，通过狼山和贺兰山之间的缺口，不断东侵而埋没了北河河床。同时，色尔腾山及乌拉山山洪所挟带的泥沙，也不断地在河东岸大量堆积，至使河床不断抬高。终于在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将乌拉河与乌加河之间一段长约十五公里的河床淤塞，迫使北河南移，由此南北河合一，成为今天的黄河。北河断流后，在乌拉山南部的旧河道处，尚留有两处积水洼地，即现在乌梁素海中较深的大巴尔洞和海壕，成为面积总共只有两平方公里的河迹湖；而其它低地逐渐被居民垦植为农田。至今，在乌梁素海湖底仍然存有沟谷、浅滩与沙丘等河床所具有的特征。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清朝政府废除了禁止汉族妇女出关的法令后，汉族农民得以在后套定居。同时大兴水利工程，修整了各大渠道。一九三〇年以后，由于后套灌溉事业的发展，把乌

加河作为总退水渠道，各大渠道的退水都流经乌加河，汇入大巴尔洞和海壕两处洼地。因地势南高北低，故退水量大于向黄河的排水量。致使存水面积逐年扩大，这样便形成了大型湖泊。与此同时，黄河又曾几次泛滥，结果使这个河迹湖在自然条件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下，水面积不断扩大。到一九四九年，湖面竟然扩展为七百多平方公里（一百多万亩）的大湖了。

解放后，随着后套农业发展的需要，灌溉用水逐年增多。当地政府对后套水利事业进行了有计划的修整。疏通了乌梁素海通向黄河的进排水渠道。直接流入乌梁素海的渠道，除乌加河外，还有三条干渠及数条排水沟。东岸有余太河、哈拉乌苏沟等八条干谷，在雨后有洪流注入使乌梁素海成为后套排水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湖周筑起堤坝，控制了水面进一步扩展。因而到六十年代，其面积已经缩小到四百多平方公里（六十多万亩）。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围湖造田，使湖面进一步缩小。一九六九至七六年间，水面只有二百六十七平方公里（三十七万亩）。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湖泊水位猛涨，持续二十余天，造成西北岸堤坝决口，湖面又扩展了七万亩。如今，湖泊总面积为四十四万亩。

二、乌梁素海水源的调节

乌梁素海的水源主要来自灌溉退水、山洪以及降雨。个别情况下，有少量黄河倒漾水。

灌溉退水：一九六六年以前，主要是通过乌加河及塔布等三大干渠。一九五一至五九年，每年约有四点零六亿立方米水退入湖中。一九六〇至六五年，每年减少到一点五七亿立方米。一九六六年总排干工程竣工后，后套各大干渠的退水都通过总排干（乌加河）进入乌梁素海。塔布的长塔干渠的退水也直接排入湖内，一九七七至八〇年，平均每年向湖中排入灌溉退水为四点零二亿立方米，占总进水量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四。

降水量约占总进水量的百分之十五。河套平原降水量介于一百五十至四百毫米之间。东部较西部多。乌梁素海所在地的乌拉特前旗年降水量，十五年平均是二百二十四点二毫米，其中百分之六十六降于六至八月份。最大年降雨量是五八年，为三百五十四点三毫米。最小年降雨量是五七年，为一百四十五毫米。按年降雨量二百二十四点二毫米计算，则平均每年总降水量为零点六六亿立方米。

降雪是降水的另一种形式。根据十五年的资料统计，每年只有七点一天的降雪日。最大积雪

深度是十八厘米（五七年四月十日）。一般积雪深度是一至十厘米。冬季湖上冰面风大雪少，对于鱼类安全过冬极为有利。

山洪来自湖泊北、西两岸的山谷。主要有余太河、哈拉乌苏等八条干谷。平时无水，每逢雨后，便有大量洪水泻入湖中。洪水流入量每年平均为零点五二亿立方米。

总计上述各项进水，每年平均有五点二亿立方米水量流入乌梁素海之中。

乌梁素海的水量损失主要是蒸发，约占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二。根据西山咀实测，乌梁素海水面全年蒸发量为二千四百六十五毫米。折减系数按百分之七十计算，蒸发强度为一千七百二十六毫米，年蒸发量为五点一一亿立方米。另据内蒙水利厅设计院实测。则确定为一千二百三十四毫米，年蒸发量为三点六五亿立方米。据此得出，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五点五倍。以三点六五亿立方米计算，占总去水量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九。每年全湖渗漏量为零点五八至零点七五亿立方米。

一九七七至八〇年，平均每年向黄河排水二点一七亿立方米。

真正能够控制湖泊水量的关键，是座落在王六子壕渠口的土坝。王六子壕是乌梁素海最南端，

唯一能向黄河排出湖水的渠道。通过土坝的工程设施，可以控制向黄河排出的水量，以保证湖泊所需水位。

乌梁素海的最高水位期是在九、十两月间，最低水位期是在五、六两月间。这种现象显然与我国一般湖泊不同。

黄河流至河套含沙量虽大，但是流经灌区，水缓沙沉。所以当黄河水通过乌加河等渠道，流入乌梁素海，泥沙含量已大为减少。据五三至五八年的统计，乌加河平均每年输沙量为十三点八五万吨。而西山咀退水渠的排沙量，则平均每年不及一万吨。这样大部分泥沙沉积在湖底，形成了湖底逐年淤高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一般水深只有一至两米，最深处二点五米左右。

据统计，六〇年至八〇年水位变化如下：

一九六〇年1019.1米	一九六九年1019.1米
一九六一年1019.1米	一九七〇年1018.7米
一九六二年1019.04米	一九七一年1018.5米
一九六三年1018.09米	一九七二年1018.3米
一九六四年1018.04米	一九七三年1018.1米
一九六五年1017.5米	一九七四年1018.1米
一九六六年1018.3米	一九七五年1018.2米
一九六七年1018.8米	一九七六年1018.3米
一九六八年1019.1米	一九七七年1018.8米

一九七八年1018.7米 一九八〇年1018.5米
一九七九年1018.8米

三、乌梁素海历年渔业生产情况

从一九三〇年起，开始有个体渔民在海里捕鱼，这种个体生产一直延续到解放。

解放以后，乌梁素海的渔业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五〇年至六〇年是创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渔业生产能力从小到大，鲜鱼产量直线上升。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渔业在国民经济中受到重视，人民政府配备了渔业专管人员，渔业管理机构从诞生到逐步完善。

解放初专门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户很少，本地绝大多数渔民是农忙种地，农闲打鱼，一九五一年有渔民八百六十人，五二年由于河北省安新县、文安县、玉田县农业受灾，许多农民盲目流到内蒙来捕鱼自救。渔民人数猛增达到三千三百人，到了五三年，渔民人数竟巨增至九千人。其中河北来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当时还没有渔业专管机构，制度不健全，对渔民的政策管理和生产组织都很混乱。鱼产情况和产量数字等都没有统计。

一九五四年当地政府对渔民进行了审查登

记。并同河北省农业厅取得联系，规定：凡来乌梁素海捕鱼者，必先联系，经同意后，方可介绍前来。外旗县的必经县级介绍；本县必领有多级介绍；经县建设科审批同意、登记，发给渔业登记证，才准搞渔业生产；凭渔民证，粮食部门才供应口粮；供销部门才收购鱼货（当时不许生产者自销鱼货）。这一年，经过整顿、压缩，到年末，渔民人数降为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到五五年已降至一千一百人。

一九五四年，经过宣传教育和有力的组织领导，产生了一些渔业生产及互助组织。

1、劳资结合组：冬季冰上捕鱼，资方以投入大拉网为资本，吸收贫苦渔民为伙计，每个劳动力分一股。大拉网按五十袖分一股。每合网四百袖，需十五人操作，若是八百袖，就需要三十人操作。按大拉网投入股分，从收入中分红。这是一种网主剥削渔民的组织形式。

2、亲朋组：这种组织形式是，亲朋好友自动结合，把各自的船只、网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这一组织的成员，多为本地农闲渔业生产者。分配方式：有的按劳动力平分收入，有的一只船顶三个人分配收入。

3、合伙集资组：这种组织形式，促使劳动者更关心集体的生产成果，有利于交流经验，提

高技术。但是贫穷渔民因缺乏股金而不能加入。

4、农渔结合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都是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派到这里，来搞副业捕鱼的。生产用具由原农业社供给，收益交社，劳动者回社参加分红。

一九五五年渔业社会主义改造，乌梁素海的渔民，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渔业生产互助组五十四组，参加劳力八百零九人，占渔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一。到十二月份又组建了两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参加渔民五十九户，占渔民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六六。这一年的渔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形式有三种：

1、初级互助组：组员各自的船只、网具，私有伙用。对投入工具，评分分红或给予一定租金。其中一部分作价入股归公。劳力分红，不分技术高低，不分劳力强弱，私事请假不扣工，完全按人平分。

2、中级组：（即初级社）主要的船网、工具，社员集资全部公有。组员私有网具，如个人自愿，就作价归组。组内有年度和季度的生产计划，设专人记帐，掌管财务，管理制度开始健全。根据每个组员技术高低，劳力强弱，评出底分。纯收益分配，除集体留下购买网具的公积金和奖金外，全部按底分分给社员。

3、渔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将全部网具和部分房屋作价归社，作为每个社员的股金，多退少补，有的贫困社员交不起股金，可向当地政府申请贷款交纳。

五六年同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掀起了渔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乌梁素海各种形式的渔业生产互助组，于同年秋末全部进入了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

第二阶段：一九六〇至六五年渔业大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乌梁素海的渔业生产，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较大贡献。特别是一九五九至六二年，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救灾渡荒，渔业受到特殊的重视。一九六〇年三月内蒙党委、人委发了“关于加强领导大力发展水产事业的指示”。规定了“养捕并举，国社并举”的方针。具体要求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以渔为主，多种经营；加强水面管理，大搞养鱼捕鱼的群众运动，培养技术力量，加强科研工作。同年又成立了国营乌梁素海渔场（原为乌梁素海水产管理局），统一领导，使渔业生产步入正轨。渔场总部设在坝头，沿湖共设十一个分场。并增加投资，使重点产区生产能力增加得很快。捕捞产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自然资源再生能力。这时捕鱼生产的设备、

网具、劳动力已大大加强。生产时间也从过去主要依靠冬季冰上捕鱼，发展为常年作业。并且开辟了许多新水面和新的作业网点。捕鱼技术亦有所改革。乌梁素海在此期间渔业生产情况是：

年 度	水面积(万亩)	平均亩产(斤)	年产量(万斤)
一九六〇	8.4	8.5	715
一九六一	9.3	7.5	695
一九六二	7.7	7.7	589
一九六三	7.0	8	562
一九六四	5.0	11.3	564
一九六五	5.0	8	400

乌梁素海渔场从一九六〇年至六八年隶属水产系统主管，每人年平均捕鱼量六千零三十六斤。

一九六〇至六五年乌梁素海渔场历年人口职工统计：

年 度	总 人 口	工 人	干 部
一九六〇	1 8 0 0	6 0 0	4 5
一九六一	1 8 0 0	6 0 0	4 5
一九六二	1 7 0 0	5 5 0	1 2 0
一九六三	2 1 0 0	8 0 0	1 2 0
一九六四	1 8 0 0	6 0 0	1 1 0
一九六五	1 7 0 0	5 5 0	1 0 0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至七六年，国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无政府主义横行，社会秩序混乱。在所谓革命大批判中，一面批“走资派”“五业”并举，破坏生产的罪行，一面撤销渔业管理机构。“以粮为纲，全面扫光”，把渔业生产秩序全部搞乱了。所有保护渔业资源的政策、法令都失去了作用。致使鱼类的自然繁殖和天然资源遭到空前破坏，鲜鱼产量锐降。

乌梁素海从一九六〇年建立国营渔场到一九六五年以黄河鲤鱼为主，六年内共产鲜鱼一万二千吨，多年来为国家做了较大贡献。而一九六九年却强行变其为农场，大搞围湖垦荒四万余亩。造成水位大大下降。冬季因水浅，鱼类无法越冬，大量死亡。使渔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六九年撤销了渔场建制，划为兵团管理。一九七五年兵团撤销后，渔场建制仍未恢复，又划为农管系统（七六年十一月经上级批准，改为渔场，但体制未变）。文革期间，改变了多年来乌梁素海“养捕并举，以鱼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所以十一年来只产鲜鱼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吨，一九六九年至七七年，共亏损一千零六十七点七万元，每年平均亏损一百一十八点六万元。文革十一年中的渔业生产情况是：

年 度	水面积(万亩)	亩产量(斤)	总产量(万斤)
一九六六	4 0	1 5	6 0 0
一九六七	4 0	10.1	4 0 4
一九六八	4 0	1 0	4 0 0
一九六九	3 7	4.6	1 6 9
一九七〇	3 5	5.1	1 8 0
一九七一	3 4	5.1	1 7 2
一九七二	3 4	3	1 0 2
一九七三	3 4	2.4	8 0
一九七四	3 4	1.8	6 1
一九七五	3 4	2	6 8
一九七六	3 4	3.7	1 2 6

从六九年划归兵团管，八年内每人平均捕鱼量三百六十七斤。

一九六六至七六年乌梁素海历年人口职工统计

年 度	总 人 口	工 人	干 部
一九六六年	1 6 0 0	5 5 0	8 0
一九六七	1 6 0 0	5 1 5	8 0
一九六八	1 5 1 5	5 2 8	7 1
一九六九	3 9 5 5	3 1 8 5	4 5 0
一九七〇	5 7 5 4	3 8 8 9	4 5 0
一九七一	5 7 9 5	3 1 6 8	4 5 0
一九七二	5 5 0 6	3 6 5 2	4 5 0
一九七三	4 2 2 3	3 4 3 8	3 0 7
一九七四	4 9 6 7	3 1 2 0	4 7 6
一九七五	4 3 3 5	2 5 0 4	1 0 4
一九七六	3 8 0 2	2 1 1 4	1 0 4

第四阶段：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渔业生产逐渐受到重视。渔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秩序逐渐恢复。鲜鱼产量缓慢回升。一九七七年三月

国家召开林业、水产会议。同年五月内蒙革委会召开林业、水产会议上重申了“以养为主，养捕并举，以鱼为主，多种经营”的水产方针。使渔业生产重新受到重视。在整顿、加强水产机构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渔业的措施，加强渔政管理，保护渔业资源。渔场经过整顿，逐步走向正规。七七年由于洪水淹没了围湖造的田。加之疏通了总排干，增大了进水量，使水面积达到了目前的四十四万亩。

一九七九年根据全国水产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自治区规定了“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养殖，养捕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活跃市场”的方针。八二年贯彻执行全国淡水渔业会议提出的“认真调动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水面，以养为主，养殖，增殖，种殖，捕捞相结合，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渔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据一九八二年统计，渔场有渔船一百多只，开始有了机动船。渔具有挂网和箔旋两种，共计五百余件。挂网数量虽多，但鱼获量较低。箔旋鱼获量较大，是其渔业生产的主要网具。养殖场以鲤鱼为主，有亲鱼越冬池、产卵池和培育苗种池塘一百四十余亩，网箱二十个，并有配套的饲

料加工设备。

乌梁素海渔场，自一九八〇年加强经济责任制以来，把产量、产值、利润等经济效益指标分别下达落实到分场、生产队和船组。经费开支指标包干落实到各科室，实行“节支留用、超支不补”的原则。取消了“大锅饭”，砸碎了“铁饭碗”。这些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各级领导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从一九八〇年至八二年创造了连年超产，连年超利润的大好形势。

这一时期乌梁素海渔场隶属农管系统，渔业生产情况是：

年 份	水面积/万亩	平均亩产/斤	年产量/万斤
一九七七年	4.4	3.8	168
一九七八	4.4	4.6	202
一九七九	4.4	4	181
一九八〇	4.4	3.8	167
一九八一	4.4	5	220
一九八二	4.4	4.8	213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间共产鲜鱼五千

八百五十五吨，每人年平均捕鱼量一千四百七十二斤。

七七到八〇年人口职工统计：

年 度	总 人 口	工 人	干 部
一九七七	4 1 7 0	1 8 6 6	1 0 4
一九七八	3 6 3 4	1 6 0 1	8 9
一九七九	3 6 0 0	1 3 2 7	1 0 3
一九八〇	3 8 0 0	1 4 9 2	9 3

一九八一年职工人数为1588人，一九八二年职工人数为一千六百人。

合理利用乌梁素海的自然资源，是关系到发展后套灌区的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维护生态平衡，以及繁荣市场经济和调剂人民生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故此有必要对乌梁素海的形成和发展做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发展我盟水产事业，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

我们所知道的乌梁素海

陈建盛 董玉奇

乌梁素海风光秀丽，水产资源丰富。这里与河北白洋淀相媲美，与江南水乡相争艳，是内蒙古著名的淡水湖泊，是沙漠中的世外桃源，所以被誉为“塞外明珠”。乌梁素海的最初形成与变迁，有待于专家们研究考证，我们仅就近现代的一些情况，简要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一、自然概况

乌梁素海，位于乌拉特前旗的中部，东海岸似弓形，西海岸呈直线，犹如月牙一般。其中心地理位置在北纬 $40^{\circ}44'$ — $41^{\circ}03'$ ，东经 $108^{\circ}41'$ — $108^{\circ}57'$ ，西海岸与苏独伦、树林子、新安、西山咀等乡接连；东海岸与大余太乡的马卜子、南昌、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的西羊场、坝头毗邻；北距德岭山不远；南离乌拉山很近。全河套灌溉田地的退水，都由乌加河注入海内，大小九道排水渠，也分别由西通

向海中。在西山咀乡东侧，有退水渠一道，通向黄河。现在的海域，南北长一百二十多华里，东西宽三十多华里。水面四十四万亩，其中有四万亩与农业社队插花。水深平均一点五米，水位控制在一千零八点五米，冬季鱼类越冬水位一千零九米左右。

在这浩瀚的海域里，碧水粼粼，迎风荡漾，朝映红日，晚泛霞光。来到海中，胸怀开阔，心旷神怡；而到了寒冬季节，海水封冻，大雪覆盖，一望无垠，玉洁无暇。

驰名的黄河大鲤鱼和其它鱼类，在这里安家落户，生长繁衍。它们色泽鲜艳，机灵善泳，成群结队相互追逐，时而钻入海底，时而跃出水面。有几十种羽毛洁净，光泽艳丽的野禽水鸟，冬去春来，在这里度过舒适的时光。它们有的成群结队，高空翱翔；有的随心所欲，潜水捕鱼；有的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沿海畔浅水区和无水区，长满了芦苇、蒲叶、杂草，郁郁葱葱，十分茂密。这一带，是小鸟乘凉、歌唱、调情的好场所；是沙鹅、白鹅、野鸭交配、产卵、育雏的好地方；尤其是鱼鳖常在这里晒盖、下蛋、孵化。大海到处惹人留恋，游人经常乐而忘归。

乌梁素海的鱼类，年产量相当可观，主要向当地与呼、包、京、津等城市销售。芦苇、蒲叶

等年产量更为庞大，是编织造纸的主要原料。每到出售季节乌梁素海各分场、西山咀、火车站等地芦苇堆积得如山似丘，准备外运。这个海，确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

二、形成与变迁

乌梁素海早称乌梁素海子，其名称的来历，有两种传说：一是红（乌梁）柳（素海）地区的意思；二是杨树（乌梁素）海的意思。哪种说法准确，无从考证。但乌梁素海一带，原来长过红柳，同时流过河，出现过沼泽水泊，是无庸置疑的。

黄河流入后套分为南北二河，其北河（即乌拉河，今称乌加河），向东流再南下，在西山咀南与南河汇合。“河长凡四百五十五里，宽一里至七八里，深三尺至一丈五六，由惠德成以下百余里间，河流枝分如织”而且“河无定形，俗曰坡河行舟、时虞搁浅”^①说明此河下游水势平缓宽浅，也自然会形成沼泽水泊地带。黄河含泥沙极多。在乌拉河上游，流量稍急，沉淤量较小；中下游水势逐渐缓慢淤积量逐渐加多。所以“乌加河下游，已于道光中淤断，与大河不通，屠申泽即腾格里泊已成陆地”。^②从此，乌加河水注入乌梁素海，不再南流。约有四十多里的陆地，隔

断南北大河的汇合，于是这一带长起了红柳杂草，可能是“红柳地区”得名的原因。

原乌梁素海子，在乌加河流下游的流域里。东曲西直似弓状，海域约二百亩左右，后来缩小。其具体位置：北为洋人渠，乌加河的末梢入海处；南约二十里以外为西山咀；正西临近乌梁素海拐子；东南遥对红门兔。据传说乌梁素海子附近，有乌梁素海村，但这“村”与“海子”谁先出现，无从考证。又据传说海子附近长有杨树，这也可能是“杨树海”得名的来历，无以考证。

自从南北河断以后，乌梁素海一带，成了水草丰盛的良好牧场。光绪二十九年清朝贻谷奉令垦地，三十四年又陆续放地。西公旗境内，什拉葫芦素与红门兔两地大量放垦。于是这里逐渐形成农牧业兼营的富饶地区。勤劳善良的蒙汉人民，在这里修筑房舍，建立了村落。据高龄老人叙述及已故去的老一辈传说，这一带建有：上箭杆补隆、下箭杆补隆、红门兔、东红毛兔、西红毛兔、老鲍圪旦、洋行渠、义和洋行、南龙太、北龙太、大王圪旦、王士英圪旦、庚子叉、二后生口子、二后生梁圪、柴喇嘛、喇嘛补隆、柴碾房、白彦淖拐子、乌梁素海拐子、塔布窑子、庙圪堵、吴旺圪堵、大兴泉、侉进才、田公中、李公中等大小不同的村庄达数十个之多，开垦土地

也有数万亩。

当时有一道木板车路，由扒子补隆向东行入红柳滩（今哈惠渠口附近）经过坝头（今东海岸）附近可通向余太。在坝头东北七华里处，有一座土丘圪梁（很早以前东海畔有一道南北防水坝），木板车从土丘窄处穿过，人们称此地为“南天门”。如今大路、土坝全淹没在海中，唯“南天门”土丘最高点，还露在水面上，形成了岛屿。在“南天门”西侧叫白彦淖拐子，东侧叫西红毛兔。西红毛兔在解放初期，有几间土房，有个院子，渔民在这里打鱼休息，如今仍是渔场的作业点。从“南天门”左右的小岛和由水中打捞出的碌碡、耙、用具等，足以证明原来这一带是陆地，而且居民村落不少。

一九三〇年，是乌梁素海子地区被淹没成乌梁素海的新开端。原来河套地区的八大干渠，永济渠（又称缠金渠，长一百零六里）、刚目渠（原名刚目河，长七十里）、丰济渠（原名中和渠，长九十里）、沙河渠（亦名永和渠，长七十五里）、义和渠（长八十三里）、通济渠（原名老郭渠，长一百二十里）、长济渠（即长胜渠，长一百零九里）、塔布渠（原名塔布河，长九十七里），都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灌溉田地，没有控制流量的闸口设备。黄河水常年不间断地灌入各个渠

道，向下流淌，所有余水，全部退入乌加河，注入乌梁素海了。是年，黄河水位暴涨，各个渠道流量猛增，乌加河退水末梢李公中、田公中二村决堤，将村庄田地全部淹没，农民们只好含悲噙泪，向他处逃难。

一九三二年黄河水势更大，各渠道向乌梁素海排水量猛增，乌加河下游的河堤，到处决口，致使李公中、田公中以北三十多平方华里的地区，全部淹没。大水向南、西、东等处扩散，把侉进才、柴喇嘛、柴碾房、二后生口子、大兴泉、吴旺圪堵、红门兔、庙圪堵、塔布窑子等村庄和田地全部淹没，农牧民开发、经营多年的牧场、田地和房舍再没露出水面，只好扶老携幼，四处逃散，到处讨吃或另谋出路。

一九三三年，不少地主为了排除积水，继续种地，曾共议按占有土地的多寡集资，雇工开挖由西山咀（当时海水已逼近西山咀附近）至黄河退水渠，推选赵炽昌为头领。经过一番艰苦经营及农民们的辛勤劳动，花费了大量资金，退水渠终于开挖竣工。赵炽昌并开渠引水浇灌他在藉亥滩占有的土地。惜因所开渠道过窄，再加乌梁素海水势继续上涨不止，亦未能救出被淹没的土地。

一九三四年以后，乌梁素海的水势，不但退

不出，渗不下，反而不停增加，红山口、莫塆河等山洪也大量排入海内，于是刘补隆、吕圈圪旦、上鸡乌素、下鸡乌素、维圪兔、八倍水道、石兰计等村也先后遭到水淹。

一九三八年，是乌梁素海水域最大的时期，其北达到台路南；南抵坝头、三里城；东至坝湾、南昌；西到哈惠桥、白盛号、生娃地、黑坝。南北长达一百二十里，东西宽达五十里，使农民遭到莫大的损失。然在军事上形成中、日隔海对峙的局面。

一九四九年，海域面积最大时，达一百二十万亩，大王圪旦（即今五分场附近），正是海子的中心点，淹没田地之广，十分惊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于是首先建成了黄杨闸（解放前设想建筑四首闸，控制河套地区各个渠道的引水流量问题，黄杨闸是第一首闸），从而控制了由黄河进水量最大的黄济、杨家河、乌拉河等渠道。后来其它渠口也修筑了草闸、石闸，于是乌梁素海缩小到七十万亩。石兰计、八倍水道、上下鸡乌素、吕圈圪旦、刘补隆等地摆脱洪水淹没，重新见了阳光。树林了、新安二乡，向这些新出水的土地上，迁移了社员，新建了村落，从事农业生产。

一九五四年十月，成立了“安北县乌梁素海

水产局”（区的编制），开始搞渔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以资发展水产事业。当时固定工为三、四百人，春来秋去的临时工约在千人以上。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春，成立了十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包括一个船运合作社。到一九五七年在海的南部即坝头发展成渔业高级社。下半年因海水下降，上级决定封海，不准打鱼。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共有职工七十六人。

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乌梁素海，改为国营渔场。乌拉特前旗划归包头管辖以后，渔场仍归前旗管理。同时挂三个牌子即：“乌拉特前旗水产管理局”、“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人民公社”、“乌拉特前旗水产经理部”。实际上只有一套人马，只不过是分工负责而已。这时期有职工六百四十九人。

一九六一年，河套地区兴挖的黄河引水渠（又名二黄河），全部竣工。从此，各个渠道都由引水渠进水，在调节控制流量上有了把握。昔日任由大水灌入海内的现象得以根绝。

一九六二年八、九月份，乌梁素海直接由包头接管，其名称改为“乌梁素海综合经营管理局”。

一九六三年秋，乌拉特前旗又划归巴盟，乌

梁素海也由包头交由巴盟管理。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乌梁素海由巴盟划归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十九团管理。

一九七〇年，政府又重新将西山咀通黄河的退水渠进行了一次挖宽取直工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撤销生产建设兵团，乌梁素海又划归巴盟农管局管理，改名为国营乌梁素海农场。一九七八年又改为国营乌梁素海渔场。

一九八二年，对西山咀到黄河的退水渠，再次进行了一次挖深工程。从此，海面控制到四十四万亩。

目前，全场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三口人，职工达一千六百六十三人，有渔船一百六十八艘，运输对槽七对，载重汽车十三辆，运输拖拉机九台。沿海四周分置十一个分场，场部下设基建队、机运队、医院、中心学校、林场、养殖场等十几个核算单位。

三、主要水产

乌梁素海的形成年久，海水中有大量的沉水植物和浮游植物；有底栖动物和浮游动物。说明水质优良，营养度高，鱼类等水产动物非常丰

富。

乌梁素海以产鲤鱼、鲫鱼为大宗。此外，还从外地移殖来白鱼、青鱼、草鱼、鳊鱼、团头鱼等等。在解放以前，靠捕鱼为业者仅仅几户人家，当时捕鱼极易，不用说一网可打捞无数活蹦乱跳的鱼，就是用鱼叉在海边较深处，也能叉到许多大鲤鱼。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冬季可向外地运销一点，夏季只好就地廉价出售。一般群众买鱼者不多，渔民到日落时，把剩余的鱼经常倒在渠里。

自从成立了渔业社以后，捕鱼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渔民们用抓网、套网、合网、冬网、箔旋等工具辛勤劳动，鱼产量大增。由年产鱼六百万斤逐年增加到八百四十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包括小鱼在内产量达一千万斤。冬季照常作业打冬网，一天可凿冰窟下网三次，每次捕鱼不等。一九六三年一次一网捕鱼七万余斤，其中鲤鱼、鲫鱼都有，鲤鱼占百分之六十，当天运走三万多斤，次日运走四万多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捕鱼政策不能很好执行；工业污染，农药毒害，九个排水干渠，向海内排泄碱水，影响鱼类生长繁衍；水位下降到一千零一十八点五米，平均水深由一点五米降到九十公分，造成鱼产量下

降。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鱼产量达六七百万斤。一九六九年仅产到一百多万斤，这年鲢鱼、甲鱼几乎绝迹。这几年经过整顿改革，年产量上升到二百万斤左右。

乌梁素海的芦苇、蒲草，更是极丰富的特产。年产量达六七千万斤以上，每斤以四分计，就值二百多万元，若编织成各种编织品，其价值更为可观。但在旧社会，每年冬季在蒲苇枯干以后，除老乡们收割一部分烧火之用外，别无他用，经常被人纵火点燃，浓烟滚滚，冲向云霄，烈火熊熊迎风漫延。经过十几个昼夜的燃烧以后，六七千万斤芦、蒲变成灰烬，价值二百多万元的轻工原料化为乌有。

乌梁素海地区辽阔，芦苇丛生，在旧社会，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解放初期仍然是坏人潜伏的场所。一九五三年冬又发生过点燃芦苇的事情，在死人圪旦处，有七个农民，因大火烧来无法躲藏被烧伤。一九五四年成立了水产局以后，加强了管理，情况逐渐好转。解放以后，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每年把芦苇、蒲草等收割殆尽，由各种编织专业组、队编织席子、蒲垫、鱼包、苇帘等产品，其余作为造纸原料。一九五六年安北县供销合作社负责专门经营推销鱼类、编织品以及芦蒲造纸原料等业务。

乌梁素海的蒲草、芦苇，不仅是编织、造纸的原料，而且在必要时也是救济牲畜越冬的饲草。一九六二年牧区缺草，牲畜难以过冬，中后、临河、伊盟、固阳等地的羊群来海内放牧。一九六五年还割过芦苇四百多万斤，支援牧区牲畜饲用。

全场的总收入，早期逐年上升。六九年至七六年亏损，七七年持平，七八年以后扭亏为盈逐年上升，七四年亏损最大高达到一百六十多万元，七九年利润回升为三十三万多元，八三年利润达五十二万多元。

当前，在乌梁素海场领导的重视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鱼类、蒲苇等产量，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乌梁素海这块塞外宝石，将会闪烁璀璨光辉，开出绚丽的花朵，以崭新惊人的面貌谱写出未来的史诗华章。

注①②见督办运河工程总局编辑处出版的《调查河套报告书》。

一九八五年十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4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